

幹部學習材料

幹部學習材料

一、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
工作和整黨工作指示

二、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

三、政委會發佈命令統一頒發土地執照

四、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在發展農業生

產上的作用

印店分寧遼店書北東

月六年八四九一

目 錄

一、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	一
二、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	七
三、政委會發佈命令統一頒發土地執照	二六
四、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在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作用	三一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

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

(一)

必須注意季節。必須利用今年整個秋季及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個月時間，在各中央局及分局所劃定的地區內，依次完成：(甲)鄉村情況調查。(乙)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初步整黨。上級派到鄉村的工作團或工作組，必須首先團結當地黨的支部組織內的一切積極分子和較好分子，共同領導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丙)組織或改組或充實貧農團和農會，發動土地改革鬪爭。(丁)按照正確標準，劃分階級成份。(戊)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分配封建土地及封建財產。實行分配的最後結果，必須使一切主要階層都感覺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階級亦感覺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己)建立鄉(村)、區、縣三級人民代表會議，並選舉三級政府委員會。(庚)發給土地證，確定地權。(辛)調整或改訂農業稅(公糧)負擔的標準。這種標準，必須遵守公私兼顧的原則，這即是一方面利於支援戰爭；一方面使農民有恢復和發展生產的興趣，利於改善農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確政策，完成黨的支部組織的整理工作。(癸)將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轉移到團結農村中一切勞動人

民並組織地主富農的勞動力爲共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奮鬥的方面去。開始組織在自願和等價交換兩項原則上的小規模的變工組織和其他合作團體；準備好種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產計劃；發放必要的和可能的農業貸款（以貸給生產資料爲主，必須有備有還，嚴格區別於救濟性質的賑款）；在可能的地點，做好興修水利的計劃。以上是由土改到生產的全部工作過程，必須使一切直接從事土改工作的同志瞭解這樣的工作過程，避免工作的片面性，並不失時機於秋冬兩季全部完成上述工作。

(二)

爲達上述目的，今年六月至八月的三個月內，必須完成：（甲）劃定土改工作範圍。這種範圍，必須是在下列三項條件下劃定之。第一，當地一切敵人武裝力量業已全部消滅，環境業已安定，而非動盪不定的游擊區域。第二，當地基本群眾（僱農、貧農、中農）的絕對大多數業已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數人有此要求。第三，黨的土改工作幹部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確能掌握當地的土改工作，而非聽任群眾的自發活動。如果某一地區，在上述三個條件中，有任何一個條件不具備，即不應當將該地區列入一九四八年土改工作的範圍。例如，在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解放區的接敵區域，及中原局所屬江淮河漢區域的絕大部份地區，因爲尚不具備第一個條件，即不應當列入今年的土改計劃內。明年是否列入，還要看情況才能決定。在這類地區，應當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實行減租減息及酌量調劑糧子吃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以便聯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一切國民黨武裝力量及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黑幫分子。在這類地區，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財，因爲這些都是在新區和接敵區的條件之下，不利於聯合或中立

一切可能的社會力量完成消滅國民黨反動力量這一基本任務的。(乙)開好幹部會議。一九四八年，爲着土改和整黨的幹部會議，必須充分講明關於土改和整黨的全部正確政策，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須將中央頒佈的各項重要文件，責成一切從事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幹部，認真學習，完全瞭解，並責成他們全部遵守，不許擅自修改。如有不適合當地情況的部份，可以和應當提出修改的意見，但必須取得中央同意，才能實行修改。今年的各級幹部會議，必須由各地高級領導機關，在開會之前，有充分而恰當的準備。這即是事前由少數人商量(由一個人負責)，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寫好成文的綱要，精心斟酌這個綱要的內容和文字(注意簡明扼要，反對不着邊際的長篇大論)，然後向幹部會議作報告，開展討論，吸收討論中的意見，加以補充和修改，作爲定論，並將此項文件通知全黨及儘可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必須反對經驗主義的方法，這即是事前毫無準備，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向幹部會議作精心準備好了的內容文字都有斟酌的報告，而聽憑到會人員無目的的雜亂無章的議論，致使會議時間延長，得不到明確而週密的結論。如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省委及地委的領導工作中，如果存在着這種有害的經驗主義方法，必須注意克服。討論政策的會議，人數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準備，會議的時間亦可縮短。大約按情況，以十幾個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開會一星期左右爲適宜。傳達政策的會議，人數可以多一些，時間亦不可過長。只有整黨性質的高級及中級的幹部會議，人數可以多一些，時間亦可以長些。(丙)九月上半月，至遲九月下半月，全部直接從事土改工作的幹部必須到達鄉村，並開始工作，否則就不能利用秋冬兩季全部時間，完成全部土改工作與整黨建政工作，並準備春耕。

在幹部會議中及在工作中，必須教育幹部善於分析具體情況，從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條件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當地當時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必須區別城市和農村的不同，必須區別老區、半老區、接敵區和新區的不同，否則就要犯錯誤。

(四)

凡屬封建制度已經根本消滅，貧僱農已經得到大體上相當於平均數的土地，他們與中農所有土地雖有差別（這種差別是許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應認為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不要再提土地改革問題。在這類地區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工作及支援前綫的工作。在這類地區的部份鄉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須待分配或調劑，階級成份須待改訂，土地証須待發給者，自然應當按照實際情形完成這些工作。

(五)

在一切解放區，不論是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或者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均必須在今年秋季指導農村人民耕種麥地，並進行一部份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號召一切農村人民積肥。所有這些，都對一九四九年的農業生產和收成有極大重要性，必須用行政力量，配合群眾工作，給以解決。

(六)

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爲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藉口之下，採取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這種狀態，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爲鉅大。各級黨委必須對這一點進行反覆討論，認真克服這種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

(七)

中央、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省委）、地委、縣委、區委、直到支部，必須充分利用無線電、有綫電、電話、郵遞、專人送信等項通訊方法，將小型會議（例如四五個人），區域會議（例如幾個縣），和個別談話等項會談方法，小型巡視團（例如三至五個人）和個別有威信的委員的巡視方法，同時充分利用通訊社及報紙，密切地互相聯繫起來，掌握運動的動態，隨時互通情報，交流經驗，及時糾正錯誤，發揚成績。不要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這種報告和指示，往往過時，失去作用，或者減少了作用。犯錯誤的已經犯過，來不及糾正，損失太大。全黨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時機的生動的具體的報告和指示。

(八)

必須將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將工業生產任務和農業生產任務，放到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省委、地委及市委的領導工作的適當位置。即是說，不要因為領導土改工作和農業生產工作，而忽視或放鬆對於城市工作和工業生產工作的領導。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許多大中小城市，和大的工礦交通工作，如果各重要領導機關忽視或放鬆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就要犯錯誤。

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

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是：（一）「怎樣分析階級」，（二）「關於土地鬭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都是當時民主中央政府爲着糾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發生的偏向，並爲正確地解決土地問題而發的文件。這兩個文件，曾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參考文件的方式發給各解放區的各級黨委。現在我們決定將這兩個文件作爲正式文件，重新發給各級黨委應用。這兩個文件中，只有一小部份現時已不適用，現在將這一部份刪去；其餘全部是在現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適用的。其中，有些部份現在作了一點修改，或者加上了「中共中央註」的字樣。這兩個文件中沒有講到的問題及關於富農和中農分界的問題，則應以中央發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中所證者爲準。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個文件：「怎樣分析階級」

（一）地主

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爲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

要是以地租方式剝削農民，此外或兼放債，或兼僱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一類。

有些地主雖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後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爲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別兇惡者（富農中亦常有小的土豪、劣紳）。

幫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剝削農民爲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一些人，應與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貸剝削爲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人，稱爲高利貸者，應與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農

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但也有自己佔有一部份土地，另租入一部份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後二種少數）。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自己勞動，但經常依靠剝削爲其生活來源之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雇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富農多半還管公堂。但中國的富農常有自己的勞動之外並不僱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並且是主要的。

中農許多都佔有土地。有些中農只佔有一部份土地，另租入一部份土地。有些中農並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一般不剝削人，許多中農還要受別人小部份地租債利等剝削。但中農一般不出賣勞動力。另一部份中農（富裕中農）則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與主要的。這些都是中農。

(四) 貧農

貧農有些佔有一部份土地與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與小部份僱傭勞動的剝削。這些都是貧農。

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份勞動力，這是區別中農與貧農的主要標準。

(五) 工人

工人、僱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與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份的土地工具，完全的或主要的以出賣勞動力為生，這是工人。

第二個文件：「關於土地鬭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

在今日與查田的鬭爭中，發生了許多實際問題。這些問題。或者是以前的文件沒有規定，或者是規定不明悉，或者是政府工作人員解釋不正確，以致執行上發生錯誤。人民委員會爲了正確的發展土地鬭爭，糾正及防止這些問題上的錯誤起見，除了批准「怎樣分析階級」（關於分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的各項原則）外，特作下面的決定：

(一) 勞動與附帶勞動

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主要勞動，叫做有勞動。全家有一人每年從事主要勞動的時間不滿三分之一，或每年雖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勞動，但非主要的勞動，均叫做附帶勞動。

（說明）這裏應注意：

（一）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故勞動是區別富農與地主的主要標準。

（二）規定全家中勞動的標準人數為一人。如全家有數人，其中有一人勞動，這家即算有勞動。有些人以為要有二人甚至全家參加勞動，才算這家有勞動，這是不對的。

（三）規定勞動的標準時間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個月。以從事主要勞動滿四個月與不滿四個月作為勞動與附帶勞動的分界（即富農與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時間從事主要勞動的還算做附帶勞動，這是不對的。

（四）所謂從事主要勞動，是指從事生產上主要工作部門的勞動，如犁田、蔴田、割禾及其他生產上之重要勞動事項。但不限在農業生產方面，如砍柴、挑担、運輸、紡織、行醫、教書及做其他重要勞動工作，都是主要勞動。

（五）所謂非主要勞動，是指各種輔助勞動，在生產中僅佔次要地位者，如幫助耘草，幫助種菜，照顧耕牛等。

（六）勞動既是區別富農與地主的主要標準，因此對於那種只僱長工耕種，沒有其他地租債利等剝削，自己負指揮生產之責，但不親身從事主要勞動者，仍照地主待遇。

(七) 構成地主成份的時間標準，以革命政權建立時為起點，向上推算，連續過地主生活滿三年者，即構成地主成份。

分田與查田運動中對於勞動與附帶勞動的問題，發生許多錯誤，或以有勞動當做只有附帶勞動，把他判為地主；或以只有附帶勞動當做有勞動，把他判為富農；都是因為過去對地主與富農的分界沒有明確標準的原故。依照上述規定，可以免去這種錯誤。

但上面的規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別情形下，須有不同的處置。這裡有兩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主而家中有人參加生產者。例如有人剝削地租積利的數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債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多，消費不大，則雖這家人每年從事四個月以上的主要勞動，仍是地主，不是富農（但如人口甚多，消費甚大，則雖有百担租或千元債，只要有人從事主要勞動，仍不是地主，而是富農。第二方面，是拿剝削情形說是地主，但拿生活情形說則不能照地主待遇者。例如有人過去是富農或中農，但到革命前數年，因死亡或疾病等原因，突然喪失勞動力，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僱人耕種，因此全家過地主生活。如果把這種人當地主待遇，是不妥當的，應照本人原來成份待遇。又如有人名義上還是地主，但土地權實際已屬別人，剝削收入極少，甚至生活比農民不如，而本人已有附帶勞動者，此種人可照農民待遇。

上述這些特別情形，分田及查田運動中有些地方把它忽視了，這也是不對的。

(在有些大家庭中，人口超過十五口者，則全家有勞動力的人員中，應有三分之一的人員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主要的勞動，才算這家有勞動。——中共中央註)

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份，生活狀況在普通中農以上，一般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其剝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為限度。

在某些情形下，剝削收入雖超過全家一年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群眾不加反對者，仍以富裕中農論。

在民主政下，富裕中農的利益應與一般中農得到同等保護。

(說明) 這裏應注意：

(一) 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份。富裕中農與其他中農不同的地方，在於富裕中農的生活狀況在普通中農以上，一般對於別人有輕微剝削，其他中農則一般無剝削。

(二) 富裕中農與富農不同的地方，在於富裕中農一年剝削收入的分量，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百分之十五，富農則超過百分之十五。這種界限的設置是實際區分階級成份時所需要的。

(三) 所謂富裕中農的輕微剝削，是指僱牧童，或請短工，或請月工，或有少數錢放債，或放少數典租，或收少數學租，或有少數土地出租等。但所有這些剝削，在其全家生活來源上，不佔着重要成份，即不超過其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而其全家主要生活來源，是依靠自己的勞動。

(四) 在接近革命政權建立的時期內，雖曾有過與富農在同等時間內的剝削分量相同的剝削，但不超過二年者，仍以富裕中農論。

(五) 在某些情形下，剝削收入雖超過全家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群眾不加反對者，仍為富裕中農。這裡所謂「某些情形」是指剝削分量雖超過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勞力少，生活並不豐富，更有遭遇水旱災荒，或逢疾病死喪，反而轉向困難者。在這些情形下，剝削

分量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認為富農，而應認為中農。如沒有這些情形，則剝削收入超過總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為富農，不應認為富裕中農。這些情形的正確判斷，依靠於當地群眾的公意。

富裕中農在農村中佔着相當的數量。分田及查田運動中，許多地方把他們當做富農處置，這是不正確的。各地發生的侵犯中農事件，多半是侵犯了這種富裕中農，應該即刻改正。

(舉例) (一) 全家六人吃飯，二人勞動，有田五十担 (收實穀三十五担)，時價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房五間，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約二百元，放生穀三担，利加五 (年收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債大洋一百元 (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三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斷：此家靠自己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自己生產佔二百五十元以上。對別人有債利剝削，但年收利息只有三十一元，在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開銷後有剩餘，生活頗好，但因剝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農，不是富農。

(二) 全家五人吃飯，一個半人勞動。有田二十五石，收實穀十七担。租來田七十五担，收實穀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五十元，僱牧童一個，僱了三年。放債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房五間，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塊，年摘木挑三十担。判斷：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勞動，每年剝削人家極少，不過二十餘元 (僱牧童與放債合計)，而受人剝削地租二十五石之多，全家開銷所餘無幾，只能算普通的中農，還不是富裕的中農。

(三) 富農的剝削時間與剝削分量

從新政權建立時間向上推算，在連續三年之內，除自己參加生產之外，還依靠剝削為其全家生活來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剝削分量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農。在某些情形之下

，剝削分量雖超過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群眾不加反對者，也不是富農，而是富裕中農。

（說明）這裡應該注意的是：（一）以革命政權建立時為計算剝削時間的起點，而不應把其他任何時間作為計算剝削時間的起點。有些人算陳賬，拿了中間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剝削作為決定階級成份的根據，這是不對的。

（二）以連續三年的剝削作為構成富農成份的標準時間。如果剝削時間不滿三年或雖有三年而是中間空隔了的（不相連續的），雖其剝削分量與富農在同等時間的剝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農論。

（三）剝削的分量必須是超過了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才能構成富農成份，如果剝削分量在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雖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連續性，也不能構成富農成份，而仍是富裕中農成份。

（四）所謂全家一年總收入，是指自己生產部份與剝削他人部份的合計，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產部份四百元，剝削他人部份一百元，合計五百元，即是總收入。因為剝削部份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農。

（五）「某些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勞力少，因此生活並不豐裕，或因天災人禍反而轉向困難者。在這種情形下，剝削分量雖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群眾不加反對者，仍以富裕中農論。這裡群眾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情形的考量也是要十分仔細的。不應把富裕中農弄做富農，引起中農群眾不滿意，但同時也不應把富農當做富裕中農，引起貧農群眾不滿意。所以，應有仔細的考量，要取得群眾的同意。

分田及查田運動中，對於這個時間與分量的問題，鬧出許多糾紛，這定因爲過去對於富農與富裕中農的分別沒有明確的標準，或把富裕中農當做富農處理，或把富農當做富裕中農處置，因而時常發生錯誤。現在規定兩者的分界，可以免除這種弊病。

(舉例) (一) 全家十一人吃飯，二人勞動。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實穀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塊，每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雜糧生產及養豬等每年約值百五十元，經常僱長工一個，僱了七年，到革命時止，每年剝削剩餘勞動約值六十元。放債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時止。判斷：此家自己勞動，但僱長工，又放債不少，剝削收入超過全家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雖多，但閉銷後餘錢不少，故是富農。

(二) 全家三人吃飯，一人從事主要勞動四個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實穀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穀十二担，收了五年。經常每年請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稅穀二担。收債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斷：此家剝削收入超過自己生產，但因有一人從事四個月主要勞動，故是富農。

(四) 反動富農

在革命前，尤其在革命後，有重大反革命行爲的富農，叫做反動富農。對於反動富農，應該沒收他本人及其家屬中參加了這種反革命行爲的人的土地財產。

對於反動資本家，適用上述的原則。

(說明) 這裡應該注意：(一) 必須是「有重大反革命行爲」的富農，才叫做反動富農。例如當革命時，領導民團屠殺工農，對革命政府頑強抵抗，特別是革命後還在領導別人組織反革命團體機關

，或個別進行重大反革命活動，如暗殺，當敵人偵探，自動替白軍帶路，逃往白區幫助國民黨，積極的破壞分田或查田運動與經濟建設等。其他富農中，雖有反革命行爲，但不是領導的或重大行爲者，均不得沒收其土地財產。

(二) 反動富農家屬之中，只沒收參加了這種重大反革命行爲的分子的土地財產，其他分子的土地財產則不沒收。

(三) 以找生活爲目的而暫時跑去白區的，不是反動富農，不應按反動富農待遇。

(四) 對於反動資本家之定義與處置，完全適用以上之規定。

過去許多地方，把沒有重大反革命行爲的富農分子的土地財產沒收了，並且一家中把沒有參加反革命行爲的富農分子的土地財產也沒收了，這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一個來源，是在江西沒收分配土地條例的第三條：「凡加入反革命組織的富農，全家沒收。」這裡不分首領與附從，不分參加者與未參加者。關於家屬問題，雖在這一條的後半指出了：「其家屬未加入反革命組織，又無反革命行爲，並與其家中反革命份子脫離關係，當地群眾不反對者，得發還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沒收，後才發還一部，仍非正當辦法。因此這一條應照現在規定改正。又過去有些地方擴大反動資本家的範圍，沒收了一些不應沒收的商店，這也是不對的。

(舉例) 一家九人吃飯，一人勞動，又一人附帶勞動。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實穀五十六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租三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塊，每年出息大洋七十元。經常僱長工一人。欠債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債大洋三百八十元，利加三二，放了五年。有一人當靖衛團連長，當了兩年，與赤衛軍作戰五回。又有一人加入A B團一年，但不是重要分子，無積極

活動。家裏其他各人無明顯反動行爲。判斷：此家成份是富農。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動富農，應沒收家產。其他各人不應沒收。另一人雖加入A B團，不是重要分子，又無積極活動，也不應沒收。

（本條的規定，同樣適用於地主及其他人民成份中的犯罪分子——中共中央註）

（五）富農應有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

凡確定爲富農應有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等，在遵守政府法令下，富農自己有處置之權，他人不得妨礙。

（說明）（一）近來有些地方發生工農貧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調換富農應有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甚至有調換衣服、肥料事情，這是不對的。

（二）土地問題正確解決以後，富農分得之田，已經改良，變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調換。富農添置之耕牛、農具、房屋，雖有多餘，亦不得再行沒收，或調換。

（本條的規定，同樣適用於地主——中共中央註）

（六）破產地主

在革命前，地主已經全部或最大部份失掉了他在土地財產上的剝削，但仍不從事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爲主要生活來源，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叫做破產地主。破產地主仍然是地主階級的一部份。

但地主破產後，依靠自己勞動爲生活來源之一部，其部份達到其一年生活費用三分之一者，得照富農成份待遇。

(說明) (一) 有些人把部份破產的地主叫做破產地主，這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地主，還有一部份產業，依以剝削，這不過剝削收入的分量有改變罷了。

(二) 有些人把破產後已經從事主要勞動滿一年的，叫做破產地主，這更是不對的。因為地主破產後，從事主要勞動已滿一年（指革命前），他已經由地主變為工人或貧民或農民了。

(三) 有些人把地主破產後，已經從事一部份勞動者，仍照地主待遇，這是不對的，因為其勞動已達到維持全家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這種人已經應該給予以富農待遇了。

(七) 貧民

工人農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勞動為生活者，或大部份依靠自己勞動生活者，或依靠少數資本，自己經營，以取得生活費者，均叫做貧民。鄉村及小城鎮貧民分子失業者，應分配土地。

(說明) (一) 貧民在城市中佔着相當的大數量，在鄉村及小市鎮上亦有一部份。貧民的職業，是很複雜的，有些貧民的職業，常依季候更換，而不能固定。貧民的生活是很困難的，其收入常不夠支出。

(二) 工人農民外，如獨立生產者、自由職業者、小販、不僱用店員的小本經商者，及其他一切勞動分子，均屬於貧民範圍之內。所謂獨立生產者，是指各種自己做自賣的小工業生產者。這種小工業生產者，有時僱用輔助勞動力，但主要依靠於自己的勞動。所謂自由職業者，是指一切不剝削他人的醫生、教員、律師、新聞記者、著作家、藝術家等。這種自由職業者，為了執行自己業務，有時僱用助手或僱工助理家務勞動，這種僱工行為，不算入剝削者範圍之內。

(八)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應該看做一種階級成份。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

一切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的條件下，應該充分使用他們爲民主政府服務，同時教育他們克服其地主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

知識分子在他們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如當教員、當編輯員、當新聞記者、當事務員、當著作家、藝術家等的時候，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此種腦力勞動者，應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護。

(說明) (一) 近來有些地方，排除知識分子，這是不對的。吸收地主資產階級出身而願爲民主政府服務的知識分子參加工作，是有利於人民革命事業的政策。在他們爲民主政府服務的期間，應設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二) 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例如家庭屬於地主的是地主出身，家庭屬於中農的是中農出身等。知識分子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例如本人當地主的是地主，本人當資本家的是資本家，本人當自由職業者的是自由職業者，本人當職員的是職員，本人當軍人的是軍人等。知識分子依靠家庭供給主要生活來源者，其本人成份亦依其家庭成份決定。把知識分子看做一種單獨的成份是不對的，把勞動人民子弟在學校讀過書的分子（所謂「畢業生」）當做一種壞的成份更是不對的。

(三) 把當教員當醫生等工作看做不是勞動，這也是不對的。

(九) 遊民無產者

在緊靠革命政權建立前，工人、農民及其他民衆，被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因而失其職業和土

地，連續依靠不正當方法爲主要生活來源滿三年者，叫做遊民無產者（習慣上叫做流氓）。

民主政府對於遊民無產者的政策，是爭取其群眾，反對其依附剝削階級、積極參加反革命的份子。關於爭取一般遊民無產者群眾的主要辦法，是使他們回到生產上來，分配土地和工作，但分配土地，須在鄉村居住，並須自己能耕種者。

（說明）（一）所謂依靠不正當方法爲主要生活來源，是指從事偷盜、搶劫、欺騙、乞食、賭博、或賣淫等項不正當職業。有些人對於在職或失業，而兼從事一部份不正當職業（非主要生活來源）的分子，一概叫做流氓，這是不對的。甚至把工農貧民中過去染有不良習慣，如嫖、賭、吸鴉片的人，都叫着流氓，這更是不對的。

（二）有些地方，對於積極參加反革命的遊民無產者領袖分子（所謂流氓頭），不加懲辦，反而分田給他，這是不對的。有些地方，對於一般遊民無產者份子，又拒絕其分田的要求，這也是不對的。

（七）宗教職業者

凡在緊靠革命前，以牧師、神父、和尚、道士、齋公、看地、算命、占卦等宗教迷信的職業，爲主要生活滿三年者，叫做宗教職業者。

（十一）紅軍戰士中地主富農出身的份子與土地

紅軍戰士中地主富農出身的份子，在他們堅決爲工農利益作戰的條件下，不論指揮員、戰鬥員，本人及家屬都有分配土地之權。

（說明）（一）優待紅軍條例第一條：「凡紅軍戰士家在民主政府區域內的，本人及家屬，均應與當地貧苦農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這裡本已包括一切紅軍戰士在內。但近來

有些地方，只問社會出身，不問政治表現，把地主富農出身而堅決爲工農利益作戰的紅軍戰士，已經分得的土地重新沒收，這是錯誤的。

(二) 所謂「紅軍戰士家屬」，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歲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權利。

(十二) 工人的家庭是富農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農或地主者，工人本人及其妻子，依工人成份不變更。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或富農成份處理。

(說明) (一) 地主或富農家中，在緊靠革命前，有人出賣勞動力已滿一年者，應承認其爲工人成份。本人及其妻子照工人成份待遇。家中其他人，照地主富農成份處理，不得享受工人權利。家中如尙有其傭成份，依其成份處理。例如，一家有人在鄉村，靠收租放債，爲主要生活來源已滿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依靠出賣勞力，爲主要生活來源已滿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城鎮開自做自賣的小工業，依爲主要生活來源已滿一年，此人是獨立生產者；各依其在一定時間內生活來源的性質，而決定其成份，又各依其成份，而決定其在民主政府法律下的待遇。

(二) 農村工人、獨立生產者、小學教員、醫生等人中，兼有小塊土地，因鄉村不夠維持生活，出外謀生，而將其小塊土地出租，並非依爲主要生活來源者，應照一般農民分配土地，不能當地主看待。

(十三) 地主、富農、資本家與工人、農民、貧民互相結婚後的階級成份。

(一) 地主、富農、資本家與工人、農民、貧民相互結婚後的階級成份，依照結婚在革命前後的

分別，依照原來階級成份的分別，並依照結婚後生活情形的分別，而決定其成份。

(二) 凡在革命前結婚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女子嫁與工農貧民，從事勞動依爲主要生活來源滿一年者，承認其爲工人、農民或貧民成份。不從事勞動，及從事勞動不滿一年者，依原來成份不變。工、農、貧民子女嫁與地主、或富農、或資本家，過同等生活滿五年者，才能承認其爲地主或富農或資本家成份。如生活不與地主、富農、資本家同等，而與工農貧民同等（即靠自己勞動爲主要生活來源），或過同等生活不滿五年者，依原來成份不變更。

(三) 凡在革命後結婚的：工農貧民女子嫁與地主、富農、資本家，其原來成份不變更。地主、富農、資本家女子，嫁與工人、農民、貧民，須從事勞動，依爲主要生活來源滿五年者，承認其爲工人、或農民、或貧民成份。如不從事勞動，及從事勞動不滿五年者，依原來成份不變更。

(四) 無論何時，與何種成份結婚，所生子女的成份與父同。

(五) 革命前，工農貧民以女子賣與地主、富農、資本家者，及工農貧民與地主、富農、資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賣子女，及招來郎婿的成份待遇，適用上述(一)至(四)條之規定。

(六) 革命前，工農貧民與地主、富農、資本家，相互以子過繼者，不問過繼時之年齡如何，從滿十歲起，工農貧民之子過繼與地主、富農、資本家，與其過繼父母過同等生活，滿五年者，其成份同於過繼父母。如生活不與過繼父母同等，而與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來成份不變更。地主、富農、資本家之子，過繼於工農貧民，與過繼父母過同等生活滿三年者，其成份同於過繼父母。如生活不與過繼父母同等，而與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來成份不變更。

(說明) 這裡所謂勞動，包括家務勞動在內。

(本條(三))項關於在革命後工農貧民女子嫁與地主、富農、資本家依原來成份不變更的規定，在現在適用時，對於嫁與地主、富農者，應將在革命後解釋為在土地改革後，對於嫁與資本家者，則仍應按本條(二)項規定處理。——中共中央註)

(十四) 地主、富農兼工商業者

(一) 地主兼工商業者，其土地及其與土地相連的房屋、財產沒收。其工商業及與工商業相連的店舖、住房、財產等不沒收。

(二) 富農兼工商業者，其土地及與土地相連的房屋、財產，照富農成份處理。其工商業及與工商業相連的店舖、住房、財產，照工商業者處理。

(十五) 管公堂

管公堂是一種剝削行為，但應分別地主、富農、資本家管公堂與工、農、貧民管公堂的不同。

(說明) 管理各種祠、廟、會、社的土地財產，叫做管公堂。管公堂無疑是封建剝削的一種，特別是地主階級及富農，借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財產，成為封建剝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屬這種為少數人把持操縱、有大量封建剝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為，當然是構成管理者階級成份的一個因素。但有些小公堂，為工農貧民群眾輪流管理，剝削數量極小，則不能作為構成管理者階級成份的一個因素。有些人以為只要管過公堂者，都是地主、富農、或資本家，這是不對的。

(十六) 一部份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

在民主政權機關及其他革命組織中的工作人員，未配土地而生活特別困難者，本人及家屬，可酌給相當土地，或以其他方法解決其困難。

(說明) 已分配土地的一般政府工作人員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決(即發動群眾耕種其土地)，這裡只說未分土地的人員。所謂家屬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歲以下的弟妹。

(十七) 公共事業田

新區分配土地，及老區檢查出來的土地重新分配時，應酌量留出爲了橋樑的修理、渡船、茶亭等公共事業而使用的土地。

(說明) 橋樑的修理，渡船的修理與船工的工資，茶亭的修理與茶水的設置，這些公共事業的費用，均經按照需要程度，由當地區鄉政府決定，酌量留出一部份土地，發動群眾耕種。

(十八) 債務問題

(一) 在革命前，凡地主、富農，以金錢或物品貸付與工農貧民者，除店舖貨賬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農貧民，以金錢或物品，存放於地主、富農者，應予歸還。

(二) 依靠高利貸剝削，爲全家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叫做高利貸者。高利貸者，照地主成份處理。

(三) 在革命後的債務，凡不違背中國民主中央政府頒佈之暫行借貸條例者，均應歸還。

(說明) (一) 一切過去及現在的國民黨統治區域，不論城市、鄉村，債務中最大多數都是高利貸剝削。但不是依靠高利貸爲其全家主要生活來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貸者，應各以其成份處理。以爲凡有高利貸剝削的都是「高利貸者」，這是不對的。

(二) 一面放債，一面欠債的，應將其「欠人」、「人欠」，互相抵消，看其剩餘部分的性質與程度，再與本人其他剝削關係總合起來，決定其成份。

內

(三) 店舖貨賬必須歸還的理由，是爲了不使商業受到損失，並且貨賬一般不在高利債務範圍之內。

(四) 工農貧民互相間的債務，應如何處理，由借貸雙方自己決定。雙方不能決定者，由當地民主政府決定。

(新華社陝北廿五、廿六、廿七、廿八日電)

政委會發佈命令

統一頒發土地執照

保障土改後土地所有權不受侵犯

政委會本月一日發佈命令，宣佈頒發土地執照，以保障土改完成後個人土地所有權，其命令、通知、辦法、說明各件原文如下：

東北行政委員會土地執照頒發令

東北解放區大多數地區土地改革業已完成，為保障個人土地所有權，特由本會頒發土地執照，由土地所有者存執，其所有權任何人不得侵犯。

此令！

主 席 林 楓
副 主 席 張 學 思
高 崇 民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

附：通知、辦法、說明

通知

一、遼北、嫩江、黑龍江、松江、吉林、合江、牡丹江各省土地執照可自本年七月十五日起始由各縣縣政府負責填發。仰上列各省省政府立即進行準備工作，並於六月十五日派員來本會領取土地執照。

二、其餘各省土地執照因印刷關係其發給日期另行通知。

東北行政委員會

六月一日

土地執照頒發辦法

(一) 在東北解放區內，所需土地執照，統由東北行政委員會頒發由各省省政府轉各省市縣政府負責填發。

(二) 各省、市、縣前所頒發之土地執照，即由各省省市縣自行收回作廢。

(三) 土地執照頒發原則如下：

- 1、凡經土地改革後，分給個人所有之土地皆發給土地執照。
- 2、如係分給數戶所共有者其土地執照須載明其共有土地各執一張。

3、凡土地租與或借與他人（或部隊機關團體等）如該土地屬於公有者，則不發給土地執照，如係私有者，則發給領有土地者。

4、凡歸村所有之土地，如學田或尚未分配之土地，其土地執照發給村政府收執。村有地須經縣政府批准。

5、凡屬公營農場或苗圃，以研究或改進農業爲目的所佔有之土地，以及私人資本家投資經營之土地，不發給土地執照。但須經縣以上政府登記。

6、凡屬公有之土地，如義地、荒地、草甸等。概不發給土地執照。由縣市政府負責登記。

7、在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區，或土地尚在調劑時，可待其完成後，再行發給土地執照。

8、村中勞動態度不好之二流子，一時難望改好者，經群眾公議後，其土地執照由村政府暫代保存，待其改變後，再行發給。

(四) 不論家庭人口多寡，土地數目若干及土地種類如何，每戶只得填寫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各一份，土地執照歸家庭負責人收執，土地執照存根歸縣政府存查。如一户分有土地，其地段在四段以上者，方得另行填寫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

(五) 土地面積單位，以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公佈之尺度爲標準計算，即一垧十畝，每畝三百六十六平方弓或九千平方市尺，各地尚未採用者，應一律改用此標準。

(六) 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字號以縣爲單位，結以「土地還家後，致富靠勸勞，大家多生產，前方打勝仗」廿個字編排，每字排至一萬號爲止，共計可發給二十萬戶。

(七) 在土地執照頒發後，各省、市、縣應將全省市縣土地種類（旱、水、菜田等）及等級彙集

統計最遲在本年十月一日以前呈報東北行政委員會備查。

(八) 在土地執照頒發後，如女子出嫁或分家，或土地轉移買賣等，准予分領土地執照。

(九) 每份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收費二千元，由縣政府代收，交省政府轉東北行政委員會
(十) 本辦法有未盡事宜，得由東北行政委員會命令修改之。

關於填寫土地執照說明

(一) 應先將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所需填寫內容，研究妥當後，再動筆填寫，以免錯誤

(二) 填寫最好用毛筆，或用鋼筆，絕對禁用鉛筆，以免模糊。

(三) 字跡要清楚工整，不要潦草，並將所有的項目全部填起，不要遺漏。

(四) 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所編字號，應當一致，所編之字號，以縣為單位，統以「土地邊家後，致富靠勤勞，大家多生產，前方打勝仗」廿字為標準，每字編至一萬號，如「土字第一號——土字第二四五號——土字第一〇〇〇〇號」下邊字號，便應改為「地字第一號」，以此類推。

(五) 關於土地執照及土地執照存根內容，應注意之點：

1、「戶主姓名」係指該戶出名負責人，如「王金才」。

2、「全家人口」係指全家人口數目，如「五口人」。

3、「住址」在此欄內，不要再寫縣名，只寫「區」名，如「寶山區」。「村」係行政村

，如「東沈家店」。「屯」係自然屯（或自然村），如「房身溝」。

4、「共有人姓名」係指將全家分得土地人名都寫出，如「王金才、王李氏、王大柱、王二柱、王小丫」等。

5、「地段」係指該戶分得第幾段地，如「第一段」「第二段」等。

6、「座落」係指土地的位置，如「村東」「崗上」。

7、「地號」係指該段地在全村中所編的號數，及該段地的好壞，如「甲等第九號」「乙等第十六號」。

8、「種類」，如「旱田」「水田」「菜地」等。

9、「畝數」係指該段地畝數，畝的大小，應以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公佈的尺度為標準計算，即每畝三百六十平方弓，或九千平方市尺，十畝為一垧，十分為一畝，分以下四捨五入。

10、「四至」係指該段地之邊界，如東至「道」西至「張姓」等。

11、「共計」係指所有幾段地共計有多少垧多少畝多少分。

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在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作用

陝甘寧邊區所處的環境在一個時期內還使我們不能採取真正現代化的農業技術，但是我們不能在現在比較落後的技術基礎上，把邊區的農業生產力大大提高一步呢？一年生產運動的經驗證明了這是可能的。我們先把若干鄉村去年的收穫和前年的收穫作一個比較吧。延安縣吳家棗園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一百四十一石五斗，一九四三年是二百五十六石七斗五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安塞馬家溝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八十三石七斗，一九四三年是一百六十六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淳耀白碾村一九四三年的收穫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二百石，每畝比鄰村多收七升至一斗。延安念莊的變工隊一九四三年收穫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幾乎一倍。華池城壕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一百七十石，一九四三年是二百八十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上面這些村莊都是一九四二年未實行勞動互助，一九四三年實行了勞動互助，而且實行的比較好，因此大大地提高了生產（註十六）。

我們再把實行了勞動互助和沒實行勞動互助的個別農戶來比較一下。延安縣念莊，變工的農戶十二個，全勞動力六頭牛，收糧一百二十五石四斗，未變工的農戶二十三個，全勞動力十頭牛，收糧一百五十八石，按勞動力平均，相差百分之六十多。

再根據延安縣南區區長估計，去年全區收穫為二萬〇九百石，其中因為組織變工、札工多收可五千二百九十石糧食。又據新正縣三區二鄉鄉長估計，全鄉因為組織班子去年可多收糧四百餘石。

上面所引的村莊絕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從任何方面都證明，只要真正組織了勞動互助就可以或

多或少的增加糧食，組織的越好，增加的糧食越多。

爲什麼一實行勞動互助就能多打糧食，勞動互助有甚什麼好處呢？

第一、實行勞動互助的時候有許多人、牲口同時在一個地點勞動，能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十個人一集體勞動，在同樣長的勞動時間內就能作出十三、四人的活來，就是說提高百分之三、四十的勞動效率。這是由於下面的一些原因：

(1) 許多人在一起鋤地或是幾頭牛在一起耕地就能提高勞動情緒，人和牲口都不肯疲乏，又能互相督促和引起他們的競爭心。一個人或是一頭牛做活的時候，吊吊搭搭，無精打彩，不久人也困了，牛也乏了。若是人和牲口一多，人有說有笑，手底下自然快起來，牲口也精神起來。一個跟上一個，誰也不肯落後，暗地裡就互相競賽起來。例如關中的唐將班子發明了「裝口袋」，「吃地球」等等個人競賽辦法，誰落在後面，就要被衆人嘲笑。人一多又可以互相督促，所謂「三懶一勤，想勤不得勤，三勤一懶，想懶不得懶」，所以這時候勞動強度的增加是自然而然的。

(2) 做起事可以「趕急」，「不違農時」。無論是播種、鋤草、收割，都需要在一定時機進行，不然莊稼就受損失。集體勞動的時候，人力就可以得到調劑，可以集中力量鋤草大的地，或先收熟了的莊稼。這樣做得又快，莊稼又好。

(3) 人力和畜力能得到適當的搭配和發揮，例如一頭牛播種需要兩個人，兩頭牛分散下種需要四個人，但若是集體勞動三個人就够了。五頭牛分散下種需要十個人，若是集體勞動七個人就够了。這時候七個人就可以做十個人的活。再例如用牲口送糞，分散勞動的時候一個人只能吃自己的一個牲口，若是集體勞動一個人就可以吃三、四個到五個牲口。這時候一個人就可以做五個人的活。

(4) 集體勞動可以把人分開担任不同的工作。例如扎工和唐將班子有的是由一個技術好的人專門修理全部的工具，還有的在開荒時候抽出兩個人專門刨梢。這樣的分工也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5) 集體勞動人們可以互相幫助，消滅勞動力強弱的差別。例如幾個好的勞動，夾雜上一兩個較弱的勞動力，大家稍為幫助一下，就可以絲毫不影響全體的勞動效率。

(6) 集體勞動還有許多其他可以提高勞動效率的地方。例如五個人收割，每人割一小把，當時就可以合起攪成一大把，不必像一個人收割的時候那樣必須一小把一小把放在地上然後再收一遍。許多人裝車裝牲口就可以省下牲口和大車空等的時間。許多人同時鋤草可以一下把草鋤光，不像一個人鋤一大片地，鋤到這邊又荒了那邊。

總之，勞動互助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它能把多數的人和牲口集合起來，發揮「單純合作」的作用。同樣的人力、畜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之內就能得到更大的結果。

第二、實行勞動互助可以把人力和畜力都用在有效的勞動上，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浪費的時間，也就是實際延長了有效的勞動時間。例如一個人上山勞動，往往是吃過了早飯才去，到了山上一片一大片地，嘆口氣，休息一會，東看看西望望把時間都浪費了。午上又要回來吃飯，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回來了。農人家裡都有些瑣碎事情，有的時候一就誤一天就不上山了。若是集體勞動，人們都覺得這麼多人同時勞動一定要時間抓的緊些，往常一個人就誤點工夫不要緊，人多了就就誤不起（給誰家勞動的時候，那個主家特別是這樣感覺，所以他也特別操心）人們互相促，早早就上山了。所謂「三早折一工」能多做出很多活來。早飯和午飯都是送上山去吃，省下了來回走路就誤的時間（所謂「人多下苦下在山上，人少下苦下在路上」）。平常送飯，一個人勞動要一個人去送，十個人勞動要兩個

人送也就算了一個人勞動，休息的時間沒有一定，集體勞動有人負責，休息的時間也縮短了。晚上，剩下一點地，每人多鋤幾鋤頭也就完了。所以回來的也晚些。再則大家變工不能因為家裡有一點小事就不去給人家運工，因此，勞動互助的結束是上山早，回的晚，休息時間少，少跑路，少誤工，實際上延長了有用的勞動時間。

此外，勞動互助可以省其他方面的許多浪費的時間。例如許多變工隊把全體隊員要辦的瑣碎事情，買東西等工作交給一個半勞動力代辦。變工輪流在每家吃飯又節省下婦女作飯的時間，可以讓出婦女們的時間做其他工作。

第三、實行勞動互助的結果可以造成真正群眾的普遍的勞動熱潮，不但能把全體農業勞動力吸收與組織到生產中來，而且能推動許多半勞動力和迄今還站在生產戰線之外的勞動力，把他們也吸收與組織到農業生產中來。

凡是成立了勞動互助的農村，農民已不是一戶一戶各不相關地孤立勞動，而是成爲了一個有組織的勞動隊伍，爲着一個確定生產任務而奮鬥。黨和政府提出的生產號召生產任務經過勞動互助組織更容易貫徹到底。生產中的積極分子和勞動英雄更容易實現他的領導與推動作用，農民更容易相互學習生產技術和交換生產經驗。分散勞動的農民有很深固的保守觀念，不肯採用新的農作方法和新的技術，但是在組織起來之後，就能打破這陳舊的保守觀念，使他們接受新的農作方法和新的技術。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把參加生產的勞動力組織起來之後，就能刺激與推動了迄今還未參加生產的勞動力和半勞動力。把他們也捲入生產的熱潮中間來。在去年的生產運動中間有無數這樣的例子。

在赤水、新正、吳旗、曲子、志丹、定邊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出現了許多婦女的開荒、鋤草的班子和變工隊。例如赤水的一區四鄉有三個婦女開荒班子，赤水要險村有兩個婦女開荒班子共八個人，兩個班子互相競賽，有的婦女每天能開荒五分。同宜耀的二十八個婦女開荒八十五畝半，淳耀的三十八個婦女開荒七十六畝三分。新正的十九個婦女開荒四十二畝半。吳旗縣有七個婦女鋤草變工隊共六十九人，志丹縣的婦女鋤草變工隊有的還向男子變工隊提出挑戰。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有些婦女還在給變工隊作飯、送飯、喂牲口等等勞動上進行了變工。在秋收的時候除個別地區外大多數的婦女參加了秋收勞動。

其次，各地還出現了許多老漢和娃娃的變工隊。開荒運動中在各地會有六、七十歲的老漢和十幾歲的娃娃參加開荒，例如新正一區九鄉七十八歲的王老漢開荒三畝，淳耀六十九歲的董德寶開荒十四畝，新正十一個娃娃開荒三十六畝，延川永遠區三鄉三個娃娃的變工隊開荒十五畝，固臨安泰區孟家村七個娃娃的變工隊開荒四十畝。

再在鄜縣、同宜耀都出現了商人的開荒變工隊。同宜耀衣食村的商人說：「若要發，買賣兼船隊。」八十個商人開了一百八十六畝半荒地。甚至連廟官、瞎子（慶陽）都參加了開荒運動。

最後，各地還出現了許多二流子參加勞動互助因而轉變並成為變工隊的隊長和組織二流子變工隊的例子。延川的四百六十五個二流子中參加變工的八十三人，參加札工的三十二人，同宜耀衣食村的一個二流子班子開荒四十七畝，並不比一般勞動力量差。有的把甲村的二流子編到乙村的變工隊，乙村的編到甲村，以免他們回家偷懶（靖邊），有的把二流子編入變工、札工後減少了大家在地裡的牽掛，免得二流子偷東西和到婆姨家裡踫躑（志丹）。

總括以上，勞動互助的好處就在於它能提高勞動效率，延長有用的勞動時間，組織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到生產中間來。這樣它不但能解決地廣人稀地區一部分勞動不足的問題，就在勞動力不缺乏的地區，它也能使得農民有更多時間來擴大耕地面積（開荒），改良農作方法，興修水利和經營副業。

我們下面再引證部分材料來具體說明勞動互助在去年生產運動當中的開荒，改良農作方法和經營副業上的作用吧（註十七）：

關中分區的報告上說：「關中分區今年春耕任務能夠順利完成並在開荒中超過計劃，勞動組織之充分利用與改造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例如「……新寧五區四鄉未組織前四十天只開了七十畝荒地，幹部只每天空喊『都開，都開！』，之後，組織了十三個搭工，參加的一百六十一人，六天就開了四百六十一畝！」安塞縣原計劃開春荒四萬畝，結果開了七萬三千畝，據縣委的報告說：「本年全縣開荒超過原計劃之一倍，是因為有效地組織了變工隊，提高了勞動效率和熱忱」。再例如合水縣自三月至四月底全縣只開荒一萬〇六百五十三畝，五月一日以後只十一、二天內因為切實地組織了勞動互助就開荒一萬三千七百〇一畝。吳旗縣去年秋開荒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三畝，就因為該縣廣泛組織了「請牛對」、「合牛對」、「變工等等勞動互助組織」。

各地去年的春耕和秋收，凡是組織了勞動互助的地方都能提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間完成，材料再不多引了。

在荒地缺乏的地區，提高收穫量主要的方法也是更好地組織勞動力使農民有更多的時間來改良農作方法。例如淳耀白塬村去年每畝比鄰村多打糧七升至一斗，據勞動英雄石明德說它的原因是：因為

全村搭工所以能，一、去年（一九四二）全村實行了秋翻地，二、今春墾畔一律刈光，三、所有莊稼一律鋤草三遍。赤水的勞動英雄陳德伯說：「變工的好處是可以多耕、多鋤、多上糞，所以別人的地打三斗，我的地能打五斗。我村的變工隊會和不變工的鄰村梁五地村比較過。我隊有十六個勞動工，十多頓半牛。梁五地村有二十四個勞動工，二十頓牛。我隊鋤麥三百六十畝只七天，梁五地村鋤一百八十畝用了十三、四天。我隊鋤秋田三次，有一次六天就鋤了一百八十畝，梁五地村七天才鋤了一百一十畝。種麥的時候，我隊六天種了三百五十畝，梁五地村十二天種了五百畝。收秋的時候，我隊八天收了二百四十畝，梁五地村十五天才收四百畝」。華池勞動英雄張振財的城壕村變工的結果，除開蓋地二百畝之外，比去年地多翻了一次，多鋤一次草，還抽牲口運了兩次鹽。

爲了證明勞動互助在改良農作法和發展農村副業上的作用和勞動互助在地少人多的地區也需要提倡，我們摘引一段去年十月十八日解放日報登載的米脂一個變工隊的報導：

米脂七里廟的模範變工

七里廟，位於米葭大路兩旁，居民較分散和貧苦，共五十一戶，全勞動力四十個，半勞動力四個（十七個無地種南下跟工的全勞動力在外），耕種土地五百一十二畝（其中租地三百零六畝），每人平均地二畝半，每勞動力平均種地十二畝，不够種。耕種共二十一頭。土地分配較平均，種地頂多的只一戶，耕種四十二畝，其他皆十來畝左右，因此外出跟工、打短者很多。

變工隊，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勞動力參加，甚至有早在五、六年前就一起變的，但那多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活變。經過今年政府的動員組織與領導後，該村變工隊已發展至百分之九十

六以上，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參加變工的耕地面積四百七十九垧半，耕驢十九頭，變工的方式已由自流的活變轉為有組織、有領導的固定變（一年變到底）。現在不參加變工隊的只有高照光（村主任事忙，全勞動）與李生章（有病，半勞動）二人。共耕地三十三垧，耕驢三頭。變工之後有些什麼好處呢？僅就這半年來說：

（一）農作法的改進。以整地與播種穀子來說明，三十一年安穀八十二垧，壕穀七垧，撒穀四十三垧，溜崖三十一垧，拍畔三十六垧，打水窖四十八個；三十二年則安穀一百零八垧半，壕穀三十二垧，撒穀二十四垧，溜崖五十五垧，拍畔四十四垧，打水窖一百零四個。

夏耘上也比較細法了。在總耕地中除百分之十的冬麥外，其他田禾（穀、黑豆、高粱等）百分之九十以上能鋤到四次，而在去年則鋤三次的較為普遍。今年所以能夠這樣，是由於變工之後「人手寬套」了。農民們說：「四個變工、一早就省出三個送飯工，傳家的雜活（澆水、掃澗）還都誤不了，三早就頂一工哩」。而在生產效率上也提高了，如集體勞動「紅火」（熱鬧），情緒高：「不怕狼」，可晚歸，互助「協驢」（督促、競賽），捎帶的也把一垧地鋤過了等都是事實。

（二）剩餘勞動的盈利。二十一個耕驢中有七個經常走米脂城、桃鎮等地馱販炭，都是一天來回。變工之後，可保證每裏都去馱，每月馱六次，今年九個驢共馱三百二十九次。每次除來往盤費外，可賺一百五十元，共可賺四萬八千六百元，其他零碎馱販及捎驢馱炭節省的人工尚不計在內。

有十個人，變工之餘出外跟工，打短共二百九十天，賺二萬七千元（還有一個腳戶變工隊

收入沒有計算。

總合起來，根據這個不精確的統計，僅此半年當中（從三月組及變工隊至七月底），由於變工的结果獲利額外（土地之外）盈利近九萬元。因此在變工隊的會議上，隊員們說：「公家真爲咱想，咱們把這好處吃清了（明白了）、這半年總賺了九萬元」。

現在來看一個好的變工隊是怎樣變的吧！

李善珍隊：共八個人，耕地九十五垧，耕驢三頭牛（計李善珍地十二垧，善玉地十垧，驢牛頭；善來地十三垧，驢一頭；善開地十垧，善鈞地十六垧，驢一頭；善久地十四垧；高照亮地十垧，驢一頭；姜汝華地十垧）。

他們是併地種，卽把地打散，作完一家的再作一家的，或者誰家急切就作誰家的，以一工還一工計算。給誰家種，早午飯即在誰家吃，早起留一個人在家等飯，稍帶把上山人家的水擔下，其他都上山（地多時八人一起，地少時分爲二組）。在耕作上，他們採取「化零爲整」與「化整爲零」的競賽方式，如在鋤草時，遇上圪梁或零塊的坡窪地，就把幾人分散，從地邊上開始，吃飯時集中到山頂，看誰在先，誰落後，而遇到大塊較平的地時，則並排着鋤，互相「協矚」，鋤得很快，這是競賽的方法。從二月到現在，他們得到的成績如下：

（一）農作法的改良：

（1）人工掏地，衆人稱他們爲「鏟頭工」，穀地差不多都是掏的，因爲人工掏地掏的深，比牛耕強，去年八家中只掏地兩垧（李善珍），今年共掏地十四垧半，增加了七倍餘。

（2）整地：

一、溜崖：去年三垧半，今年十四垧；

二、拍啤：去年二垧，今年九垧；

三、搖坨楞：去年無，今年九處；

四、打水窖：去年無，今年二十五個；

五、打水溝：去年的老水渠不計，今年的較大的水溝有三十九道。

(3) 播種的細法：以三十一垧穀地來說，去年撒種五垧，今年只撒種一垧，其餘皆安種。

(4) 多鋤一次草：除十八垧麥地外，鋤過四次的有四十三垧，三次的有二十七垧，種完老麥以後，一齊鋤完四次。

(5) 增加了肥料：單說十八垧麥地，去年上大糞六十六擔，乾糞一百六十九袋，今年上大糞八十一擔，乾糞一百八十四袋。他們本來牲畜很少，爲什麼反能增加肥料呢？主要是靠變工所省出的剩餘勞動打短或馱販炭賺的錢，在城裡購買，一年光買糞錢花了二千三百元，其中只有李善珍從家裡補了一斗老麥。

(6) 現在他們已把十八垧麥地糞都送上，計劃種完麥後，把三十一垧穀地被蟲蝕的糠根挖掉，並翻秋地十三垧，以防來年害蟲繁殖。

(二) 餘工盈利：

春耕完後，四月間。抽出三個人出外跟工，未種完的莊稼（糜子、洋芋），留給家裡的人去

料理。

李善珍，出外燒一個月石炭，賺二千七百元。

姜汝華，出外包一月工，賺二千二百五十元。

李善開，出外蓋橋一月，賺一千三百五十元。

在家的五人，除負責料理各家的莊稼外，有驢的如李善鈞，善來，高照亮，還「吊打」的去馱炭竈，每人馱了十二次，共賺一萬元，馱時多半是稍馱（一人趕二驢）可節省一個人工，（稍一次還工半天）。最近因種冬麥和快要收秋的原故都在家裡，李善珍集合了四人向該村石炭竈以二千四百元包了十四個工掏土，但四個人四天就完工了，集體勞動的結果又省出六個工來，每人賺到三百元的工價，而節省的工就以原工價一百八十元計，最低限度又可賺一千二百元。

合算起來，只半年工夫，眼看到的這八個人共得到二萬二千五百元的收入。若將新增的地也折成價，則將多有萬餘元的收入，無怪他們變工愈變愈起勁，衆人愈看愈眼紅了！

去年邊區的生產運動證明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中心關鍵是組織勞動力，而組織勞動力的首要工作和最有效的辦法又是組織農民的勞動互助。經過勞動互助就可以發動農民的普遍生產熱潮，造成真正群眾性的生產運動，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到生產戰線上來。這樣就可能多開荒地，多耕，多鋤，多施肥，改良作法，興修水利，以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這是在今天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力必須遵循的道路，不但這樣，由於勞動互助的發展造成了我們進一步改良農作方法，增修水利，使用比較進步的工具（如風車、水車、樓等等）的可能與便利，給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註十六）上述的村子有的去年增加了幾個勞動力，有的未增加反減少了幾個，去年天年不比前年好，所以實行勞動互助是增加產量的主要原因。

（註十七）勞動互助在修水利中的作用已見上節。

幹部學習文件

晉西北學委會編
晉綏大眾報社出版

一九四九年五月

幹部學習文件目錄

- 一、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導……………新華社
- 二、目前形勢與任務……………任弼時
- 三、爲什麼革命要寄託於無產階級……………聯共黨史
- 四、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 五、論農業合作社……………列寧、斯大林
- 六、論社會主義經濟與工業化……………斯大林
- 七、論合作社……………列寧、毛澤東
- 八、論組織起來……………毛澤東
- 九、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中共東北中央局
- 十、提高農業生產技術與組織農村人民的合作互助……………新華社
- 十一、論新經濟政策與國家資本主義……………斯大林

附：其它幾個參考文件目錄

毛主席：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第六和第七部份）

毛主席：論聯合政府（「我們的一般綱領」、「土地」和「工業」部份）

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上講話（第五部份）

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工商業政策和知識分子與開明士紳問題部份）

新華社：農業社會主義問答

以上文件容易找到，故不翻印

晉西北學委會編印 五月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決定

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

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石家莊附近舉行，會議經過八天，業已完滿結束。全會到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缺席者二十人。毛澤東主席向全會作了工作報告。全會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認為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全會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全會並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以爲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舉

行和平談判的基礎。

2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着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

全會指出：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人民革

命鬥爭的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黨在毛澤

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執行了這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歷史已經

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並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

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從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

。毫無疑問，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

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的工作重

心必須放在城市。全會指出：我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

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人民的鬥爭時，黨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

結其他勞動羣衆，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和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自

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綫上，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

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

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

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建設工作，工會工作

和各種民衆團體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等工作，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

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麼，黨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中國共產黨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作為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本力量；同時，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與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共同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從而創造條件，使中國有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二中全会號召全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立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無原則的遷就主義的態度，又要反對妨礙黨與黨外民主人士團結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的態度。

鑒於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不久就要到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特別警戒全黨同志不要驕傲自滿，不要被人們的無原則的捧場所軟化。全會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

4

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勢力之後，用更大的努力來建設一個新中國。全會認為：中國的經濟遺產雖然是落後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加上以蘇聯為首的強大的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綫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對於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目前形勢與任務

——任弼時同志在四月十二日全國團代表大會上

的政治報告一部份——

目前時局的特點，就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力量已經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戰爭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時間，人民解放軍就可以在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要用最後的努力來實現這一全國勝利，同時又要更大的努力開始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個建設的首要工作是恢復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特別是工業生

產，以鞏固中國的獨立與統一。

代表封建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反動集團——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日時期，想借日本法西斯的力量來達到他削弱和消滅八路軍新四軍的目的。它對反共是積極努力的，而對抗日則是消極的，借抗日之名以積蓄力量來進行反人民的內戰。這與全世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意圖相吻合的。但是國民黨借日本的力量來消滅八路軍新四軍的希望並未能實現；八路軍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大眾的擁護之下，成了中國人民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堅（沒有它中國早就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自己。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帝國主義幫助之下，終於發動了全面的內戰。在戰爭開始時，國民黨共有陸海空軍兵力四百三十萬人，而人民解放軍當時只有一百二十八萬人，既沒有空軍海軍，大砲也為數極少。國民黨滿以為依靠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各種幫助，一定可以獲致勝利，並曾預計在三個月或是半年之內可消滅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雖佔劣勢，但是執行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因而受到人民擁護的人民解放軍，與全解放區和全國人民的努力相結合，經過一年艱苦的防禦戰鬥之後，在戰爭第二年的開始，即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就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國民黨反動軍隊則由進攻轉為防禦。這是一個帶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從此，解放軍除大部收復了在第一年所失去的土地、城池之外，並且把戰爭引到長江以北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從繳獲中

培養了自己的砲兵，建設了自己的工兵，因而也就能攻克一批中等城市，如石家莊、四平街、洛陽、隰縣、開封等；解放軍的戰鬥力和軍威大為提高了。

到了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不僅在質量上是國民黨反動軍隊不可比擬的，而且在數量上也超過了國民黨反動軍隊。到現在為止，在兩年零九個月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共消滅國民黨反動軍隊四百九十五萬人。現在的國民黨反革命軍隊已經由四百三十萬降到只有一百一十萬戰鬥部隊及數十萬後勤機關部隊，這些殘餘的戰鬥部隊中許多是經過一次或一次以上消滅後補充起來的，戰鬥力既很薄弱，而且散佈在迪化到台灣這一非常寬廣的區域之內。人民解放軍則於同時期內由一百二十八萬增加到三百萬人以上，其裝備則毫不亞於美國裝備的國民黨的最優良的陸軍。

與軍事勝利發展的同時，解放區的地域與人口也擴大與增加了。據三月初統計，現在解放區的面積有二百六十萬一千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七。整個東北和幾乎是整個長江下游和中游以北地區，都已被解放。解放區的人口已達二萬萬以上。在包括一萬萬人口以上的地區之內，已經澈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在這種地區內，過去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都獲得了土地，地主階級當作一個階級來說是已經被消滅了。在廣闊的解放區之內，並相當的輕重工業、鐵路運輸的基礎，有極重要的戰略性的資源，如煤、鐵、糧食、棉花、鹽、煤油、木材等。分佈在這一廣大的解放區內及三百多萬軍隊中，有三百萬共產黨員，在解放區內有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婦女、青年等羣衆組織及民兵

組織。解放區內工業農業正開始恢復，金銀物價也比較國民黨區域為穩定。共產黨在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大為增加，人民勝利的信心非常堅強，解放軍的士氣甚為高漲。人民力量的勝利發展，亦即國民黨的失敗與縮小。隨着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也日益土崩瓦解起來。發行不久的金圓券，已經降到偽法幣的地位。美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人民面前，達到從來未有過的孤立。一切過去運動搖着的中間力量，現在已經更加靠近於人民方面。總而言之，人民的力量與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對比，在最近一年之內是起着對人民方面絕大的變化的，經過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經在基本上被解放軍所打垮。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援助，也不能改變國民黨滅亡的命運了。

最後肅清國民黨存留的反動軍事力量和統治機構，使革命在全中國獲得徹底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目前應當繼續努力不可鬆懈的工作。解決這一問題可採取下列方式：一種是繼續以戰爭的方式，就是所謂天津方式，在半年到一年之內，全部殲滅這一百多萬國民黨反動軍隊；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那人民解放軍是完全有把握做得到的。全中國以至於全世界的人們，連國民黨反動派在內，都會相信這一點。另一個是按照毛主席在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國民黨反動軍事力量和統治機構，就是所謂北平方式。這種方式雖然沒有如天津方式那樣乾脆痛快，那樣能迅速達到徹底改造的目的，但是可以避免破壞和人力物力的消耗。

對於這兩種解決中國殘餘反動勢力的辦法，我們歡迎第二種，但同時必須準備第一種，而且只有痛擊一切反抗和平解決的部份，才更易於爭取用和平方式來徹底解決中國問題。但不管用那一種方式，我們都要努力使南京政府迅速交出自已的權力，以便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產生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中央政府，實現中國的完全解放與統一。由上述情況可以看見，我們離着全中國勝利的時期已經不遠了。這種勝利對於中國和世界都具有極爲重大的歷史意義。這對世界民主與反民主力量的比重上，會產生有重大意義的變化。然而我們要認識毛主席關於「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個指示的深遠的意義。要懂得在軍事上完全打敗國民黨反動軍事力量，在政治上完全摧毀國民黨一切反動統治機構，這是完成了中國的統一，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但這還不等於中國就已經最後地達到了完全的獨立自主。毛主席着重指出說：「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集中表現），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了，經濟上完全獨立了，才算最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根據毛主席的估計，「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

大約是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這百分之十左右的工業，因為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的影響，相當部份已被破壞。我們要使中國在經濟上達到完全獨立，則不獨要努力爭取被破壞的工業能够在三年五年內恢復，而且要有計劃地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內，使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由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重，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比重，使中國有相當強大的機器製造工業，生產大量為發展工礦交通業所需要的機器和車船，而且要達到中國自己的工業能够生產國防所需要的大砲、坦克以及飛機等。到了那時，才可以說中國不僅經濟上達到獨立的地位，而且在國防上也具備有足夠力量來保護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邊疆。只有工業發展起來，生產技術隨着提高，生產成本日漸減低，能出產極大數量的成品，才有可能逐漸提高工人階級自己和生活水平，才更能鞏固工農間的聯盟，真正發揮城市領導鄉村的作用，才是替將來轉向社會主義打下了強固的經濟基礎。

在恢復和發展工業，努力使中國達到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首先使帶着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營企業獲得迅速發展的一切條件。為此，我們必須把可能積累的資本，多多地投入國營公營企業裏去。我們必須改造從國民黨反動統治、官僚資本手裏接收過來的企業，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東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創立新的適用的東西，使企業管理、勞動組織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舊有技術幹部，只要他們能改變對工人階級的認識和態度，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是應當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歡迎的。更為重要

的，我們要從熟練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中有計劃的培養出大批的技術幹部；沒有大批的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優秀的可靠的新培養出來的技術幹部——各種工程師、技師……，那就不要設想能够把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在恢復和發展工業中，對於一切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私人企業，應當允許其存在與發展。黨的這個政策，是在中國的條件下完全必要的。私人資本應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使它走出國民經濟需要的軌道以外，但懼怕私人資本的發展，因而加以不適當的限制，也是不對的。

由於戰爭迅速勝利發展，不僅使過去被敵人分割的解放區打成爲一片，而且有了大批的和大批中等的城市，還有大批城市很快就要解放。在這些城市中及其周圍，集中有許多工商業和學校，各個城市之間，有鐵路和空運連絡着。這種形勢，在中國人民和共產黨面前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農村移到城市的新方針。過去由於城市被強大的敵人所盤踞，我們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發動農民進行削弱封建（減租減息）。直到消滅封建（分配土地）的鬥爭，組織軍隊，用農村來包圍城市，然後去奪取城市的政策，事實上證明了是完全正確的。相反，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存在過的只搞城市忽視農村的觀點，事實上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現在新的形勢提出了新時期的任務和工作重心，過去以農村爲重心的時期已經結束，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來領導鄉村的新時期。我們向長江以南進軍時，也會是先到城市，然後向農村開展工作。因此我們必須學會管理和建設城市，學會在城市中組織領導、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

爭取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與我們一道去和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鬥爭。我們要把城市的文化教育工作恢復、改革和建立起來，使大批學校能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培養大批有用的人材。城市工作的中心環節，就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一切其他工作，都應當是圍繞着這一中心工作並為它而服務。如果我們進到城市，不去依靠工人階級，不去以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為其中心的工作，而去依靠貧民或其他階層，忙於其他的比較不關重要的活動，那一定會要使全盤工作受到損失。

我們說，工作重心現在應該由農村移到城市，應該抽調一定力量來加強城市工作，但如果因此而丟掉農村，把鄉村工作力量都移到城市裏來，那也是錯誤的，也是必須防止和要反對的。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很好的結合起來。中國人口絕大部份是住在農村，他們中有許多工作要做，就是為着要發展工業，也必須使農村能夠供給大量的原料，如棉花、大豆、花生、菸葉、麻……，須要農村供給城市大量的糧食。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在數量上既然佔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九十，這就說明在今天我們還要依靠農民大量生產糧食和原料。解放區農村的封建勢力已被肅清或正在肅清中，農業生產力有發展的充分餘地。我們而努力去領導農民提高農業技術，改良水利、種子、肥料等，來大大提高農產品的生產量。在農村中要去組織大量的農民認為需要的生產的、消費的、供銷的合作社。我們要大大提高農業產量，還因為我們要利用它來與外國交換為着恢復和發展工業必需的機器。此外，我們還要在農村中努力做提高農民文化的工作。上述這一連

中的農村工作，須要獲得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指導和幫助，須要共產黨堅強的領導和
努力，才有可能把它做得好。

如上所述，我們雖然接近於全國的勝利——這也還要不驕不躁的認真努力，克服困難才能完成——，然而要使中國達到完全的獨立自主，則還須我們作極為重大而艱苦的努力，一切以為革命快勝利了，可以安閒起來，或者以為已經艱苦奮鬥了幾十年，已經為人民盡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現在可以享受一下了，這些想法應當認為都是不健康的。要知道建設比破壞要艱難得多少倍。一個革命的政黨，如果只會破壞舊的，而不會建設新的，如其不能建設起新的，確實使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比以前在舊社會裏要過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會由不滿而反對她的，而她也終於要走向失敗。因此要認識在全國獲得勝利之後，還必須以同過去一樣的努力，保持那艱苦奮鬥、勤儉樸素的作風，要準備節省每一個銅板去為新社會經濟的建設而積累一份力量。只有這樣再努力十年到十五年，那時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勝利是最終的鞏固起來了；那時我們有可能和人民一道，過着更加充裕，更加文化的生活。

我們的前面還有如此艱鉅的任務，而舊社會交給我們的遺產又是如此貧乏與落後，雖然如此，我們絕不能因此發生任何的悲觀。在具有如此勇敢、如此勤勞的四萬萬幾千萬人民力量的基礎之上，有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的領導；加上蘇聯和世界各地各國無產階級的幫助，我們有根據相信中國的經濟建設比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發展會要

更爲迅速的

現在的國際形勢是：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綫日益強大。蘇聯及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工業經濟，都已恢復甚至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也日益改善。全世界民主陣營的力量，顯然超過了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的力量。而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反民主陣綫則日益困難起來。戰後稱爲「強大」的美帝國主義，雖在努力用造成新的戰爭恐怖的方法，爭取儘量推遲其國內經濟危機之到來，然而危機的徵象已在出現。美國援助蔣介石在中國進行的反共戰爭遭受失敗。中國革命勝利將要完全衝破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鎖鏈，東南亞幾萬萬人在中國革命影響下，正在進行着英勇鬥爭。美國在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把西歐的經濟引到了絕路，使受援助的國家對美國的附屬性越來越大，因此也遭受各該國人民的越來越大的反對。美國本國因經濟大危機的迫近，某些企業開始減縮，工人生活日趨降低，失業恐慌隨着增長，人民民主力量也逐漸加強。最近美國又在用北大西洋公約，將來還企圖要用什麼太平洋公約等辦法，來加緊準備戰爭，加強美國對於受一惠一國的控制，以求逃脫危機。然而全世界人民連美國人民在內，是不願戰爭到來的。只要世界工人階級與一切民主力量保持充分的警惕與努力，戰爭危機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帝國主義者真的挑動了戰爭，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也有把握戰勝並消滅帝國主義勢力。這一切都說明今天的國際環境，是極有利於我們中國革命鬥爭的順利發展的。一切過高的去估計帝國主義這個敵人的力量，而過低估計全世界人民力量的看法，是錯誤的。

爲什麼革命要寄託於無產階級呢？

雖然農民在人數上是佔優勢而無產階級在人數上是比較少，——可是，革命家却恰要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寄託於它的增長。

爲什麼恰要寄託於無產階級呢？

因爲，無產階級，雖然它現時人數尙少，可是它却是這樣的勞動者階級，這個階級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聯系着，——是與大生產聯系着，因此，它是有偉大的將來。

因爲，無產階級之爲階級，是逐年增長着，在政治上發展着，並且它由於大生產中的勞動條件之故，是易於組織起來，而它由於自己的無產者地位之故，乃是革命的階級，因爲它在革命中間所喪失的，並沒有別的東西，而不過是自己頸上的枷鎖。

而農民則不然。

農民（此地是指佃農而言。——「編者」），雖然它是人數衆多，可是它却是這樣的勞動者階級，這個階級是與最落後的經濟形式聯系着，——是與小生產聯系着，因此，它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偉大的將來。

農民之爲將來，不僅不增長着，而是相反，是逐年分解爲資產階級（富農）與貧民

（無產者，半無產者）。而且，它由於自己的散漫性之故，是比較難於組織起來，而它由於自己的小有產者地位之故，是不及無產階級那樣樂於走人革命運動的。

（摘錄自共黨史第一卷第二節）

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

中國無產階級中，現代產業工人約佔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城市手工業雇傭勞動者，約佔千二百萬，此外還有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有他的許多特出的優點，使他在中國革命中能夠成爲領導的力量。

中國無產階級有那些特出的優點呢？

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與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特別堅決和特別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又沒有舊歐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但須注意，中國民族改良主義有時容易在一部份工人中發生影響），所以除極少數的士族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

黨領導之下，成爲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性的階級。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於剛從農業破產出身的成份佔大多數），便利於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革命聯盟。

（摘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第四節）

列寧斯大林論農業合作社

列寧認爲：一般合作社，特別是農業合作社，乃是千百萬農民所易於接受和瞭解的由小的個體農莊過渡到大的協作的生產聯合——集體農莊的道路。

列寧指出：農業在我國之發展，應當是循着逐漸灌輸集體原則於農業——起初是在銷售方面，然後是設法道路前進，應當是循着逐漸灌輸集體原則於農業——起初是在銷售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前進。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之下，在保證無產階級以對於農民的領導之下，在社會主義工業存在之下，——正確組織起來的，包含有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這樣的工具，運用着這個工具，就可以在我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黨在這方面，是依據於列寧下列關於必須在農業中由小的農民的農莊過渡到巨大的勞動組合的集體的農莊的指示：

（一）「靠小農經濟是不能擺脫貧困境遇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二）「如果我們將照舊依靠小農莊而生活，那怕就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我們都會同樣不免於滅亡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三）「要農民經濟能繼續發展，就必須鞏固地保證那繼續的渡過，而繼續時渡過將不可免地是逐漸把最少利益的、最落後的、小的、單獨的農民的農莊聯合起來。組織公共的巨大的農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九九頁）。

（四）「只有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土地耕種制度優越時，只有能够利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那末，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够實在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有理，才能够實在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固地和真正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來和工業比較並指出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因本身零散而不

容許採用近代技術以致落後時，會着重指出：農業這樣值不得羨慕的情形，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威脅的狀況。

「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道，——就在於要以公共的土地耕種制為基礎來使小的和零散的農莊過渡到大的和聯合的農莊，要以新的更高的技術為基礎來過渡到集體的土地耕種制。出路就在於逐漸地，但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強迫方法，而是用表章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最小的農莊統一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協作的集體的土地耕種制為基礎，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聯共黨史莫斯科版三四四頁）

x
x
x
x
x
x
x

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我國，農業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因為，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之國有化這兩個原因，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在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發展，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列

寧在其論合作制的論文中，已正確指出：在我們俄國，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就是說，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最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才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各部門（如蘇、馬鈴薯、油類等等）為標準的組織，這些組織具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蘇聯總社包括有許多種蘇聯農民生產合作社。這個蘇聯總社供給農民以種籽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蘇聯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的巨大的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現在這裏說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是與紡織業生產——舉例來說——方面的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給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表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農業其他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將很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那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手段，無產階級執拿着國家政權，這裏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這無產階級具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必要的一切，以便經過合作社，而且只是經過合作社，——我們以前曾那視合作社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那視合作社，——這難道不是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然而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組織底新原則」和新一社會制度」。他繼續說：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一個階段底財政幫助。」「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會花費多少萬萬盧布的代價，這是不着提議的。現時，我們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須把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看作真正的幫助，就是說，如果把這種幫助看做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運轉，那還是不夠的，——須要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那有真正民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運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够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以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以便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上去。

（摘錄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與工業化

黨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本黨一般的政策，特別經濟政策，是不能使工業與農業分開的，必須使這兩個基本經濟部門照着互相融合的方向發展，以至於綜合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

從這兩條路線中，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這個方法要注意到努力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基本的農民羣衆也在其內。這些羣衆正是發展工業化的基礎。我們所講的，正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方法，而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就是要廣大勞動羣衆貧苦下去。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缺點呢？牠的缺點，就是使工業化的利益與勞苦羣衆的利益互相衝突起來，使國內矛盾劇烈化，使幾千萬的工農羣衆貧苦下去，工業利潤不用來改善國內廣大羣衆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而是輸出國外，用來擴張國內外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

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優點呢？牠有以下的優點：牠使工業化的利益與羣衆的利益聯合起來；牠不是使羣衆貧困化，而是改善羣衆的物質生活；牠不是

加緊國內的矛盾，而是和緩與消滅國內的矛盾，牠能不斷擴大國內的市場及其容量，於是給工業化造下鞏固的內部基礎。

因此，基本的農民羣衆，就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發生直接的興趣。

因此，在一般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上，特别是在工業化這個工作上，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現領導權的可能和必要。

因此，就產生了首先經過農民大批合作化，而實現工業與農民經濟密切的思想，即由工業領導農業的思想。

因此，就產生了我們賦稅政策，與其他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爲的就是保持工業的經濟合作，鞏固工農聯盟。

×

×

×

×

蘇聯無產階級與農民問題。黨認爲：「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保持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聯合，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保持領導作用及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本，第三三一頁）；在經濟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同樣在政治方面（譬如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都能够而且應當是農民羣衆基本的領導者；只有根據大多數農民羣衆（貧農、中農）物質生活之逐漸改善，才能真正實行國家工業化，這些農民羣衆是我們工業的主要市場，因此必須執行一種足以鞏固工業與農民經濟間聯合，足以保持工人階級與主要的農民羣衆間聯盟的

經濟政策（價格政策、賦稅政策）。

——摘斯大林「論反對派」一書

論合作社

(一)

列寧

著

(一九二三年作見於列寧選集第十七卷)

(前略)在事實上，國家對於一切大規模生產手段底掌有，國家政權底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個無產階級底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之聯盟，這個無產階級對農民領導權之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經合作社——而且單單經合作社——來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所必要的一切嗎？這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完成，但是這是為完成這一建設所必要而充足的條件(中略)

在政治上，我們將合作社安置在這樣一種地位上，就是一般說來，合作社不僅永久享有某種特權；而且這些特權必須是純粹的財產的特權(銀行利率等等)。我們必須以這樣的國家款項貸予合作社，這種款項，即是數額不大，但亦須超過我們所貸與私人企業的數目，超過那些即是從事經營重工業者的數目等等。

每種社會制度，都只是在一個一定的階級之財產上之財政上的援助之下而興起的。那一自由的「資本主義底產生所費的千百萬萬盧布這裏無需乎說到了。現在我們必須意識和見諸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必須特別加以協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但

是要在援助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上去支持合作社，換一句話說：將這一援助理解為對於種何合作社商業的援助，是不夠的；將這一援助應理解為對於這種合作社商業的援助，就是在這種合作社裏面確有真正的人民大眾的參加，對於參加合作社商業的農民給予一種獎勵，這是一種絕對正確的方式；但是全部問題的要點，却在於檢查此參加，檢查這一參加的覺悟程度，和這種參加的良好品質。嚴格地說起來，當一個合作社社員跑到一個鄉村裏去開辦起合作社商店的時候，老百姓是絕不會參加的；但是在同時，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計，却急於試一下。（中略）

如果在農民完全合作社化底條件之下，那我們便能够堅實地以兩足矗立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之上，至這種農民完全合作社化的條件，就包含有農民（而且正是由於在作爲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底文化水平在內，因爲如果沒有整個文化革命，那麼這種完全的合作社化，就成爲不可能的事情了。

論合作社（三）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講話

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力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羣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並大大發展了生產。在過去果

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在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生產關係，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扎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人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將來的中國經濟史中，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生產關係變化了；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全邊區現在有勞動力三十五萬個，今年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的變工隊扎工隊等的，已有三萬餘人，佔全勞動力總數十分之一。而臨時性的勞動互助，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還可發展。如果各縣經常的集體勞動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百分之二三，可達十萬人左右，再加臨時性的勞動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齐，還有半勞動力也參加組織，這將是兩支很大的勞動軍。

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帶着合作社的性質，比如一個連就是一個小合作社，一個旅就是一個大合作社。在各種部隊、機關、學校合作生產之中，楊家嶺運輸隊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楊家嶺運輸隊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個，照普通情形，每月最低限度應運回物品二十七萬斤，但實際運回的只有十九萬斤；經費開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今年一月，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運輸隊改爲運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後增爲二十頭）及全部用具作爲八十股；運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義作爲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二八分紅。一切牲口、人員、添置等費用開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決。替公家運輸物品，依照路程遠近，按斤給運費。運輸員的生活，由運輸合作社適當改善。這辦法經過解釋後，全體運輸員一致贊成。執行結果，運輸力由每月十九萬斤增爲三十八萬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過了普通的運輸力百分之三十；同時，大大提高了運輸員對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性，節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更加愛護牲口。比方過去裝糧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沒人管，現在運輸員隨身帶好針線縫補口袋；過去貪污馬料是公開的祕密，現在却沒有這種貪污了。過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壞，就要求公家補充新的，現在只要能湊合着用，就對付着用了。過去牲口過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喂好了。運費開支，改組後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過去除照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還每月獲利數萬元。

各機關採取這辦法後，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織合作社之前，每月運輸力只有一百二十萬斤，改組爲合作社後，每月運輸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社辦法是否可能以廣泛運用於我們的公營工廠及公營農場。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爲我們不是剝削人民爲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軍隊中，如三五九旅戰士的紡毛線，用柳榆樹條編成各種用具，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則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物品的需要，同時無異增加了戰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爲羣衆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羣衆，爲羣衆打算，把羣衆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想問題從羣衆出發，而又以羣衆爲歸宿，那就什麼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與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雜務人員着想。這種羣衆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破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爲羣衆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更好。我願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中的集體互助勞動是一種合

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稱爲連鹽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式樣的合作社都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羣衆就會變爲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下，也就能够克服了。

組織起來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會上的講演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從農民羣衆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羣衆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羣衆，根據去年冬天西北局所召集的高幹會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已經完全證明：高幹會的方針是正確的。高幹會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羣衆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羣衆工作一項本領，那麼，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人打垮。如果邊區去年以前的成績還不够大，還不够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麼今年

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每個戰士做到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廩，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呵！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上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分也學會了，其他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二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解決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和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的結果，歸於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南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

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清查了特務，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吳滿有一型的農業勞動英雄，趙占魁一型的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一型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還有軍隊中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沒有羣衆觀點，缺乏羣衆觀點，不依靠羣衆，不組織羣衆，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羣衆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綫，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幹會和今年的羣衆運動，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爲領導機關注意不够，對於羣衆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號的指示以後，各個地方也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是爲了支持戰爭，爲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爲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

戰爭環境，還不能說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羣衆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羣衆的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爲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一「扎工隊」、一「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是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羣衆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

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羣衆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羣衆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幹會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爲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羣衆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入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今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裏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羣衆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羣衆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羣衆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羣衆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羣衆的勞動。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羣衆組織生產，幫助羣衆總結經驗。以前，我們的許多同志也有孔夫子的缺點，孔夫子的學生問到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蔬菜的事情時，孔夫子就答不上來，我們

的同志也答不上來。但是我們的同志現在是學習了，他們答得上來了。他們就比孔夫子高明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羣衆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鑿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羣衆的創造力與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人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

問題，那麼，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麼，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推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地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用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分軍隊工作的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地方，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裏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

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對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已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个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

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羣衆，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把羣衆都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沒有旁的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組織。從前有個歌詞，說是：『狠，狠，狠，團體結得緊』。完全正確，只要我們善於組織，只要我們的團體結得緊，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什麼人也不能奈何我們，也不敢欺負我們的。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

附：關於勞動互助問題

——摘錄自毛主席論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關於勞動互助。這就是說，在一村之內，或幾村之間，不但每一農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種土地，而且於農忙時實行相互幫助。例如以自願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爲一組，有勞動力的出勞動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輪流的並集體的替本組各家耕種、鋤草、收割、秋後結賬，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農村

工價節給工錢，這個辦法叫做勞動互助，從前江西蘇區普遍實行的勞動互助社或耕田隊，就是用這個辦法組織起來的。人口密集的鄉村，還可集合多少互助組爲一互助社，組有組長副組長，社有社長副社長，組與組之間還可互相調劑。在必要與可能時，社與社之間亦可有些調劑。這就是農民羣衆的勞動合作社，效力極大，不但可使勞動力缺乏的農家能夠及時下種，及時鋤草與及時收割，就是那些勞動力不缺乏的農家，也可因集體勞動而使耕種、鋤草、收割更爲有利。此種辦法是完全有益無害的，我們應大大提倡。邊區有些地方已經實行的編工，就是這種辦法。各縣應以大力組織勞動互助社，大大地發展農民的集體勞動。此外還有一種扎工，也爲邊區農民所歡迎，其法不是勞動互助，而是一種趕農忙的雇工組織，也是幾個人或更多人爲一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體地作工，一家作完再往他家，亦能調劑勞動力。各地對外來扎工應予以幫助，例如幫助找工作，因天雨不能維持生活時酌予救濟等。

關於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邊區婦女雖多小脚，但仍然是僅次於男子的廣大的勞動力，她們可以參加各種輔助的農業勞動，如種菜、播種、鋤草、喂牲口、送飯、挑水、收割等，有些還能做主要勞動。她們過去已經相當普遍地參加，今後還應廣爲宣傳、勸告，發動她們的勞動熱忱，藉以增加農產。邊區黨的與羣衆的婦女組織領導機關的同志們，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感覺無事可做。其實她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應是研究與幫助邊區婦女羣衆廣大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使一切多少可以從事勞動的婦女都走上

生產戰綫，和男子一同解決增加生產的大問題。邊區還有很大一部分婦女沒有放腳，大大妨礙勞動生產，應用宣傳與強制兩種辦法，在數年之內，使她們放腳。今後無論何人，不許再為幼女包腳。

關於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此事在過去數年已有顯著成績，各縣在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後，二流子人數大大減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須在一九四三年用說服與強制兩種方法全部動員他們加入生產戰綫。這樣不但增加了勞動力，而且消滅了亂人壞事，取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社會的安寧。

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

封建倒了，土地分了，農村今後長期的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就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農業經濟。但發展生產的方向是什麼？究竟走一條什麼道路？我們有許多幹部思想上還不够明確。廣大農民則担心着許不許「冒尖」（編者按：冒尖係東北土話。許不許冒尖的大意，即許不許農民的經濟向上發展，在土地財產上有差別。）的問題，對自己經濟發展的前途，存在不同程度的顧慮。

有的同志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問題上，表現了平均主義的思想，把農民在鬥爭封建時要求平等劃一的思想（實際上即在反對建鬥爭中也不可能和不應該使農民的所得完全平等劃一），錯誤地引用到發展農業生產上來。不瞭解在平分土地之後，農民已作為個體的小私有者而存在，他們都抱着希望託在自己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上，這正是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只有農業經濟發展，農民生活普遍的富裕起來，才能使新民主主義的工業發展有強大的基礎。

因而農民為發展自己經濟的競賽是須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允許這個競賽，才能發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發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則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動

提。平均主義的思想則是妨害這種積極性的發揮，而且它是一種違犯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思想。

有的同志害怕在農民經濟發展的競賽中，產生資本主義。這些同志不瞭解土地改革只是廢除封建的私有財產，並非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在某種範圍內還是爲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土地改革後新富農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這在今天，並不是什麼可怕的現象，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新民主主義國家裏，有着無產階級領導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鉅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工業經濟爲領導，又有農村中由個體經濟逐步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並可組織廣大範圍的供銷合作社系統去代替私人商業以確保國家經濟對於農業經濟的領導，這就保證了人民經濟的優越性及其發展的堅實基礎。這就使得新民主主義社會有可能不照舊資本主義時代那樣，把少數人的富裕和發展，建立在多數人的貧困上面。在廣大農民經濟的發展中，雖然必然的也不可免地要產生一些富農經濟，而這種富農經濟，在今天的條件下，對於穩定中農的生產情緒，對於生產力的發展與戰爭的支援，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有的同志對於毛主席所指示的山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農業經濟，在一個頗長時間內，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面發展的基本觀點認識不足，把「頗長時間」的時間的規定性，與逐步前進的方法都忽略了，這些同志不瞭解提倡農民的合作互助與發展個體的私有經濟並不矛盾，不瞭解

解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合作互助，正是以個體的私有經濟為基礎。這種私有農民經濟的廣大發展，「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务，奠定了基礎。」而在發展了的農業基礎上發展工業，首先是發展國有化的大工業，乃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目的，也是我們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的基本任务。忽視了這個，錯誤地認為不依靠高度發展的國有化的工業，不依靠大批農業機器，而僅僅依靠目前的變工互助，就可以避免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就可以很快地走到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集體化，這是一種十分有害的空想。

今春某些地方，脫離實際，脫離羣衆要求而提出的「農業合作社」及「合夥種地」、「共火房」、「大把菁」（農民中一種夥種、夥分、夥吃、夥用辦法）、「集體喂馬」等，就是這種錯誤思想的反映。這些錯誤思想的根本根源，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生產中的反映。必須堅決克服與肅清這種思想，才能正確地實現毛主席所指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

但是我們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承認農業生產中的合作互助與私有經濟不相矛盾，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把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當作我們領導農業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方向，可以放棄無產階級對於農業生產和農村合作事業的領導，使之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的路綫前進。不是的，我們決不是這樣。今後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在一方面，應該是獎勵農民生產發家，勤勞致富，使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而另一方面

，又必須使決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向集體方向發展」。在向集體方向發展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在生產勞動方面發展變工互助，而且需要在供給工具、種籽、原料和運銷農產品的方面，普遍地有系統地建立供銷合作社，以促進農民生產的發展，使農民由少受以至不受商人的剝削。這就是說，我們在領導農業經濟的發展時，一方面，必須反對各種各樣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與好吃懶做、安於貧窮，以貧窮為光榮的糊塗思想作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反對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讓其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路綫。新民主主義的農業經濟的發展道路，應該是逐步的——起初是在供銷及生產互助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集體生產方面——引向合作社方面發展的道路。

提高農業生產技術與

組織農村人民的合作互助

——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農業生產提高一步」——

（前略）第二個方面，就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農業生產技術。這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各地經驗證明：由於改良農具，或改良耕作法，或採用好的品種，或變旱地為水地等等，往往使同一土地的產量增加一倍乃至兩三倍不等。過去由於封建束縛沒有澈底解除，農民很少興趣也很少可能從事技術改良，現在是有這個興趣也有這種可能了，因此得以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普遍開展改良農業技術的運動。一切農村組織與農村工作者，應將領導與組織這一運動當作重要與經常的任務。應當採取各種有效辦法，保護與增殖耕畜，並提倡養羊養豬，積肥滙糞；應當提倡和獎勵改良農具，改良耕作法，選擇品種，防除蟲害，改良土質，興修水利等等有益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應當

的色並組織一切對農業生產具有專門智能與豐富經驗的專家或老農，幫助政府指導農業生產；應當開展生產競賽，在講求實際不務虛名的原則下，表揚真正對生產有貢獻有創造並有推動帶頭作用的勞動英雄與模範人物，把他們的經驗推廣到羣衆中去；政府每年應當發放必要的和可能的無利或低利農業貸款，並改善貸款方法，反對把貸款混同賑款、採取平均分配、只發不收的單純救濟觀點，要以貸給生產資料爲主，而不是以貸給生活資料爲主，要有計劃有重點的分配，防止挪用積壓，並簡化發放手續，保證全部並及時地發放到真正勞動人民的手裏，必須有借有還，以便逐年增加，擴大發放。各解放區必須設立農業生產貸款局專司其事，以便有計劃地，長期地把農貸在企業化基礎上切實辦好。只有作好這些工作，才能使增產成爲可能。在今年秋季，一切解放區，不論已否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均必須指導農村人民種好麥地，在冬季號召一切農村人民多積肥，修理與添置農具，爲一九四九年的大生產運動作好一切準備工作。爲了作好這一切工作，政府的農業部門對於生產工具的製造與分配，牲畜的購買繁殖，大小水利的計劃與舉辦，優良品種的選擇與推廣等，應該首先作好。

第三個方面，就是組織農村人民的合作互助。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要發展農業生產，首先是要打破束縛生產力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而在封建關係被打破以後，唯一的任務，就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由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相結合而形成的生產力；而爲了發展生產力，除了改良農業技術「生產工具」而外，起決定作用的，就是組織勞動力的問

題了。關於組織勞動力，即組織合作互助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論合作社」、「組織起來」的講演中，曾作過反復詳盡的說明。特別在目前，由於土地改革後，土地、耕畜、農具等相對分散，加上長期戰爭的消耗與敵人的破壞，造成農村人力、畜力及生產資料之不足，因此更需要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合作互助，並提倡婦女勞動，才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但是組織勞動力，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不能操之過急，必須善用農民的親身經驗，通過農民的思想覺悟，採取逐步推廣、逐步提高的方式。因此要反對命令主義和形式主義，但又不能放棄領導，任其自流。根據過去經驗和目前狀況，組織合作互助：第一、必須是自願結合的。由任何方面對於任何人實行強制而建立起來的生產合作組織，沒有不失敗的，因為如果這樣就不能發揮勞動積極性。所以在一切生產合作互助組織中必須嚴禁強迫加入。即是對於地主和二流子，應教導和監督他們學習勞動，也不應採取片面的管制辦法。第二、必須是平等互利、等價交換的。某些地區在合作互助中，片面強調貧僱農利益，強制地主，富農甚至一部分中農給貧僱農作無償勞動或不等價交換，都是破壞生產的錯誤行為，必須嚴格糾正。第三、一切勞動人民都可以成爲組織合作互助的對象。農民與農民間的合作互助，固應提倡；走向勞動的地主參加農民的互助，也是允許的，組織中農和貧僱農的互助，尤其重要。某些地區只單獨組織貧僱農生產互助，是不好的。因為這樣，不但不能推動整個農村的生產運動，也不能解決貧僱農自身

的許多困難，如生產經驗不足，生產工具不夠完備等。在這些方面，貧僱農都需要取得中農的幫助。第四、合作互助組織本身，必須有領導，有計算，又必須有民主有監督。第五、由於戰爭中男勞動力的減少，組織婦女參加生產，有極大的重要性。各解放區婦女過去在戰爭中，在支前、民主、土改與生產運動中已有不少的貢獻和參加勞動的經驗。今後更應有計劃地更廣泛地組織她們，成爲生產運動中的主力軍之一，並從而提高她們的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

在大規模戰爭的條件下，我們不能要求目前解放區的農業生產能有飛速和大量的提高。但是將解放區的農業生產從現有的水平上提高一步，或者說提高一寸，不但是完全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充分認識：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只要有正確健全的領導，掃除一切不利於農業生產的障礙，採取各種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措施，提倡技術改良，組織合作互助，便可完成任務。像軍事戰線上的勝利一樣，像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一樣，我們還必須以同樣的努力取得生產戰線上的勝利。一切革命，一切社會改革，其最後目的，都是爲了發展生產，如果我們在軍事上勝利了，在土地改革中勝利了，而不能在生產上繼續取得勝利，那我們的革命和土地改革，就變爲無意義的了，變爲無理取鬧了。所以我們必須在軍事勝利與土地改革勝利的完全新的基礎上繼續取得生產上的勝利，才能使我們的革命和改革成爲歷史上的重大進步。用生產的勝利，來鞏固和擴大土地改革的勝利，來支援和保證軍事上的勝利。並爭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

論新經濟政策與國家資本主義

斯大林

——摘自斯大林選集第一卷

加米業夫和李諾維埃夫兩位的基本錯誤，就在他們完全是學究式地而不是以辯證式地來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他們沒有把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與歷史環境聯繫起來。這樣觀察問題是完全違背列寧主義的。列寧是怎樣提出這個問題來的呢？一九二一年列寧知道我們的工業不很發達，而農民又非常需要商品，他知道工業是不能立刻發展起來的，同時工人在當時環境之下，主要的不是從事於工業而是製造火器——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認為在所有一切可能方法中最妥當的一個，就是吸收外國資本，藉外國的資本來整頓我們的工業，就是說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經過這種制度來建立蘇維埃政權與農村相聯合。這種方法在那時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時候我們絲毫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滿足農民的要求，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工業是很衰頹的，運輸事業差不多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燃料也非常缺乏。在那時列寧是不是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經濟的國家形式）是可以容許的呢？是的，他認為是這樣。但這是在一九二一年。現在怎麼呢？現在我們可否說我們沒有自己的工業、運輸工業停頓、燃料缺乏等等話呢？不，不能夠這樣說。現

在我們能不能否認我們的工商業已經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建立了工業和農業間的聯合呢？不，我們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我們能不能否認「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的作用在工業方面已起了變動呢？（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已佔了統治的地位，而租界和租借事業底比重已經降到最低限度，前者有五萬工人，後者只有三萬五千工人）不，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說租借事業已經不行了。

自此可知，從一九二一年起，我們環境已起了很劇烈的變更，在這時期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和蘇維埃合作社商業已經變成了主要的力量，我們已經能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城市和農村的聯合，國家資本主義之最顯著的形式——租界和租借事業——在這個時期內也並沒有好好的發展起來，在現在，在一九二五年，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經濟中的主要形式，就是曲解我們國有工業底社會主義性，就是不了解過去和現在兩種環境中間的一切區別，就是不能以辯證法去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而完全是以學究式、玄學式地觀察這個問題。

現在讓我再把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問題，關於什麼時候、爲什麼及在何種具體的條件之下他不得不把國家資本主義當作主要形式的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話，引它一段出來給你們大家看。（座中叫聲：「請吧！」）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決不能忘記這件事實：我們在國家工廠的工人中間時常可以看到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工廠中工人們自己搜集燃料、原料和食品，工人們用

中共中央東北局指定

幹部學習文件

吉林書店發行

一、中共中央委員會

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

二、共產黨情報局會議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決議

三、反對經驗主義

艾思奇

中共中央委員會

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爲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爲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佈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

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够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爲：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鬭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分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爲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分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共產黨情報局會議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決議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爲：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克，德治，盧加；匈——拉科西，薩拉克斯基；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朗斯基，西羅基，詹明德，奧萊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傑。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佈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新華社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真理報六月二十九日所載該項決議錄音譯出，並經過初步校正，發表如下：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一）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綫。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布）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

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二) 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聯共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誣衊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爲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會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並把它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蛻化、蘇聯蛻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中才得到了散佈。

情報局認爲：這種反蘇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 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

本主義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列寧說：「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制，全國大部份土地還集中在富農手中及採取僱傭勞動等等的條件下，不能以模糊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走向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爲「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列寧教育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澈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爲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論點。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够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仍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內基本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群眾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時作用，實際上是使黨蛻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在階級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各種分子（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資產階級的政黨。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為滿足。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黨的使命，在於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群眾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復着俄國孟什維主義者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群眾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認為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危險

(五)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

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鎮壓。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線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民族陣線總書記）和海德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允准這種可恥的、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南共本身存在和發展的利益，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六) 情報局認爲：聯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

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布爾塞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對批評兵刃相加的敵視態度，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破壞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共領導者，在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表示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德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聯共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方面對南共領導者進行了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闢宣佈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決議，這一決議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一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擴大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

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分。

爲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進行初步的長期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底聯盟，發展能夠組織集體經營農業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澈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府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早已註定了的失敗的冒險，只是自傲和空洞的煽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和煽惑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鬭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的所有這些法令和宣言，都是煽動民心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段，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 估計到南共黨內造成的情況，和為給南共領導者以出路起見，聯共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為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常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樣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底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真正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裡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 估計到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贊同聯共(布)中央對南共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聯共(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信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爲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爲：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綫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在於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裡，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所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又公開地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潛在能力。他們以爲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爲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共底領導人不了解國際情況及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威脅的伎倆，以爲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顯然是由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綱領出發的，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

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了解，也可能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綫的充分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够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反對經驗主義

艾思奇

(一)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裡，提出要反對經驗主義的工作方法。中央宣傳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號召全黨幹部『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或經驗主義。』兩個文件把經驗主義作為目前我們幹部中一種主要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指出這種思想方法在實際工作中曾經造成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並使中國人民在爭取全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事業中遭受了損失。因此，我們的幹部必須把反對經驗主義作為目前學習中的主要課題之一。

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它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方法如果為主觀主義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保持堅強的黨性，就不可能成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為着反對主觀主義，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同志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一九四二年一月，又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並領導全黨進行了整風運動。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裡，毛主席很強調地把『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當作整風運動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

問題」提了出來。

毛主席說：「我們黨中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就是一方面要反對教條主義，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所謂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結合。主觀主義却沒有這樣的一種結合。主觀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分裂，就是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分裂。教條主義的分裂，就在於它僅僅滿足於書本的理論知識，並使書本的理論知識絕對化，不問時間、地點、目的、對象以及其他具體條件如何，把單純的書本知識做爲唯一的法寶，盲目地機械地到處使用這一個法寶，去解決各種不同的具體問題，而完全輕視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的一切有價值的經驗和已由毛澤東同志從這種經驗所概括出來的理論，完全不懂得理論本身也就是實際經驗的總結，書本中所學得的一般理論知識只能作爲幫助我們總結自己經驗的指針。經驗主義的分裂，則在於僅僅滿足於自己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學習各方面的經驗，不會集中和堅持有普遍性的經驗，不會在一般的理論指導之下來總結這些經驗，因此，也就不能領會毛澤東同志從中國革命實際經驗中所概括出來的理論。不論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都只能具備片面的革命知識，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如果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這種

缺少馬克思主義知識的人，在主觀上往往還是很驕傲地自以爲是完美的革命者，但在實際工作中却常常做出許多於敵人有利而於人民有損的錯誤行爲。

毛主席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知識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的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的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二)

一九四二年以後的整風運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整風的號召之下，許多有書本知識的同志紛紛走到實際中去，或從事實際的研究工作，許多有實際經驗的幹部也開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論知識。兩種人和兩種片面知識，開始由分裂轉向結合，許多幹部的思想水平因之提高了一步，在黨內產生了一批既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又能掌握理論指導的幹部和領導者，這就成爲今天中國革命戰爭和各方面革命運動向全國勝利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對於這樣的事實，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演講裡作了總結說：「整風運動，一般地收到了成效，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

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

但是必須注意，毛主席在這裡只說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並不是說，經過了整風運動，黨的幹部思想就已經完全沒有問題，或者說主觀主義已經完全肅清了。不是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毛病，還必須繼續努力，才能完全克服；教條主義的殘餘在某些幹部思想，還起着壞作用；特別是經驗主義，還是今天很多實際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上所必須克服的主要危險。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特別強調反對教條主義，因為那時在思想方法上成爲黨內主要危險的東西，正是教條主義。在兩種主觀主義之中，教條主義是居於主要的地位。毛主席對當時的情形這樣說：『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為教條主義最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因此，自整風運動以來，對於兩種主觀主義的鬭爭，着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在這方面所收的成效也比較大。教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在一般幹部中被認識得比較清楚，它已失去了當年的威風，不再有嚇唬工農幹部和俘虜青年的力量了。自然，教條主義就在今天也還有不少的殘餘，例如，許多幹部在執行黨的政策時，還不懂得使一般的號召和個別的解決相結合，還不注意去了解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條件，不懂得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環境條件採用不同的步驟來實現這些政策。不少幹部還不能脫離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的惡劣習慣，把一般的號召和一般的政策生硬地帶到各種工作環境裡去；他們常常採取強迫命令的方法要群眾接受這些號召和政策，而不會

逐步引導群眾提高覺悟程度來自願地加以接受。這些就是教條主義表現在目前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具體形態。但是，從整個說來，教條主義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居於主要地位了。

經驗主義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在整風運動中，經驗主義也受到批判，但因為當時的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許多同志對於經驗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還沒有認識得很透澈，對於它所產生的危害性還沒有足夠的估計和重視。這是第一。其次，多年來的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單位的分散環境，使很多同志的思想被束縛於狹小的工作範圍，使他們習慣於從個別地方的條件和個別地方的經驗來考慮和解決問題，而不善於從革命全局的觀點上來考慮和解決問題，不善於把地方上的問題聯繫於黨的總的路綫和政策。由於以上主觀的和客觀的兩個原因，就使經驗主義在目前還成為我們很多幹部在工作中的一種重要的錯誤的思想方法。在着重的反對了教條主義之後，反對經驗主義就成為當前反對主觀主義思想方法之主要的方面了。在目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之下，努力克服經驗主義，已成為我們迫切的課題。中央宣傳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裡，關於目前的革命形勢這樣說：『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中國共產黨已在擁有一萬萬千萬人口並在某種程度上聯成一片的地區當政。沒有疑問，隨着革命的勝利，我們黨行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這種情勢所提給我們黨的任務是：『全國的革命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在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政策完全統一，而行政制度與行政機構也要求逐漸實行必要的與可能的統一，要適當地縮小各個地方和各個兵團的自治權，要將全國一切可能統一與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的領導之下，以便

集中力量進行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和着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各種新建設。」很明顯的，這樣的形勢和任務，就需要我們各地和各工作部門的幹部，在思想上超脫出狹小工作範圍的束縛，學習在各種重要問題上聯繫着目前中國革命的全局趨勢來加以考慮和解決，學習把一定範圍或一定條件之下的具體的個別問題和黨的總路線和政策聯繫起來。而如果我们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幹部，還保持着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如果他們的思想還只停止在個別的地方條件和局部經驗的圈子裡，而忘記了黨的總的總的方針和政策，那麼，這種思想方法無疑地就要與黨在目前形勢下的統一領導的要求發生矛盾，就要發生地方主義和無紀律的傾向，就要阻礙正確的路綫和政策之實現。

(三)

中央宣傳部的「前言」這樣說：「過去由於長期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單位分散環境，在各個單位中，又有各種不同的敵情、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的差異，因此我們就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各個單位的地方自治權，因而也就高度地發展了各個單位的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克服了當時的極為複雜的困難，把中國革命推向了全國規模的勝利。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方針。但是，正由於這樣，也就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種分散主義或地方主義的習慣，造成了黨內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這些，則是錯誤的與有害的。」必須注意一定地方一定部門的特點，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有許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過分地強調一定地

方一定部門的「特殊」；或帶着尾巴主義的思想，不加分析地認為「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並以這些為藉口，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拒絕實行上級的指示，拒絕黨的總的路綫和政策之有步驟的實施。這就破壞了黨的領導和紀律，這就對於黨的全國統一領導之要求形成了思想的障礙。這就表示，經驗主義已成爲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思想基礎，而某些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成爲習慣，又成了經驗主義頑固地存在的條件。因此，在克服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鬭爭中，必須同時在思想上也與經驗主義作鬭爭。

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決不是在任何意義上承認或回到教條主義，也決不是否定一切實際革命工作經驗的價值。相反地，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視一切有益的革命經驗，而馬克思主義的各方面的理論，正是革命的各方面經驗之總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決不是什麼神秘的天才腦筋之偶然發現，而是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群眾的鬭爭經驗之集中化、條理化。因之，問題並不在於經驗本身，而是在於是否會分析經驗，總結經驗，從經驗中找出關於事變的發展和問題的解決的規律知識。而經驗主義的毛病，正是在於停止在分散、零碎的經驗圈子裡，而不把經驗提高到理論，來指導我們的革命鬭爭。有經驗主義毛病的人，常常是眼光短淺，看不到全面，看不清事變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因此也就不可能作有理論指導性的、有預見和有通盤計劃的工作。

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在我們不少的幹部中是表現得相當普遍的，例如：第一，僅僅滿足於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虛心學習各方面的新經驗。其弊害是不能夠在時間、地點

條件變化了的情形之下靈活地改變工作方法，硬把不適合的或舊的經驗搬來應用。如把農村中反對建鬮爭的方法硬搬到城市裡去，把長期游擊戰爭時期分散獨立工作的經驗硬搬到目前解放區已經大塊地聯成一片的局面裡去。第二，眼睛裡充滿了各種各樣分散零碎的經驗，跟着不同的經驗左右搖擺，而不能保持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主動性，不能用科學頭腦對紛紜繁雜的經驗加以分析和總結。如群眾運動中的尾巴主義，強調一切要聽群眾意見，而放棄了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群眾所必需的領導和教育。又如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裡指出的一種經驗主義的開會方法：『事前毫無準備，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向幹部作精心準備好了的內容文字都有斟酌的報告，而聽憑到會人無目的的雜亂無章的議論，致使會議時間延長，得不到周密的結論。』此外，在我們今天的新聞通訊工作中流行的片面性、孤立性的報導，也是這種經驗主義的反映之一；這種報導把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個別細節充滿了我們的報紙（當然，毫無疑問的，在這些細而報導中，是有許多極有價值的和必須發表的東西），但絕不能告訴我們關於任何廣大範圍內任何重要問題的全般動向，動態，運動的進度，運動中的矛盾（一方面是在成績和正確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在困難和錯誤的東西），產生這些矛盾的癥結和解決他們的關鍵。所有這類方法之所以叫做經驗主義的，也正是在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個別，不見一般，任隨分散零碎的經驗之支配，而不能予以概括，使之上昇到理論。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經驗主義，表現在工作方法上就成為事務主義。第三，有些同志採取一種更低級的完全無原則的立場，他們似乎自居為經驗的百寶箱，在裡面貯藏着各種不同的甚至於互相矛盾的經驗，而對於這些經驗的正確與錯誤，並

不加以分辨，只看你要什麼，就拿出什麼來。這種經驗主義，常常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之一種補充。教條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有了這種經驗主義者的幫忙，就可以高高在上，而為自己的任何主張和任何『指示』找到『經驗』的證明。經驗主義之所以成為教條主義的俘虜，正是由於它有着這樣一種盲目的緣故。

(四)

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學習總結經驗，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識，提高到有綜合性、條理性的理論知識。

要能總結經驗，首先自然要學習各方面的經驗，而不要僅只滿足於狹小的局部經驗。傾聽各種群眾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學到各方面的經驗，因此，向群眾學習，是很重要的。但是，總結經驗，並不等於各種經驗的簡單積累，而須經過一番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又需要有不正確的方法指導，因此，必須首先學習總結經驗的方法，分析、研究各種現象的方法。即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及其關於社會發展和階級分析的理論。而經驗主義，就是缺少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分析研究。我們的經驗，一般來說，不外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鬥爭經驗。人民大眾中包含着許多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等等，中國共產黨是通過自己的各種具體政策來團結這些階級，去反對代表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地主階級和官

僚資產階級。我們分析經驗，就是要從許多經驗中，認清革命鬭爭中各階級的面目，他們的各種要求，趨向，以及我們的政策是否能引導他們對革命運動發揮積極的作用。要進行這樣的分析研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指導，是不可能的。同一個階級在鬭爭中可以有各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對於革命起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農民要求平分土地及封建財產，推翻封建地主階級，這種要求是有革命的進步作用的，是我們應該贊成的。但農民中間，又有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思想；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不但要破壞封建的土地和財產關係，而且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中農、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關係，並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城郊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這就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落後的反動的思想，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分析經驗，就是要分清這些階級的不同要求及其不同的作用，以及如何確定適當的政策，以便引導群眾發揮他們的進步的革新的要求和作用；防止和糾正他們的錯誤的要求和作用。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作為指導，要作到這樣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經驗主義者，把巴尼主義代替了有領導的群眾路線，認為群眾的意見一切都是對的；這種錯誤的來源之一，就是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

要學會總結經驗，還要能够分析各種經驗所依據的條件。如果經驗告訴我們，某一政策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時間實施起來有很大成效；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時間却没有很大成效甚至發生了許多惡果，那麼，就要了解這種不同的結果所以產生的原因，就要分析當地當時的各種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經過了這樣的分析，我們就可能得出結論，確定某一種政策必須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能實施。

。「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裡，確定土地改革必須在三種條件完全具備的地方（環境安定，基本群眾大多數已有土地改革要求，幹部在數量和質量上確能掌握土改工作）才能實行，而在這些條件不完全具備的地方，即不應列入土改工作範圍，這樣的決定，就是分析了土改工作各方面經驗的結果。

自從一九四一年七月黨中央發佈調查研究決定以來，黨的許多組織一般都已認識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重要，並且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積累了許多材料。但是許多同志還不懂得怎樣去正確的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我們的許多同志，還缺乏分析的方法，因此常常積累了大批材料，還是不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甚至把原因歸之於材料還不够。毛主席曾經用過殺豬的比喻，反問這些同志道：殺豬的人難道是要把世界上的各種豬都殺過，把一切大豬、小豬、公豬、母豬、黑豬、白豬、花豬、中國豬、外國豬都殺過，然後才能總結殺豬的經驗嗎？不是的，一隻通常的豬，就可以代表一切通常的豬。豬的年齡、性別、毛色、國籍，對於殺豬的方法是無意義的。同樣，撇開一切無意義的表面現象不論，一個真正典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一般同類的事物。如果對這個典型的事物，加以真正科學的分析，那麼就完全可以發現必要的問題，並且提出正確的解決的方法。當然，社會性的事物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要比豬與豬之間的差異複雜些，這裡就發生了選擇典型的任務，就發生了選擇幾種典型以代表幾種情況的任務，就發生了判斷某些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本質性的任務，而所有這一切，就叫做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但是爲了見森林，而去數一棵一棵的樹木

，仍然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仍然達不到見森林的目的。爲了了解森林，需要觀察森林的全貌並研究構成這個森林的一種或幾種樹木。同樣，爲了了解一種社會性的事物，也需要觀察它的全貌並研究它的一種或幾種典型。如此，就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一般解決問題的指示，而決不需要等候全部經驗都收集齊備，要『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像今天在黨的許多組織內流行的辦法那樣。這種辦法，也是一種錯誤的、必需改正的經驗主義的辦法。此外，由於缺乏分析的方法，在我們同志總結經驗的時候，還常常如同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所說，『不去思考問題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不提出問題，不分析问题，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舖，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這樣，即使作出了總結性的報告和一般性的指示，對於工作也還是沒有幫助，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由此可見，雖然作了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功夫，但如果不解脫經驗主義的束縛，不學會分析的方法，那麼我們就仍然不能提高我們的工作，仍然不能及時地掌握動態，解決問題，並交流經驗，糾正錯誤，發揚成績。也就是說，仍然不能解脫主觀主義的錯誤。

(五)

爲反對經驗主義，我們的領導幹部應當做些什麼呢？

第一件應當提倡的事情，就是利用各種可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哲學（辯證唯物

論，特別是歷史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必須進一步努力爭取時間，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在我們許多同志中，目前還很缺乏「認真讀書」的熱烈空氣。整風以來，在某些同志中還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凡讀書翻譯之類，都是「教條主義」，而否定了一切書本理論知識的價值。這種錯誤思想，足以阻礙黨的理論水平之進步和提高。死鑽在書本的牛角尖裡，不知道把書本中的一些知識結合於實際，用以幫助總結實際經驗和解決實際問題，這才是教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並不是反對閱讀書本，而是反對把這種書本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相分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是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運動的國際經驗之總結。從這些書籍裡面，我們可以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許多普遍真理，學到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和階級分析的理論，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之具體應用，即學到馬克思和列寧怎樣去解決各種具體問題。整風運動，是要我們學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也就是要我們學會把這些普遍真理作為指導，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使之上升為指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正確理論。因此，我們必須依照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的報告裡所給予的指示，在可能的一定時間來「認真讀書」。我們尤其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應該說：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運動的國際經驗的一種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的一部分。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特別總結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各時期和各方面的經驗，因此也就是我們學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之最好的模範。

第二，要認真研究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經驗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不重視這些綱領、路線和政策的**研究**，因此在實際行動中常常把它們忘記了，或者只記得某些個別的具體的路線和政策，而忘記了總的路線和政策。這樣就使得許多同志在執行政策的時候，不斷發生左右搖擺。所謂認真研究，自然不是說要一字不漏地死背文件，或是不管具體情況如何，一字不改的死搬文件。應當指出：與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方法相反，中央的指示文件總是謹慎地區別着不同的情況而提出不同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並且反覆地教育幹部按照具體情況來執行的。中央規定：各地黨的組織發現這些文件「如有不適合當地情況的部分，可以和應當提出修改的意見，但必須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實行修改。」今天的嚴重情形，主要地並不在於死背或死搬中央的文件（這無疑是錯誤的），而在於許多幹部根本不認真研究和嚴格執行中央的文件，反而任意藉口情況特殊，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執行自以為是的錯誤的政策，事前既不請示，事後也不報告，這就形成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因此，反對忽視中央的指示文件，要求幹部對於中央文件實行認真的詳細的研究，以便透澈了解中央的路線、政策，深刻領會中央的思想方法，乃是克服經驗主義的必要條件。

第三，除了以上兩個辦法以外，爲了克服經驗主義，還要提倡全黨幹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學習正確地調查研究，分析情況，分析經驗，隨時隨地養成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的習慣。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也好，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也好，中央的指示文件也好，究竟不可能把我們每天工作中所遇到的每個問題都給以具體的解答。相反地，所有這些著作和文件，都是堅決要求我們多多獨立地思想，而堅決反對

那些一切希圖現成的思想上的懶漢的。毛主席說：「有些人雖然有聯系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列寧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如前所說，現在黨內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一般習慣是有了，所缺乏的乃是分析的方法；而提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中央的指示文件，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學習這個分析的方法。這個學習，一方面需要認真讀書，一方面尤其需要實際應用。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靈魂，這是正確執行中央路線、政策的關鍵，這是我們全黨幹部在每天工作中不可以片刻離開的武器。我們學會了使用這個武器，就會使我們既能解脫教條主義，也能解脫經驗主義。

如何貫澈東北全黨的轉變？

東北書店印行

如何貫徹東北全黨的轉變？

黨的二中全會決議上明確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從東北全黨目前的工作狀況說，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情況究竟如何呢？以及在今後如何組織全黨進行全面的轉變呢？

我們認為：從領導思想上說東北的黨已經認識到而且開始了這種轉變，但就全黨的思想與實際工作狀況說，我們還沒有完全轉過來，還轉的很不好。

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尚未在思想上與實際工作上成爲全黨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對新的城鄉關係尙缺乏明確的認識，在工作方法上，多數同志仍以農村工作的方式做城市工作，和依然採用舊的農村工作方法（不是城鄉結合的新方法）做農村工作。而做經濟工作的同志，也多因襲過去財政供給的觀點與做法，缺乏從整體出發的生產觀點及與之相輔而行的全套辦法。比如：很多幹部，對城市工作摸不着頭腦，找不到城市工作的基本環節，陷入『碰到什麼做什麼』，一

般化、不能解決問題的狀態。有些城市，由於不了解城市是集中統一的，而仍然採用過去農村分散的做法，說『市政權建設的基礎在街道』，因而把極大的精力放在街政權的建設上（如哈爾濱、吉林、安東等市），結果把集中的城市分散了，把組織教育工人階級發展生產的中心任務在實際上推到了次要地位。同時對於在城市主要搞什麼生產，也不了解，如瀋陽北關區的一個幹部要求因缺乏紡花而暫時停工的紡織廠轉業開豆腐房與拴膠皮車；又如工業部所領導的瀋陽沙輪工廠，不是全力搞好沙輪的生產，而像過去搞機關生產那樣以很大的力量去開油坊，搞工廠的所謂『副業』生產。這是典型的在城市機械地搬運農村經驗的做法。另外，到城市後，城市的壞習氣極易腐蝕我們的幹部，有些立場不穩的就走上貪污腐化的道路。而最突出的則是我們不善於管理近代城市經濟尤其是工業。我們管理經濟工作的幹部常是只要完成任務，不怕多花錢，要提高質量時，則不惜虧本（心中無數，沒有成本計算）。羣衆對我們的反映是：『給共產黨包工，賠賺都不吃虧』。在工廠企業中生產與非生產人員的組織合理化很成問題，或則機關化，或則軍事化，而非企業化。如吸收了進步管理經驗的金州紡織廠一萬個紗錠只需三百個工人（包括職員在內），而瀋陽紡織廠同樣的紗錠則需六百五十個工人。又如我們在某地的軍事企業中生產與非生產人員的組織情形是：五個工廠總共人數八七三五名，其中正式從事生產的工人五一四八人，另外學徒、職員、學生、練習生、警衛、勤雜人員共三五

八七人，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爲五五比四五。工廠經營中的浪費與管理上的不負責所招致的損失，極爲嚴重與普遍，僅最近合江林務局被特務放火燒掉最好的木材五萬立方米，即等於上月工業部全部投資的三分之一，其他類似事件極多。但這種嚴重現象，並未引起工廠管理人員足夠的注意，有的甚至對此還缺乏知覺，或認爲這種過失總比貪污要好，滿不在乎，這是一種極端有害的思想。對於若干業務的管理上，許多幹部還缺乏起碼的知識，如郵電局在土地改革時亦盲目的起時髦，曾提出『郵電下鄉』，後來改爲『城鄉並重』，並提出『以電養郵』，實際上『以電養郵』是剝蝕公家來辦郵政（因電報、電話多爲公用）。至於不顧整體的本位主義，局部觀點，『小倉庫』與『打埋伏』等嚴重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則更普遍，如交通部下的一個單位，將舊存材料囤積起來，隱匿不報，反而另做預算，向公家領取九百億，購買材料；又如最近瀋陽冶煉廠的停工事件，是極爲嚴重的，該廠積負全年×千×百噸銅的生產任務，爲我軍事及重工業極爲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但該廠廠長張日新同志自己不懂技術，又不虛心學習，當上級察覺該廠電滾子可能發生問題，派人前往修理時，該廠長竟以『沒有問題』爲辭，拒絕檢修，及至三百馬力的電滾子壞了，仍不報告，接着二百二十五馬力的也壞了，全廠被迫停工時，纔寫一簡單便條告訴工業部，但毫無檢討。又該廠長爲了表現能『按時完成任務』，在上半年的冶煉中，只煉富鑛，不煉貧鑛，致使今後冶煉工作增加很大困難。所有這些

及其他尚未舉出的許多例子，都說明東北全黨在思想上與實際工作上尚未完全轉過來，還轉的很不好，這固然與我們缺乏經驗及長期農村工作與戰爭環境相關聯，但也表現我們有些同志自以為是及對革命事業缺乏整體觀念與負責精神的嚴重傾向；表現領導上深入督促檢查與具指導還很差。

如何組織東北全黨進行全面的轉變呢？我們認為這需經過相當艱苦的深入鬪爭過程。但目前應該抓住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甲) 根據二中全會的決議與我區具體情況，向全黨說明城市的重要性，城市領導農村的意義。這裏要着重說明所謂城市領導農村，其實質就是工業領導農業，工人領導農民，就是有步驟的把半農業化的東北逐漸變為工業化的東北。因為進步的生產力的代表是工業（根據目前東北經濟水平大體上一個產業工人一年平均可生產二十噸糧的工業品，而一個農民只能生產三噸左右），而工業與工人階級則在城市，從根本上說，農業是跟着工業走的，沒有工業，農業經濟就會停頓不前，就沒有發展的前途，農民就得不到最後的解放。新的城鄉關係是城鄉兼顧，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以城市領導農村，決不是丟掉農村或放鬆農村工作，而是爲了更好地推動農村工作與促進農業的發展。

(乙) 全黨認真學習經濟建設，抓住工業。主要內容是：第一：加強計劃性，加強整體觀念以及各部門密切結合。這裏首先需要根據客觀與主觀條件，規定一個

總的經濟建設計劃，這個計劃要有重點（在今天的東北就是迅速恢復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和以電力建立機械工業的必要基礎），要包括各個主要方面（如農業、鐵路運輸、內外貿易、財政、金融、合作社等），並規定在一定期間（如兩年）內的明確目標。其次是相互有機聯繫，密切配合，結成整體。各個方面都要按計劃行事，並保證本單位本部門計劃的完成與超過。脫離計劃就是盲目的，就會給整體以損害。在相互關係上必須在思想上建立堅強的集中統一觀點，並貫徹：次要服從主要（如投資時大家都搶着要，我們則把重點放在恢復鞍鋼電力和機械工業），局部服從全體（如熱河省屢次要求我們去開鑛及修鐵路，我們則主張首先恢復東北的主要鑛山與幫助關內修復主要鐵路幹綫），落後服從進步（如批評了西安市的工作同志怕手工工人失業，不讓機器工廠開工，及過去有些城市怕婦紡垮台，硬要進口棉花發給紡戶，而大的紗廠則因缺乏紡棉，許多紡錠停下來等不應有的現象）的原則。第二：黨應成爲完成經濟建設計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在宣傳教育工作方面：要教育全黨與全體人民認識當前東北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鼓舞廣大幹部與人民羣衆的生產熱情，發揚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的大無畏的建設精神，批評那種喊叫困難，而不積極克服困難以及在困難面前畏縮不前的懦弱病態。向全黨與全體人民說明今天新的城鄉關係，加強勞動創造世界與愛護國家財產的教育，樹立新的勞動觀點與勞動態度，並對在新形勢下各種錯誤思想進行及時的解釋與批評，首先是深入貫徹反無組

織無紀律的鬭爭。組織在職幹部政策理論與業務技術的學習，除學習工業，學習經濟建設的各項管理工作外，還要學習合作社、貿易、財政、金融、鐵路公路水路運輸以及如何提高農業生產等等，這裏，蘇聯三十多年豐富的建設經驗，是特別值得我們寶貴與學習的。此外並應認真開辦三個工業大學及若干技術學校培養技術人材。我們的各級黨報，除積極協助進行上述各項工作外，應更進一步為經濟建設工作服務，我們有關經濟建設的新聞報導，必須儘快的克服那種孤立的提出問題，對整體及其所佔比重與地位缺乏必要說明，與列舉一大堆數字，很少科學的歷史比較（如與何時何種技術條件相比在數量、質量、成本上增減百分之幾等）等毛病。爲了做好這點，除報社編輯與記者必須學習有關經濟建設的必要知識外，尤其重要的是加強工廠企業內部的通訊工作，工廠的行政、技術、黨務、工運幹部，都應積極給黨報寫通訊，總結和交流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並對各種錯誤的思想與行動，隨時進行嚴肅的批評，使我們經濟建設迅速提高一步。在組織方面：從現有的地方幹部中，抽調一定數量的有相當文化與科學知識的高中級幹部及縣區級幹部充實工業部工作，此外並積極注意培養與提拔工人幹部，並提出適合新情況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黨的工人運動及保衛、青年、婦女等工作，都要圍繞並服從於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來進行。同時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以及獎懲制度，對完成與超過生產計劃及有新的發明與創造者獎，對那些由於官僚主義及不負責的態度，因而不能

完成生產任務或使國家與工廠的建設遭受損失者，以及其他一切貪污破壞、盜竊行為等，均必需給以紀律制裁，重者交法庭判罪並予公佈，在黨與工人階級及勞動人民中展開反對這種不良傾向的鬭爭，以教育全黨與全體人民。第三：黨必須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加注意工人工作，一方面應切實注意解決工人的物質生活問題，糾正某些企業管理人員不關心職工生活的惡劣現象，調整工人的工資，糾正另一種形式（多等級的）的平均主義，保證工人按時取得合理工資，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做好勞動保險工作，辦好職工合作社。同時在可能條件下，盡量舉辦工人的集體福利事業（如工房、宿舍、俱樂部、衛生所、飯堂等）。但所有這些，均必需緊緊圍繞着發展生產，在完成與超過生產計劃這一總目標下來進行，離開生產，空談福利，同樣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必須配備必要數量的幹部進行工會工作與黨務工作，積極發展工人黨員，在工廠企業中建立和加強黨的支部。目前的工作重心是搞起職工代表會及工廠管理委員會來，凡關於生產計劃的訂定與如何完成生產任務以及有關工人生活學習等各項重要問題，均應交由工廠管委會與職工代表會討論解決，以促進工廠的管理企業化與民主化的實施，在工人中深入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加強工廠的文化娛樂工作，發揚與組織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確立工人階級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並使其瞭解黨與工人階級的血肉關係。克服工會工作中的官僚作風，提拔新的工人幹部，擴大工會的民主生活，密切工會與廣大工人羣衆的聯

爲了加強城市工作人員與工廠的聯繫，我們建議各個城市的機關、學校、駐軍政治機關，分別深入各該城市的工廠企業，協助當地黨委與工會進行各種可能的工作，特別是對工人階級的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並從而增加他們自己對於城市的瞭解，逐漸的學會如何進行城市工作。同時，並提議在所有大中城市及工業城市中一切機關學校團體普遍的實行禮拜六半日勞動制，以密切我黨與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聯繫，並養成城市工作人員艱苦樸素、勤勞建設的作風。

(丙)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這是城市領導農村，工業領導農業，國營經濟與農民小生產者經濟相結合，及城鄉結合的最好組織形式。因爲我們現在已有相當的力量，供給農民主要的日用必需品如布、鹽、油、火柴等與收購其農產品，但是尚缺乏組織這一交換的羣衆的組織形式，因之，各地方黨應把組織羣衆生產和與其不可分離的組織供銷合作社的工作做爲今後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在黨委的議事日程上，要經常討論有關供銷合作與生產的各種問題，並確實抓緊對於這一工作的領導與檢查。在目前應迅速有系統的建立東北供銷合作總社與各省市縣區的分社，以便推動與領導這一工作的進行。各地黨委都要抽調好的幹部進行這一工作，首先在每個區內比較適中的一兩個村莊內進行試辦，同時以省爲單位開辦合作學校，把學習與試辦村社工作結合起來，把發展新社與整頓現有合作社的工作結合起來，獎勵

那些辦得好的合作社，並及時總結其經驗，以之教育幹部。改造那些機關化與商店化的合作社，取締那些爲投機商人或其他少數人所操縱以合作社爲名，進行投機搗把活動的假合作社，清除貪污腐化分子，反對官僚主義與一切脫離羣衆的壞作風，以便到秋後結合冬季購糧及收購副產工作，進一步發展合作社運動。必須使東北全黨瞭解，只有這一工作做好了，我們的農村與城市纔能真正做到兼顧，纔能正確的結合。同時在大中城市大產業與大企業中首先發展工人職員的消費合作社，以便保障工人職員的生活。

當然，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中，問題還很多，但目前最主要的則是正確地有步驟地解決以上三個問題。讓我們東北全黨緊張的動員起來，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與建設城市，統一步調，克復困難，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緊密地結合起來，爲勝利完成並超過我們的生產計劃而鬪爭。



價激東北全黨的轉變？

№05・初版 印・10000

基本定價：31 元

山西崞縣是怎樣的 土地改革進行的

東北書店丹江分店印行

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

毛主席批：「這是山西崞縣的一篇通訊。在這個通訊中說明了那裡的群眾鬪爭業已展開。群眾對於分配土地業已完全醞釀成熟。在一個農民的代表會議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準備。那裡對於劃分階級成份，曾經劃錯了許多人，但是已經公開地明確地經過群眾代表的討論，決定改正。對於不給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將地主富農加以區別，侵犯中農利益等項錯誤觀點，作了批判。總之，在這篇通訊中所描述的兩個區的農民代表會議上所表現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作者寫這篇通訊時，崞縣還沒有實行分配土地，因此，這個經驗還不完全。我們希望在當地實行改正劃分階級中的錯誤（這是一件大事），實行平分土地以及組織生產，改造政權等項工作完成以後，再有一篇綜述這整個過程的通訊。關於如何在農村中進行整黨工作，我們有了晉察冀區平山縣的典型經驗（這是劉少奇同志總結的）。關於如何在老區調劑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為那裡已經平分了）的工作，我們有了陝甘寧區綏德縣黃家川的典型經驗。現在又有了晉綏區崞縣這樣一個平分土地的經驗（雖然不完全）。這個經驗，值得印成一個小冊子，發給每個鄉村的工作幹部。這種敘述典型經驗的小冊子，比我們領導機關發出的決議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動豐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經驗的同志們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擊破在黨內嚴重地存在着的反馬列主義的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領導同志們，在對自己領導的各項重要工作發出決議或指示之後，應當注意收集和傳播經過選擇的典型性的經驗，使自己領導的群眾運動按照正確的路線向前發展。現在是成千萬的人民群眾依照黨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買辦的反動制度展開進攻的時候，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鬥爭的方向，規定鬪爭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致重犯。」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茲將崑縣一區與城區最近召開的第二屆聯合區代表會議的情況，報告如下：

大會於一月二十七日開始，共五天，到兩個區三十二個行政村代表一百八十四名，其中中農成份四十九名。會議主要解決改正錯訂成份，平分土地，檢查鬪爭與分配，健全與鞏固組織等問題。

第一屆會議，是在十一月下旬緊急備戰聲中召開，會議本身轟轟烈烈，解決了土地與對敵鬪爭結合問題，及鬪地主與分配其它一般果實等重要問題。會後，不僅三天至七天內成立了區游擊隊及整理了基幹隊和民兵，加強了偵察、情報、崗哨、戒嚴、除奸等工作，並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各村捲入了鬪爭地主及進行其它一般果實的分配，迄今整兩個月。這兩個月中，農村面貌一新：地主被打得灰溜溜，並且向農民交出了底財，貧僱農以主人翁姿態在農村中掌權，並且組織了貧農團，以此為骨幹團結了中農，在鬪爭與分配中繼續審查了代表，並進一步鍛鍊堅強和純潔了農民隊伍。除少數幾個落後村莊如上申村、上大林、下連狄、任家溝（均自然村）等村外，其餘大部份村莊貧僱農已在農村中初步形成核心力量，各村真正群眾領袖已從鬪爭中湧現。一區的黃老二、城區的蘇立根（均為僱農）已為兩個區的群眾所愛戴，均被選為區農代會主席兼代區政府主席。黃老二率領了區代會常駐委員四人到各村巡迴檢查工作已將一月，六十六歲的老僱工今天比年青人還愉快活潑。到處嚷着：「砸碎醬罐子（意指蔣）·搗爛鹽鉢子（意指閻）·打倒蔣介石、閻錫山。窮人翻身！」並且由於走到各處有他窮親戚、窮朋友，便於了解情況、處理問題，他走到那裡便把領導關係帶到那裡，各村代表與群眾遠地走來找他解決問題。工作團幹部也在此時抽走，兩個區共留下七個人，作為巡視員，幫助農民解決問題及協助代表工作。

現在這一次代表會議。是在各村群眾要求立即平分土地準備今年大生產的情況下召開，故時機極為適宜。茲將所解決的問題分述如下：

首先解決關於錯訂成份的問題

一、自接到分局關於改正錯訂成份及團結中農等指示後，全縣作了整個佈置，並作堅決徹底改正。此次會議初步檢查，一區與城區三十三個村子（自然村），富農錯訂地主者共四十三戶，中農錯訂富農者一百零六戶，中農錯訂地主者二十六戶（下大林村），中農錯訂所謂『下降地主』者五戶（下大林村），其它錯訂爲破產地主者五十一戶（前報告未將下大林村統計在內，故數字不確，現更正如上）。根據十九個村的檢查結果，鬭爭面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以上是大會的初步檢查，除個別特殊嚴重的村子外，我們估計與實際情況相差不會太遠）。改正辦法：領導上首先強調提出，在改正成份中，不僅要在各村真正改正被錯訂的成份並團結中農，而且要通過改正成份去提高代表與農民的思想覺悟，從改正成份中使農民（特別是中農）對我黨的政策更好的了解。先在區代會上搞通代表思想，然後在土地分配中採用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配合進行；即採用搞通代表及貧僱農思想，再搞通全體農民思想，然後說服被錯訂者使其心悅誠服，最後才正式宣佈改正。其步驟：大胆、公開、正確解釋過去錯了的原因，特別是改正以後對咱農民的好處，改正的原則，改正時應注意的事項等，使黨的政策真正爲群眾領會貫通，並由群眾自覺自願的自己起來改正。我會親自在就近的一個錯訂成份最多，最嚴重村莊作了試驗，經過這種步驟與領導方法還較成功，雖然這村比一般村突出嚴重，但真正群眾思想搞通之後，改正無大問題。

二、根據上述精神，此次代表會議關於改正成份問題的討論是這樣進行的：首先，爲了與群眾在一起學習改正錯誤，以便更好的了解代表對改正成份的各種思想、態度與看法，故在代表集中後，事先不提什麼問題，即在各支點小組會上唸『怎樣分析階級』小冊子，代表的各種思想、態度、看法，讓他們盡情暴露以後（因爲代表的思想、態度、看法，反映了農村中群眾，特別是貧僱農的思想、態度、看法），再發動爭論略吵（醞釀的意思），領導上逐漸啓發引導；主要精神與問題搞明確後，最後領導上集中解決。開始，對參加各支點小組的工作幹部，只要求文件正確與代表見面，並將代表的各種反映用原

話毫不遺漏地記回來彙報，不強調要他們作更多解釋。

三、會議具體發展過程是這樣：在把「怎樣分析階級」小冊子在各小組普遍唸了以後，代表情緒極度緊張，有的睡不着，有的甚至說夢話，表現了各種複雜的思想，態度與看法。開始，在「錯」與「沒錯」這問題上爭論，如有的說：「訂時咱貧僱農都在場，一家一家都討論過，一點也沒錯，扣起的就是地主、富農，就沒把咱們貧僱農扣起！」「戴的帽子正嵌（合適的意思），那一樣也在格格裡！」有的說有錯，有的說沒錯，甚至同一個村的代表也有爭論，一個代表說：「咱村就有錯！」另一代表說：「咱村就沒錯！」爭論很激烈。有的表現抗拒說：「這本本是南方的，咱這地方不能幹，一個地方一個樣，咱這地方就是由咱！」但，普遍一致的是對階級敵人極爲警惕，如說：「蔣介石，閻錫山還沒打倒，拿出這本本來，地主、富農鑽空子，咱這工作不能幹了！」有的說：「這本本是咱們的，他們就拿不去，看不到！」對這本本（指「怎樣分析階級」小冊子）極重視，說：「回去可不敢丟了！」有的表現埋怨，如說：「前一次代表會叫從羊群裡趕狼，這會兒又要叫改正；大閘女搥斗子，沒搥住人家，把自己搥上了！」「這本本早發兩個月還用鬧這？」有的要推卸責任說：「這不能怪咱代表的錯，也不能怪工作團，上面本本來得遲了！」「這是貧僱農眼紅，見肥就咬，就訂得多了！」有的怕，如說：「人家（指中農被錯訂的）知道咱們鬧錯了，把咱們的門也要打爛哩！」「這書不敢露，地主富農可會說哩，咱們這一夥說不過人家！」「叫訂錯的破產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惱火」哩！」也有不同意：「不怕他和咱「惱火」；他要「惱火」，咱一鞭把他吆喝回去，對他說：「定你破產不虧情，你總吃過剝削飯！」

有的代表埋首考慮，想的很細，提出說：「這本本還得添上幾條條！」總的看，在唸了文件以後，代表思想表現極混亂，有的說有錯，有的說沒錯，有的埋怨，有的抗拒，有的推責任，有的怕報復。接着就反覆略吵，領導上並加以啓發引導，從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使農民真正體會改正成份對全體農民的有利，初步搞通代表思想，大家覺得確有訂錯的，並願意改正。如說：「按實際說，是有訂錯了的，」「按政策，按公心，應該改過來；將心比心，把自己人訂錯了，不應該！」「把自己人不該送到狼群裡去。」但思想裡仍有顧慮，不願直捷了當去改正，不願說「軟話」（公開承認錯誤），想用轉彎抹角的辦

法逐漸改正。如說：「錯就錯了，咱也不要給他們說，成份也馬上不給他變；沒吃了咱救濟他，派差少派些，分地時照顧他，不知不覺就把他變了！」主要原因是：（一）不願低頭，怕丟面子。如說：「咱辦了幾個月工作，還落個錯名？讓人家說：『看那些人，一定是下大林開會，訓了一頓，訓過來了，給咱改成份呢！』」或說：「咱回去，不要張羅這問題；一回去就張羅，太不給代表張臉了！」（二）怕地富鑽空子與錯訂者報復。如說：「一說改，這家也要改，那家也要改，你改了這家，不改那家，他還說你包庇哩！」「說是錯了，人家要發動咱呀！」（三）但最主要的是怕退東西，特別是東西已經分配的地方，說：「糧食吃了，衣服穿了，白洋交貿易局了，怎往回退？」「東西已經分了，吃進肚裡去不能往回退哪！」「咱們給他說服賠罪，說是窮人凍得不行；地還往出拿咧，衣服還不往出拿？」或說：「成份給他一改正，不退東西也就歡喜不盡了！」「東西無論如何不能退；不然，窮人還能翻個什麼身！」「在以後分配中照顧吧，這河不要退了；反正他們到現在還是比咱們強！」又經過互相爭論略吵，領導上經過參加各組的工作幹部領導啓發，並支持了正確意見，進一步講了分局所發的關於分析階級的補充草案，並引導代表具體研究分析各村到底訂錯幾家。代表在唸文件後，一下摸不清錯到甚麼地步，經檢查後發現問題並不像原來所想的嚴重，代表們的思想情緒，即有顯著變化。如說：「前兩天可發愁哩，這下弄通了！」「一池水，一棒打個窟窿——開哪！」有的說：「作事作事，多有不是，人還怕錯哩？作錯以後，再學好，才能把工作辦好；誰還能沒錯咧？怎好的人也有一點差錯！」代表們特別重視中農問題，也覺得最難辦。他們說：「富農錯訂地主的怕，錯訂破產的也不怕；爲首是把中農錯訂了富農，把自己人趕到狼群裡去，又拿了人家東西，這最難辦！」「改正成份爲首是中農問題，自己人闖了自己人，這得好好去作。」有的說：「人家中農有說話權利，這最難辦！」有的說：「如今有了本本就有了老師傅了，好辦！這就是咱們的辦法，回去好好研究，有了底，就好辦了！」「這本本盡說的是勞動，可見毛主席真愛咱勞動人！」在讀分局補充草案時，代表說：「這越念越好辦了！」念到草案第二項第四個問題時（即關於地主轉化其它成份，如有底財，須向群眾交出，經群眾討論通過，才能承認其所轉化的成份），有的代表說：「我思謀的那幾條也鬧上去了。」研究到責任問題時，工作團向大家承認

錯誤，說明過去訂成份由於我們思想不明確，所以訂錯了一些。代表們說：「這也不能單怪工作團，咱代表也有責任，貧僱農也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代表們特別強調：「錯是大家的錯，不是幾個人錯；改，也要大家改，不能幾個人去改。」更強調在改正中不能追究個人責任，誰某某成份是誰提的，讓壞人鑽空子。「咱們都鬧成一塊！」大家便接着咯吵改正辦法，意見是：代表團去後，配合平分土地，「復查成份」，實際進行改正。先在代表中討論「機明」，再在貧僱農小組，貧農團研究到底錯了幾家，大家意見「鬧到一塊」時，再在農會中討論，通過後，個別提出，大會宣佈。大家又提出了在改正中，第一，要咱們農民更加團結，大家都要負責，不要個人買好，防止壞人鑽空子。第二，要改正真正錯訂了的，不要「該下的不下，不該下的亂下，出了大糊糊」。要作到既不要冤枉人，把成份提高，亂扣大帽，把羊趕到狼群裡去。把自己人當敵人打，又不要把真正的地富降下來，弄得將狼混進羊群裡來，咬了我們的羊，使敵人佔了便宜，咱群眾翻不了身。第三，咱們代表要鐵面無私，認真負責，有的村莊訂的不澈底，有包庇，遺漏了的地富，這次改正中也要「改」出來；不要惜情顧面，反過來又鬧不澈底。

代表們對各種被錯訂者，又咯吵了辦法：

(一) 富農錯訂為地主的，代表們說：「好好給他強調勞動，勞動是好東西，怎也不要離開勞動」對他說：「因為你過去勞動，我們看你和地主不同，我們是消滅封建剝削；你有封建剝削，所以要消滅你的封建剝削，這是對的，不過把你訂高了些，因為你勞動，我們才給你下成份，以後你要好好勞動，跟上農民走」。大家意見：已經分配了的房子，可另由其他地主住處，撥出較好的讓他住，貧僱農不必再搬出來。其它，再照顧他够吃就行了。多餘的糧食已分配了，不必退還因今年年景不好，可作為對貧僱農糧食的調劑。(註：應退給口糧種籽，使其能够生產)。

(二) 錯訂破產地主的，代表們說：「強調他過去剝削過人，有的吃過剝削飯，有的踢弄了光景。」對他說：「現在我們農民念計你勞動，改你的成份，以後要好好勞動，和咱們一條心，不要上了真正地主富農的當！」

(三) 錯訂中農爲富農的，代表們說：「這就要緊了！要好好向他賠不是。」對他說：「咱們是一家人，這麼一件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免不了有錯；一時疏忽，出了些岔子，自己人好辦，大家原諒！」就吸收他參加農會，並退還東西。

以上各種問題，代表們在小組醞釀成熟後，即由領導上集中代表們的意見，把上述他們想出的正確的辦法，經過系統化，並予以提高，在大會上向大家作了報告。因爲是集中了大家意見，並且主要問題已在小組裡搞明確，故代表聽了說：「都是照咱小組裡吵下的譜譜說的。」

(四) 錯訂成份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我們及幹部思想不明確。第一，翻三代盤歷史，將一些已真正轉化爲農民的訂爲地主或破產地主。第二，按舖攤攤，將一些富裕中農訂爲富農。第三，將一些有商業關係的中農定成富農。第四，個別地方將一些失去勞動力的鰥、寡、孤、獨不得已而出租土地的錯訂成地主。個別村莊，由於幹部思想不純，「左比右好」，「寧左毋右」，怕說：「包庇地主，立場不穩」等情緒；故問題較嚴重。在一區有兩個這樣的村子：一是羅夫作的下大林，五百餘戶的村子，訂出地主富農一百來家。此次改正，發現中農錯訂富農者四十四戶，中農錯訂地主者二十六戶。中農錯訂「下降地主」者五戶，貧農訂破產地主者八戶，富農訂地主者十戶，共錯訂九十三戶。一是郭子秀作的定風莊，二百六十戶的村莊訂地富六十四戶（因羅爲地主成份，自己怕犯錯誤。郭爲地方幹部，在三查中受到批評）。但這樣的村莊，在一區僅這兩個，是特別嚴重突出的。另外一種較普遍現象是工作幹部把定成份標準四條平列起來去作，不去根據具體情況很好分析研究，並對群眾意見也傾聽不夠，因而犯了錯誤。個別村如下大林代表檢討時說：「當時只記住一句話：『不能包庇地主！』有些訂的不對的也看出來些，按他個人勞動，也沒太剝削過人，光景也不太強；當時，一來是「關不機明」，二來怕人說包庇地主、富農，所以就不敢晴氣！」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左」的情緒中，代表與群眾沒有勇氣提出來；另一方面反映了該村工作幹部在訂成份中走群眾路線與傾聽群眾意見是不夠的。

二、關於平分土地問題

關於平分土地，由於春耕在即，平川節令早，故群眾在闢地主後，急要求分地，以免誤生產。原第一期發動的十二個村（七個行政村）於上月先行召開了一個聯合代表會議，問題吵出很多，此次會議，即將原十二村的代表，劃編到各支點小組中去。討論前，先讀「土地法大綱」，「告農民書」的平分土地的分配原則部份，後讀報紙一月二十四日「關於最近分配土地中的幾個問題」的社論，然後各組自由略吵，提出問題，大家解決。吵了兩天兩夜，事實證明：只要群眾真正掌握了黨的政策，自己就夠把問題解決的很好。最後領導上集中了各組所提出的及所解決的問題，經過系統提高，向大家作了報告。

大家所提出及所解決的問題如下：

第一類，關於土地分配中的計人口及其他等問題

一、惡霸地主與惡霸富農的分地問題：大家提出，按「告農民書」規定其本人不能分給土地與財產，但又提出其家屬是否應該分地？一般分一份還是分一份額（壞）地？最後大家意見：其本人與其家屬還是應該區別。如其家屬並未犯罪作惡，可按一般地主富農待遇。至於確定其為「惡霸」，須經全行政村農民大會討論通過。至於一般地主富農的土地分配，大家意見是：要使「富農能生產，地主能生活。」

二、一般地主富農的分地問題：原群眾普遍意見都是恩賜地一小部份額地，數量也不足維持生活。他們說：「讓狗×的也受受咱農民的苦處，叫他們掏爛沙地去！」讀了報紙社論後，給代表們思想上解決了問題。他們說：「對着哩！要够他吃的。不然，他們偷咱們，要的吃，還得剝削咱們。」「他要沒活法，狗急跳牆，鬧得村子裡不安，對咱們還是個不利！」

三、地主富農出身，為人民事業犧牲的軍人與幹部，犧牲者應分得一份地。大家說：他對咱人民事業有功，他家庭的封建剝削和他本人給人民辦事應該分開。最後決定按一般烈士待遇分地。

四、二流子問題：大家說：「不要隨便給人家戴二流子帽子！一戴上，人家興敗了，鬧生產就不起勁。」對真正二流子，一定要照「告農民書」上面說的不給地權。但大家說：一定要好好改造，把他組織到勞動中去，強制他戒大烟，提高他成家立業的信心，慢慢使他走上正路。真正改造以後，再經群眾討論通過，才給地權。

五、去年閩匪侵襲時，被敵強迫抓走的農民，其本人應給分地；自願投敵的本人不分，其家屬應按一般農民分地。

六、代表們提出，農村中有少數人爲了逃避兵役，本人躲藏不見，給不給分地問題，大家說：這是因爲「腦筋不開」，要好好給他家裡教育，限日期把他本人叫回，才給分地。如萬一不回，把他應分之一份地，交農會暫爲保管，本人回村後，再正式分給；如確已參加解放軍或黨、政、民機關，取得證明後，即給予分地。代表們並提出：有些人爲躲避兵役，從這村躲藏到那村，應在平分土地中加以整頓，否則，既誤生產，又減少抗勤力量。

七、解放軍軍人，家中已無親屬者，代表們認爲，其本人雖在部隊，應分得一份地，由農會代爲經營管理，每年所得，除應交公糧外，由農會交其本人或代爲保管，其本人年老、殘廢或復員時，可作爲成家立業之基礎。代表們認爲，這樣作不僅可以提高其本人更堅決地爲人民作戰，而且可以直接鞏固部隊。

八、討論「土地法大綱」第十條第五項關於國民黨軍隊官兵分地問題時，代表們提出：「閩頑軍隊中的下級士兵，在平分土地時應動員他家屬寫信叫回。如在分地時回來，其本人也給分一份地。」代表們說：「這是爲了「消化」閩錫山軍隊，比十萬兵打他還厲害。」

九、日寇佔領期間，因負擔繁重，使不少中貧成份農民被迫逃往大同與綏遠等地，其主要人或全家均已逃亡在外，大家一致意見：此種情況，應該分得土地，爭取他們回家生產，壯大解放區力量（有的已捎信要求回家）。

十、計人口中，提到未娶媳婦，未嫁閩女，已懷孕未生的小孩如何分地等問題，大家意見：分地時

媳婦尚未娶過者不分。未嫁的閨女應分，未生的小孩也不分。總之，按分地時實有人口計算。

十一、討論「鰥、寡、孤、獨」問題時，有的代表提出：有的人家，有幾個兒子，老分家，留下一個老漢或一個老婆單獨生活，是否能按「鰥寡」待遇？大家意見：這樣情況，不能稱作「鰥寡」，應按普通一口人分地。又有一種「鰥寡」情況，本人年老，並無親生兒女，但有木家「近門」，大家意見：在分地時，應與其木家「近門」說明：如他負責贍養老人，該老人就不按「鰥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後，該一份地即歸贍養人所有。如其木家「近門」不願負責，即按鰥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後，地歸農會。

第二類、土地分配中可能引起的糾紛

十二、有幾種情況可能引起糾紛，大家提出了以下的一些問題：

(一) 地主富農在其他村買下的土地（如南陽店地主在定風莊置有三四四頃土地，南陽店群眾要求分配，定風莊群眾有意見）。

(二) 其他村買下本村的地或租種本村的地（如上陽武買了東野莊的地，東野莊租種了下默都的地）。

(三) 主要是「外冊地」問題。所謂「外冊地」，是水地村的特殊情況，如東野莊買了後沙城的地，地屬東野莊，但仍用後沙城的水；在舊社會一切攤派、納糧仍屬後沙城，故對東野莊說，這部份土地稱爲「外冊地」，不屬「本冊地」（或稱「外槽地」、「大槽地」）。

上述問題的解決辦法，大家的意見是：

(一) 隔村買地，地在那村即歸那村（因兩村距離遠，探不上）。

(二) 隣村的「外冊地」關係解決原則有三：1、地多地肥村、照顧地瘦地少村；2、地靠那村即歸那村，但距離較遠的村，如耕種便利時，也可以插花種；3、地的四邊靠那村即歸那村（如該地的四周均爲石封地，該地即屬石封村）。但主要的是第一點，必須以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以富照顧窮，多照顧少，肥照顧瘦的原則解決。

(三) 上述可能引起的糾紛，如屬同一行政村，即由行政村委員會統一解決；如屬不同行政村，可由當事行政村組織臨時聯合代表會共同解決，或經區代表常委會解決。

第三類，對中農土地的抽補問題

十三、中農土地不够者補足。土地長餘應抽出一部份的中農，大家認爲不能抽好地過多，不然，人家就不和咱們一條路線上站了！」並且應以說服自願爲主，勸他說：『多貪攬不如少作務，你有底墊，作務更細些，收成差不多，負擔也減輕了。』有的農民主張抽富裕中農的麥子地，大家不同意。

第四類，聯合分配問題

十四、一定堅持以行政村爲單位聯合分配。大家說：『要拿起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辦事，瘦肥少多大家照顧；代表帶頭，大公無私，不要儘說自己本村地少，地賴，產量低。』

(一) 水旱地互相調劑，但水利暫不動，決定『水跟地走』的原則。按：崞縣一區有陽武河水利，共灌溉十七村，舊日因爭奪水利常釀人命。相傳會由北京朝廷派大員調處規定，各村立有石碑，但極不公。如有些村地少，每月能使水兩日，有些地多村反只每月使水一日。此次平分土地，使水吃虧的村莊要求改變這種不合理情況（有的村地少水有餘，有的村地多水不足），但因時間緊迫，整個水利問題，一時無法倉卒合理變動，故確定『水跟地走』的辦法，如賈陀與上大林爲一個行政村，賈陀地多水少，上大林地少水多，兩村距離僅三五里，賈陀願意撥出多餘土地，但要求上大林分水；上大林寧願保持原有水量，不要賈陀的地。大家討論結果，決定水暫不動，兩村水旱地平均分配。如賈陀農民分到上大林水地，水即跟被分的地走。

(二) 組織行政村丈地，評議，分配委員會，聯合統一分配（水地村大多距離三五里相挨。如距離過遠，沒法調劑時，可移民）。

第五類，丈地與評等級（評產量）

十五、水地土順，『寸土必爭』，土地產量又懸殊極大，每畝有從一斗至石數之差。故對丈地與評等極爲重視，認爲是平分土地能否公平合理的關鍵。現各村已開始丈地，有的已丈二遍。如大牛堡，連

續丈了三次，先用「步弓」，後用「天竿」（竹竿），再用繩索，三次對比，最後確定準數。下默都用繩索丈地，每天檢查繩子一次，因第一天是新繩，第三天即長二三寸。繩頭掛紅布作記號，防止偷換。並規定本人不能用繩子丈自己地，防止緊鬆作弊。事先並各戶登記地畝，在地邊插木牌標明數字，以便參攷。

評等級：因川地產量懸殊，大家意見按通產分等。有幾種情況：少數村莊如陽武等，全為水地，等級易評；大部份村莊水旱夾雜，需分別評等；靠邊坡村莊地分幾類，水、平、坡、山，評等級時更爲複雜。大家意見：平川水地按地畝分配，因地質懸殊感到困難，故主張按產量分配，不按地畝分配。領導上爲使丈地確實，互不隱瞞，強調提出覆查，責成各丈地小組長及代表對所丈量的一段地負責，規定蓋章或按手印，以示負責，並以便覆查時發現問題追究責任。

第六類，平分土地必須成爲群眾運動

十六，大家討論認爲分地人人關心，要把所有群眾發動起來。

(一) 代表回去，先開代表會，再開貧農團會，再開農民大會，把所有的人都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丈地的丈地，評等的評等，計口的計口；人人參加，分頭下手；代表領導組長，組長領導組員，「一級趕一級，越趕越緊！」

(二) 主要靠思想動員，把大家發動起來：春耕在即，抓緊分配土地，就要分得快，不悞春耕；又要分得好，公平合理。「地是命根子」，「分得好壞，萬年福害」，只有大家起來丈地，評等，計口，大家討論分配，才能丈好，評好，計好，最後分好。

(三) 規定紀律，定好制度。紀律要大家自己定自覺遵守。分配土地期間，爲大家服務也即爲自己服務。開會要到，有事要請假，各種工作要認真。開會不到，不負責任的，要受到大家批評。

關於紀律問題，這次代表們極強調，他們說：「現在有少數貧僱農成了爺，哪！一說開會，中農們倒歡々來了，他們就不來。批評他，就在背後說：咱是貧僱農，看能把我怎？」代表們說：「紀律原是爲少數「奸頭」人，但對貧僱農還是要多響雷少下雨。」領導上也指出應主要的加強教育，提高覺悟。

十七、已有村莊丈地時將渠中圪塔、地道等除外，平川原有「一畝種八分」之說，應該統一，實事求是，按實際土地面積丈量。

十八、城區代表提出：城關附近之飛機場，去年已種上，是否可分？後又扯到鐵路路基，火車站站基等。大家最後決定：上述飛機場，鐵路，火車站等，將來我們還要建設，一律不分，飛機場仍可調劑耕種，但地權歸公。

十九、各村土質極劣，產量極低之爛沙荒地，不在平分土地之內。

二十、要求政府製發土地證。此問題，原十二村開代表會時，代表們提出：在平分土地後，應該廢除舊「紅契」，發給新土地證。但單是廢除地富的舊「紅契」，抑或連同全體農民的一齊廢除？引起爭論。最後決定，回去與群眾商量。下縣代表回村後，在農民大會上提出，中貧農一致主張全部廢除。理由是：（一）舊「紅契」是老頑固，不是咱們的東西，在舊社會裡咱農民爲它受過千災萬難，應打倒；（二）平分土地後，地與契已不相符合，「不投了」；（三）即使地不動，實丈的地數與舊契也將不符，「不準了」。因此大家同意：舊「紅契」一律打倒，由政府製發咱們自己的新土地證。二十一、代表提出：有不少古墳古墓，有佔土地十幾畝到幾十畝的。大家意見：這些古墳，大多屬於地主的，在平分土地時，經群眾討論平分，我們提出頭年不徵公糧。

第三、整頓組織（改造政權）健全與鞏固組織問題

代表們用了一天一夜時間略吵了組織問題。從發動群眾，普遍選舉代表以後，農村中舊的機構已爲農民一脚踢開，村政權實際上已爲代表會所代替，舊村幹部，有的被撤職審查，有的被暫攔一邊。一切權力歸到了代表會。農民們說：「行政村成了空機關哪！」村代表從天亮忙到深夜，代表會，貧農團，農民大會等各種會議不斷進行。除領導鬪爭與分配外，還需處理行政與群眾的一切日常事務。自從打倒地主以來，農民中民主空氣極高，但却發現一種小偏向：即代表們凡有事都要請示「掌櫃」（即群眾

），有時爲一小事開了一個農民大會。雖因平川集中，往往一個行政村即一村，但終究浪費群眾精力。代表們說：「瞎漢辦事可難哩！」要求整頓組織，討論了幾個問題：

一、健全代表會進行分工：自鬪爭以來，各村代表會均採「一鍋粥」辦法，遇事大家商量大家作，好處是大家動手，大家負責；壞處是亂，「頭緒不清」。這次大家意見是：由代表中產生代表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每村九人至十一人，正副主任一律改爲正副主席。代表們說：「毛主席領導咱農民是最高主席，咱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小主席！」代表委員會兼村行政委員會，村公所名稱一律取消，改爲村政府，代表委員會正副主席兼村政府正副主席。

討論到村主席問題，開始代表們感到「窮人當家」，困難很多：（一）「通天瞎棒」，辦不了事。（二）上怕犯了政策，下怕得罪群眾。（三）最主要的是家裡困難，沒柴沒水（不少代表一直忙了三四個月，連柴也顧不上打）。經過長時略吵，搞通了思想，覺悟到「咱窮人翻身，千年難遇！」群眾費了多少心事選舉了咱，剛上了陣就洩了氣，這是不對的。最後說：「只要我一不貪污，二不自私，公心爲群眾服務，也不怕犯政策，也不怕得罪人！」又說：「咱瞎漢管天下，眼睛心不瞎！請上個書記，借用他兩隻眼。」可見摧毀舊機構，農民當權，有不少困難，但只要堅決撐腰，提高了思想覺悟後，他們會堅強的排除萬難自己起來當權的。因爲這是農民民主問題，農民要求民主，特別是低層貧僱農，他們在舊社會長期痛苦的經歷中，很容易體會到自己當權的重要。他們說：「咱們鬧了一場，初翻了身，現在不幹了，這是爲甚呢？」顯然，農民覺悟以後，不僅要求獲得經濟果實。而且要求獲得政治果實。

其次，關於米津貼問題。舊制：每行政村規定三人至五人脫離生產，每月津貼米四十五斤，這次討論有三種意見：（一）正副主席，書記三人脫離，或半脫離生產，領米津貼。（二）正主席，書記，民兵隊長三人領米津貼。（三）領三個人的津貼，根據具體情況補助五六個人。但最後確定：因現正平分土地，代表與群眾一樣都參加運動，人人工作，目前不需領津貼，待土地分配完畢後再研究。

二、更進一步整編隊伍，純潔貧僱農內部，建立及鞏固農會，在平分土地中健全鞏固一切組織。各村貧農團已於鬪爭前後先後建立，並初步在農村中形成骨幹力量。貧僱農與農民代表均經一再審查，一

般說是純潔的。個別村子尚不够純潔（如前述上申村等村）。大家討論說：在平分土地中，誰好誰賴都要露出來。要鞏固擴大貧農團，並且要團結中農把農會搞好。有些村中農成份代表，在討論到農會問題時說：「這下就對了；以前你們乾爸爸就兩疔痘骨頭，把農會成立起，有骨頭也有肉了。」討論時，北賈支點代表提出：要成立農會，先要作個「帽子」，即先要定出參加條件。咯吵結果，定出四條：（一）擁護窮人翻身，擁護毛主席、共產黨。（二）要分出裡外，不在外面亂「反映」，不能兩瓣心。（三）忠實可靠，和咱農民一條心。（四）要好好勞動，真正二流子不要。又定出紀律四條：（一）積極工作；（二）開會到會；（三）不能說壞話破壞農會；（四）不准和地主勾搭。成立辦法：先在代表會討論，把條件、紀律研究後，將全體農民「濾一濾」，看誰能參加，打個底底；然後開貧農會，再開農民大會；把成立農會的道理向大家說「機明」，發動大家自動報名；再經貧農團與大會一個個審查，把紀律與條件同時宣佈，看他能不能接受，然後才允許正式參加。

大家說：「平分土地中，誰的骨頭都能看清！」誰公正，誰自私，誰積極熱心，誰各管自己，都會顯露明白。因此，這又是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關鍵。應該大大發揚大公無私，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克服自私，村本位等各種有害於平分土地的落後思想。這次會議，領導與代表均強調「公心」問題。代表們說：「不管你丈地，評等鬧得怎嵌（合適的意思），短個「公心」提甚穩也不頂！」「甚不甚公心爲第一！」

在平分土地中，不僅要頓整組織，而且要提高農民思想，要使平分土地與闢地主一樣，成爲廣大群眾性的運動；在運動的每一個細節中，工作幹部不僅要向農民學習（不學習無法領導農民，並無法使工作前進及勝利完成平分任務），而且要隨時隨地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的政治、思想、階級覺悟。

第四、會議的領導方法與缺點

這次會議，更明確的採取了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自始至終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針，即向群眾學習同時又教育提高群眾。因而，會議本身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更體會到只有堅

決相信群眾，相信群眾的無限創造能力，堅決靠群眾自己起來解決自己問題，才有真正的群眾路線。總括的看，這欲會議，工作幹部的任務只有下列幾個：（一）忠實正確宣傳黨的政策。（二）善於啓發誘導發揮群眾創造智慧。（三）善於發現及支持群眾的正確意見。（四）也須善於與群眾中部份人某些問題上所表現的落後意識作教育和作適當的鬭爭，爲群眾的正確意見撐腰，才能團結與提高群眾。（五）最後集中群眾意見，經系統條理予以提高後，再回到群眾中去。

這次會議，便是採用上述方法進行的。無論關於改正錯訂成份，平分土地，健全與鞏固組織等均如此。比如研究平分土地問題，先由工作幹部正確講解了三個文件，然後分支點略吵，由各村代表提出問題，大家討論解決。會議極爲活潑自由，每夜支點會議就像一窩蜂房，吵成一屋。一個問題提出後，大家略吵，直到問題明確。中間定有爭論，如「外冊地」問題，爭論很多，各執一見；其中並引起聯合分配問題，牽涉到水利問題，相持不下時，領導上提出「根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是地瘦的照顧地肥的呢？還是地肥的照顧地瘦的呢？地多村照顧地少村呢？還是地少村照顧地多村呢？」提醒了大家，把問題解決了。最後便將各支點所提出與解決的各種問題集中，向大家作了報告，大家說：「這下才鬧明白了」。

這次會議，現在看起來，主要問題解決較細緻明確。缺點是內容過多，又討論了公糧工作與支援前綫等問題，農民記不住，臨走時，都要求抄個單。他們說：「一提頭，就記起頭尾來了」。

以上是此次會議的主要情況。每個村的具體材料，因縣大，幹部少（現一區與城區只留七人），每個幹部負責四、五個行政村，在反映材料上確有困難。幹部水準低，總結能力又差，這是個問題。以上作法是否對？希望給以指示！

此致

譚政文

二月八日

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

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東北書店印行

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

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根據各地最近數月的報告看來，各解放區，除了去年秋季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以後解放的新區以外，在所有老區與半老區中，大致應分爲三類地區，並應根據三類地區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工作方針。

(甲)第一類地區，是土地改革較爲徹底的地區。其中，大多數地區，是經過了減租減息，清算鬭爭和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以後的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區，經過了清算和土地改革；而陝甘寧的一部分地區則經過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分地及一九四〇年的歸地。在這些地區，土地已經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農民各階層佔有土地的平均數相差不多。階級情況，除了東北及其他平分不久的地區尚有不同外，地主與舊式富農均比過去大爲減少，且有已下降爲勞動農民或貧民者，但尚有一小部分地主舊富農佔有較多較好

的土地財產。這類地區的工作幹部有許多人佔有較多較好的土地財產。這類地區，新富農已經生長，且有多過舊富農者。中農在這類地區已發展為多數，從鄉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上下，其中，新中農佔很大數量，有達一半以上者。中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一般超過貧僱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約二分之一上下。貧僱農變為少數，從百分之十到四十上下，其中尚有若干未澈底翻身者，亦有山地主舊富農下降為貧農者。這類地區，應被認為土地已經平分，決無再行平分的必要。留下的問題是在較小的範圍內，用抽補方法調劑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產資料，使尚未澈底翻身的貧僱農從地主舊富農尤其是佔有超過農民很多的土地財產的幹部家庭那裏補進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產資料。如果需要抽出新富農甚至一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時，必須取得被抽者的同意，方可抽動。綏德黃家川的典型經驗（即由新華社廣播），可以大致應用於這類地區。

（乙）第二類地區，是土地改革尚不澈底的地區。其中，一部分地區，經過了減租減息，清算鬭爭與五四指示後的土改；另一部分地區，經過了清算和土改，但均由於各種原因，例如領導方針動搖，黨內不純，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及戰爭情况等，致使土地平分尚不澈底，封建制度尚有殘餘，農民各階層佔有土地的平均數相差較大。階級情況，地主舊富農較第一類地 區多，大都仍佔有較多較好的土地財產。工作幹部中許多人

佔有較多較好的土地財產。新富農尚不多。中農佔人口的少數，約為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上下，其中新中農亦佔少數。中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因減租清算致土地轉移的結果，一般超過貧僱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達一倍上下。貧僱農仍佔多數，從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上下，其中多數尚未澈底翻身。這類地區，應被認為平分已大體實施，但不澈底，因此，一般地也不是再來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實行在較大範圍內的調劑。只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數農民要求並取得中農同意的條件之下，應當重新平分。由於這類地區貧僱農人數最多而土地平均差額又較大，單動地主舊富農及幹部的土地財產，一般不能滿足貧僱農的要求，勢非抽動新富農及一部分中農的土地不可。因此，凡中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超過貧僱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本人同意以後，可以抽出中農的一部分土地，但以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為限度。如此，一方面可使中農波動面不致太大，另一方面仍可保存中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超過貧僱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但又不致相差太大。如果中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超過貧僱農所有土地的平均數在一倍以上，並贊成平分時，可以實行平分。在這類地區，綏德黃家川經驗中所述土改工作人員的工作方法，亦必須注意採用。

(丙)第三類地區，是土地改革很不澈底的地區。其中，一部分地區雖然也經過了

清算和土改，但是工作很壞。另一部分地區，還是邊沿區或收復區，土改工作尙未進行。所有這些地區，土地並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土地關係及階級情況僅有若干變動，地主舊富農仍佔有大量的土地財產，貧僱農仍然是人多地少。在這類地區，完全適用平分土地澈底消滅封建制度的方針。平分的重點，應放在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及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上面。對於一部分中農的多餘土地，必須在取得其同意以後，方能抽出平分。如果某些中農所有土地較一般農民所有土地的平均數只超出百分之十以下者，應不變動。邊沿區，如尙帶游擊性質，應作新區看待，適用中央關於新區土改要點的規定，不應列入此類地區。

(二) 不論是平分土地或調劑土地，不但應注重土地數量的差別，還應注重土地的質量、產量及其位置遠近的差別；不但應從農村的一般耕地着眼，還應從公地、荒地、黑地、絕戶地等着眼；尤其是非法強佔的土地財產，分配不公的土地財產及幹部貪污或侵佔的果實，更應首先注意解決。如此，才能真正實現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平分方針，才能從多方面設法滿足貧僱農的要求，而同時又照顧了中農的利益。在平分或調劑土地中，對於在抽動新富農及中農的土地時，必須充分說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點，甚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則應向他們讓步，不得採取強制辦法。

(三) 爲着滿足貧僱農的要求，在實行調劑土地時，應首先補足缺地較多的貧僱農。然後，才對於有完全勞動力的青壯年單身漢，補足其兩人份的土地，但如土地不足時，亦可補給較兩人份爲少的土地，或者不補。對於孤老寡婦，因其缺乏勞動力，在土地不足時，亦可不補給兩人份的土地。對家庭人口多的，亦可較家庭人口少的少補。對流氓習氣很深一時難望改好者，也可少補，後補，或不補。對於此種流氓，暫時應只給予土地使用權，不給予土地所有權。對於由地主富農下降的貧僱農爲時不久者，亦可後補，或不補。總之，要使廣大貧僱農羣衆能合理地補足土地，以利生產；而不應附和絕對平均主義的錯誤思想。在調劑土地以後，對於孤老寡婦及貧僱農中仍有困難不能解決者，政府應另行設法幫助其解決困難。

(四) 在第一第二兩類地區中，在農民已經發動和組織起來的地方，目前應依上述各項規定，於春耕前實行調劑完畢，確定地權，以利生產。在工作尙未做好估計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務的地方，即應將土改工作推遲至夏季以後進行，並保證今年的土地生產物歸耕者所有，而將工作迅速轉入生產、整黨和建立鄉村民主生活上去。在第一第二兩類地區中，調劑土地的工作已經做好的地方，即應確定地權，不再變動。在第三類地區中，更應將已着手的土改工作趕快作一結束，推遲至夏季以後重新進行，以便迅

速轉入生產及一般的宣傳組織工作。

(五)在老區半老區，應準備以二年到三年時間(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有計劃地完成全區域的土改與整黨任務，而不應操之過急，致發生許多不應有的毛病。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均是很細緻的羣衆工作，必須依據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領導幹部的多少強弱，決定工作的速度。每一個鄉村土改與整黨問題的解決，均必須醞釀成熟，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意，方能作出決定，採取行動，不能由少數人強制解決，致犯命令主義的錯誤。同時，對於羣衆中發生的不正確意見，又必須耐心說服，實現黨的領導作用，不要犯尾巴主義的錯誤。

(六)土改與整黨，均應採取有重點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廣的方法。凡無得力的領導者或健全的工作團的地方，寧可暫緩發動，不要急於求成，致走彎路。但是在一切決定發動工作的地方，又要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工作計劃，不要拖延太久，致使羣衆情緒減低，既礙生產，又不利於工作的推進。對於一切領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領導者及工作團，均必須加以訓練，講明政策，並要適時地檢查他們的工作。

(七)貧農團無疑是農民羣衆中堅決實行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制度的骨幹組織。但是在第一類地區平分已經實現、中農已佔多數的情況下，如果也要人爲地組織貧農團

去領導一切，勢必脫離多數，孤立自己。因此，在這類地區，應就原有的農會加以擴充，並改選農會的委員會，使其能領導各項工作。原來無農會者，應成立農會。在農會中，成立貧僱農小組。如果貧農團已經組織起來，則不應馬上宣佈取消，而應使貧農團逐漸改爲農會中的貧僱農小組。在第二類地區，因爲平分尙不澈底，貧僱農仍佔多數，貧農團的獨立領導作用尙未失去，因此應該組織貧農團，並使其在農民中起領導作用，但在組織時，應吸收新中農參加。在貧農團成立一個短時期（例如一二個月）以後，即應就原有農會加以擴充，改選農會的委員會，使其能領導各項工作。原來無農會者，即應成立農會。在土地調劑工作完成以後，貧農團即可改爲貧僱農小組，如果在過去土地改革中，業已成立有貧僱農及新中農領導的健全的農會，或者有順利條件能够保證改選農會的委員會使貧僱農及新中農佔三分之二實施土改工作的健全領導的地方，亦可不組織貧農團，而只於農會中組織貧僱農小組。在第三類地區，因爲平分尙未實施，貧僱農佔多數尙未翻身，中農對土改尙存觀望心理，必須首先組織貧農團，發動土改鬭爭，樹立領導威信，一個時期（例如三四個月）以後，再成立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農會。農會應容許新富農入會，但對地主、舊富農及一切投機分子，則應堅決拒絕其入會。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大致完成以後，即應實行普選，成立鄉村人民代表大會，並

改選鄉村政府。在農會的委員會中，在鄉村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府委員會中，一般地貧雇農新中農應合佔三分之二，舊中農及其他勞動分子應佔三分之一。

(八)各地整黨工作正在開展，並創造了許多方法。其中，以經過黨的支部，邀集黨外羣衆參加黨的會議，共同審查黨員及幹部的方法，爲最健全的方法。平山縣的典型經驗，應爲各地所取法。在第一第二類地區，一般的封建勢力業已消滅，而農民中的不滿常常集中於一批利用政治地位爲非作惡，侵佔土改果實的黨員及幹部身上。因此，在這些地區進行調劑土地的工作，必須與整黨工作相結合，有時還須從整黨開始，才能發動羣衆的積極性。採用上述黨員與黨外羣衆結合開會的整黨方法，一方面，使參加會議的黨外羣衆能够盡情地批判與審查他們所反對的或贊成的黨員及幹部，使他們感覺到他們已與毛主席的黨通了氣；另一方面，黨的領導者又可根據羣衆意見及黨內情況，全面的考慮問題，分別是非輕重，給以應罰應獎的公平的處置，使黨內外羣衆均感覺滿意；同時，又可以吸收被羣衆所推荐的或擁護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的組織。如此，既整頓了黨的隊伍，又整頓了羣衆的隊伍，建立起黨內外的民主生活，將極大地提高黨的威信。此種方法，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在工廠中，在軍隊中，在機關和學校中，均應實行。除尙未鞏固的新區以外，一切黨的支部，均應公開。一切黨的支部，在其討論有關羣衆利益的

問題的一切會議上，包括黨的批評檢討會議在內，均應有黨外羣衆參加，不許開秘密會議，藉以破除羣衆對黨的組織與黨的會議的神秘感覺，使黨內一切好的與壞的現象暴露於羣衆之前，爲羣衆所監督，爲羣衆所批評或擁護。實行這種方法，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上級黨的領導的健全，一個是本支部要有幾個好的黨員骨幹。如果上級黨的領導者的領導不健全，便須先健全領導。如果某些支部確已爲壞分子所統治，甚或全部爲壞分子所盤據，沒有好的黨員骨幹，無法進行改造時，就應解散這個支部，上級領導者就應超過該組織，直接動員羣衆，依靠貧農團，貧僱農小組及農會，領導土改與生產。這樣經過一個時期之後，重新吸收黨員，建立支部。對於原支部的黨員，在該支部被宣佈解散以後，上級黨的領導者得依情況將他們提交貧農團大會或農民大會予以批判和審查，並給以應得的處分。其中，經羣衆評定認爲錯誤較輕的分子，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證明其確已改正者，仍可個別地恢復黨籍。但這是指特殊的情況。一般的支部，總有若干好黨員。上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善於發現這些好黨員，並依靠他們爲骨幹，吸收新鮮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拋棄或不理他們。整黨審幹，必須採取嚴肅而又謹慎的態度。我們既要嚴肅地注視黨內不純的現象，又要勿忘我黨的整個情況是業已經過長期考驗，在羣衆中有了極大威信，並正在勝利前進中。應當承認，在戰爭和土改的過程中，一

定會有一批階級異己分子從黨內清洗出去，同時又一定會有大批的革命積極分子湧進黨來。因此，各地黨委在整黨工作中，應當分別情況，解決問題。對於那些顯然犯有重大罪惡、業已喪失作爲一個黨員的起碼資格的分 子，應當開除出黨。對於那些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對於那些不可救藥的黨內蛻化分子，均應堅決清洗出黨。對於那些雖然是從剝削階級出身但是自願放棄其原來的階級立場的黨內的知識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們犯有嚴重錯誤，但尙未喪失當作一個黨員的起碼資格的時候，只要他們承認錯誤，願意改正錯誤，並獲得黨外羣衆的同意，我們就應採取考察和教育的態度，而不要馬上開除出黨。對於那些犯有較輕錯誤的黨員，不論其出身如何，均應採取教育方針。

高潮與領導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東北日報社論

就北滿七省基本解放區來說，從去年十二月以來，兩個半月的消滅封建平分土地的羣衆運動高潮，已經在極大多數地區展開了。這次高潮，運動廣，規模大，參加人數的衆多，鬭爭封建的深入，爲東北土地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一共有過三次高潮，一次是前年的清算分地，二次是去年的砍挖運動，三次就是這次的平分土地運動，煮夾生飯沒有形成運動的高潮。

這次平分土地運動，與過去各次運動不同的，其特點就是真正充分的發動了廣大羣衆，真正澈底消滅了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使得這一運動成功的原因：第一是中央土地法大綱及中央土地會議的新精神，澈底消滅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走貧僱農路線，整編土改的隊伍。第二是過去土地改革及羣衆運動工作的基礎。第三是全體幹部的努力。

現在，運動高潮的頂點大體已經過去，大部份地區已經進入分浮分地，準備生產。正因為運動快，運動廣，在這次運動中缺點、錯誤也不少，這正要求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及幹部，在運動中及運動後加以冷靜的思考：發生那些缺點和錯誤，應當如何改正，應當如何把運動提高一步，應當如何加強運動的領導。

在這裏，我們不想來說成績的一方面，因為成績的一方面是事實，在這裏，我們要說的是如何加強運動的領導。因為只有加強運動的領導，才能把運動提高一步，如果不加強運動的領導，成功的發動，可以造成錯誤的結果。

正因為這次運動是最大一次的高潮，是真正充分的發動了廣大羣衆的運動，在運動高潮的當時，不僅在我們的某些幹部中有不冷靜的、衝動的，而且羣衆也不容易冷靜的。現在羣衆已經過了舊曆年，我們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把我們應當如何加強運動的領導，如何把運動提高一步的具體辦法，不僅要在幹部中說清，而且要適時的恰當的在羣衆中也要說清。

加強領導

這次運動所以能够發動廣大的羣衆，是由於反對了包辦代替，走貧雇農路線，交權

交底，由羣衆自己動腦動口動手來辦。在羣衆運動中不僅過去和現在反對了包辦代替，而且今後仍然要反對包辦代替。

但是許多地方在反對包辦代替中，沒有說清楚一個問題，即是正確領導與包辦代替的區別。因此在反對包辦代替之後，有些同志甚至連正確的意見也不敢向羣衆提了，黨的政策也不敢向羣衆解釋了，羣衆的行動發生偏差時，也不敢誘導到正確的方向去，就有些自流現象。這樣就不能把運動提高，這樣就可能把運動搞壞，這樣就不能把羣衆的行動羣衆的認識提高到黨的政策水準。

所以必須把領導與包辦區別開來，領導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的，包辦是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反對的。黨的領導機關和幹部向農民正確的、適時的、生動的、通俗的、耐心的，根據羣衆切身經驗，根據羣衆能了解的程度，根據羣衆的情緒與要求，進行恰當的耐心的解釋黨的政策，分析問題，說明利害，提高羣衆覺悟，這不能叫做包辦，這就叫做正確領導。根據羣衆運動的發展，逐步提高農民的覺悟，把羣衆自發的行動引向到自覺的有組織的運動，把運動引導到新的更高的階段，這也不能叫做包辦，這也叫做正確的領導。只叫喊讓羣衆自己行動，袖手旁觀，不負責任，放棄解釋黨的政策，只滿足於羣衆的自發行動，不引導到自覺的運動上去，這不能叫做領導，這只能叫做自流，尾

巴主義。不解釋黨的政策，不把黨的政策交給羣衆，代替羣衆行動，或羣衆還沒有接受黨的政策，強迫羣衆行動，這叫做包辦代替，強迫命令。不適時的、生硬的、死板的，不根據羣衆的切身經驗，不根據羣衆的了解程度，機械的搬運黨的政策，這叫做教條主義。

關於羣衆運動中的鼓動口號和行動口號問題，過去在農村中，根據農民所能了解的形象，把黨的口號和政策通俗化，我們的幹部和羣衆是有了許多的創造，達到很大的成功，今後我們還應這樣做。但是必須了解鬭爭口號是隨着情況的變化及任務的改變，而必須要適時的加以改變和提高的，在昨天是正確的口號，在今天情況變化了，如果不加以改變或提高就變成不正確的，或發生偏差。

舉例來說：在運動還未發動起來時，所提出的『三不怕，一撐腰』這是需要的。但當着運動已經發動起來，而且鬭爭深入了，如果還是『不怕』『撐腰』，就不能解決問題，就要隨着運動發展，改變這一口號。又如『貧僱農說了算』，在貧僱農還不敢起來時，提出這一口號是正確的，但當着貧僱農已經起來，已經敢說時，就應逐漸給這一口號以補充解釋，什麼是貧僱農說了算，什麼是貧僱農說了還不能算的，如貧僱農鬪地主是說了算，如貧僱農要進城鬪工商業，那就說了不能算。又如『貧僱農有錯不算錯』，在

貧僱農起來後，就要逐漸解釋貧僱農有錯敢於改正錯，如鬪錯中農就應改正。又如『鬪剝削』，在羣衆中就要逐漸加以解釋，那種剝削應該鬪，那種剝削不應鬪，那種應鬪得重，那種應鬪得輕。又如『天下兩家人，姓窮姓富』，也應在羣衆中逐漸加以解釋，姓窮的裏面有那些人，姓富的裏面有那些人，除姓窮姓富外還有姓中的（努力生產將來窮人還要姓富），對各階級的不同態度，不同政策。這就是把運動一步一步提高，這就是把羣衆覺悟一步一步提高。

那些口號昨天是正確的，今天應該放棄，那些口號須逐漸加以完整的豐富的解釋。總之，在羣衆運動中，鼓動口號與行動口號，即鬪爭口號應當隨着情況的變化，任務的改變，而加以必要的適當的改變。使運動逐漸提高到黨的政策水準上來，並使廣大羣衆在政治上覺悟上提高。

在運動中，領導的重要，是決定運動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羣衆的自發運動是不能勝利的。

劃分階級

這次的打擊面是相當大的，應當引起嚴重的注意，現在來糾正，還不算遲，如果現

在還不加以嚴重的注意，那就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

產生打擊面過寬的原因，主要是由劃階級不清，劃階級的標準和條件規定得不適當，劃錯階級和對地主富農沒有加以區別。

爲着縮小打擊面，分化打擊面，必須採取下列辦法。

第一、劃階級只能以剝削關係、生產資料和生活狀況爲標準，其他一切條件如歷史和政治均不能作爲劃階級的標準。

第二、劃階級的時間只能以八一五前三年中的狀況爲標準，不能以其他任何時間爲標準。

第三、查化形只能查八一五後土地改革開始後這一段時間。八一五前是什麼階級就什麼階級，八一五前分家的，就照分家後的成份計算。八一五前由地主富農下降爲什麼成份就算什麼成份。過去各地時間定得不對的一律應根據此條改變。

第四、對中農與富農的區別，應按東北局指示：凡剝削收入分量扣除其被剝削部份，不超過其家中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者爲中農，在某種情形下會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羣衆不加反對者，也可劃爲中農。在計算佃農（佃富、佃中）的剝削時，應將交租部份及其他被剝削部份扣除。

對查錯、劃錯、鬪錯的中農應加以改正，並在分財物時給予適當的補償。

第五、在劃分經營地主與富農時，不要把富農劃成經營地主。

第六、對地主與對富農應有區別，對大中地主惡霸富農與對小地主一般富農應有區別，對地主應留給生活出路，對富農只分多餘部份，對小富農更應從寬。對一般佃富農只平分牲口，佃富農在分出牲口，分進土地的條件下，不會吃虧。

現在各地正在分浮分地，應把這些問題拿到貧雇農大會並吸收中農參加詳細討論，使貧雇農了解，採取這些辦法，是爲着整個革命的利益，也就是爲着貧雇農的利益，要貧雇農自動自覺的來實行。現在是貧雇農當家了，農村中的一切問題都要由貧雇農爲首來解決。

平分土地

一部份地區已經分完了地，大部份地區正在進行分地。現在立春已過，農民普遍的要求是快分地，分好地後好送糞。應當滿足農民這一要求，快分地，不要慢了送糞。但也應當認識這次分地，要真正分好，也應仔細，真正達到公平合理，不要懸殊太大，使農民大家滿意，這就要經過羣衆自己討論，領導上加以適當指導。分地的方法，應根據當地土地情況，不要機械搬用別地的經驗，可能在甲村適用的好方法，到了乙村因情況不

同而不能適用或必須加以修改，有的地方農民要一塊，有的地方農民願意要兩塊，有的農民願意要屋前的近地，有的農民願意要稍遠一點的，有的村因土地質量懸殊不大，可以自由挑選，有的村因土地質量懸殊很大，而好地又不多，則須好壞搭配。分地的方法，儘可因各村情況不同，而採取各種不同的方法。但分地的原則必須掌握下列幾條：

第一、滿足貧僱農要求，做到公平合理，懸殊不大，大家滿意。

第二、中農的土地原則上不動，少於平均數量的補進，多於平均數量的一般不動，太多的則採取協商解決。中農在自願打爛平分時，不要壞於原來的質量。

第三、對地主富農，按照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

第四、便利生產，不要分得太零碎。

應當認識這一次分地，是最後一次分地，不能經常分地，不能每年分地，如果那樣做，就會影響農民對保持土地的信心，就會影響農民對改良土地的興趣，就會影響整個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應當嚴重的對待這次分地，做到基本上分好，個別地方可能不合理，將來還可調整。

估 計

就北滿基本解放區來說，消滅封建和半封建剝削制度的鬭爭，即老百姓所說的鬭封建，已經澈底了沒有，是不是差不離了，已經深入了沒有，是否還要來一棧？這個問題已經提出，需要回答。

實際情況是如何，實際情況是北滿七省鬭封建已有二十個月，經過四次運動，極大多數地區，鬭封建已鬭過幾棧，尤其是這次運動猛烈的把封建鬭了一下，所以應當肯定回答：北滿七省極大部份地區，鬭封建基本上已經澈底了，是差不離了，不再來一棧鬭封建，個別地方又當別論。

這種估計是否過高，總的不會過高，個別地方可能。如果在去年北滿省委書記聯席會時，作這種估計是過高的，因為那時還有百分之七十的夾生區及空白區。現在，在鬭封建這一點上來說，這樣多的夾生區空白區已經不存在了。

不作這種估計好不好，不好，各級領導機關及幹部沒有底，羣衆沒有底，如果無止境的深入鬭爭，如果錯誤的反『差不離』，如果已經澈底了還要澈底，勢必把搞好的事情再搞爛。這次已經有經驗證明，在原先鬭封建已經澈底的區，警告過不能再鬭爭，有的地方沒有聽這種警告，結果把鬭爭面擴大，還是要改正補償。

作了這種估計是否會鬆勁，是否會鬆了幹部對羣衆工作的勁，是否會鬆了羣衆對封

建勢力的警惕。不會。作了這種估計，不僅不會鬆了羣衆工作的勁，而且是把羣衆工作提高一步，提出新的任務。今後羣衆運動的中心是組織農民生產，特別今年要努力，只有把農業生產力生產量提高，才能真正的建設解放區，支援長期戰爭。以生產爲中心包括民主運動，動員工作，是今後羣衆運動的基本內容。如可以這樣的話，那末在這以前是以鬪封建爲中心內容，同時也包括生產民主和動員工作。今後除在個別地方確實封建未鬪垮的地方外，在一般地區，在分地以後，均應轉入以生產爲中心內容包括民主運動動員工作的羣衆工作。

作了這種估計，不僅不應鬆了羣衆對封建勢力翻把報復的警惕，而且應當向羣衆說明，時刻要有這種警惕。同時也必須向被鬪的地主和富農說明：第一、過去鬪法是應該的，因爲你過去剝削壓迫人，今後只要不翻把報復，不幹反革命活動，即不再鬪。第二、過去分的土地財產是應該的，因爲是封建剝削來的，今後只要好好勞動，自己勞動來的，不再分。

現在提出這樣一種估計，是適當的，必要的。使幹部有底，使羣衆有底，使被鬪的地主富農也有底。

新
任
務
與
新
力
量

目 錄

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

(東北日報社論)

..... (一)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列寧)

..... (七)

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

——東北日報社論——

全東北的完全解放，在東北黨前面提出了許多巨大的新的任務，尤其是經濟建設的任務，這使我們工作的範圍愈來愈廣大了，使我們工作的性質愈來愈複雜了，因而我們需要的幹部也就愈來愈多了。於是到處感覺到了『缺乏幹部』，『沒有幹部』的困難。幹部的需要與幹部的供給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如何正確的解決這一矛盾，已經成爲我們工作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嚴重問題了。

從關裏補充老幹部的希望，早已沒有了。由於全國革命的巨大勝利，由於全國革命局面的很大開展，我們不但不能希望從關裏派來老幹部，相反的，我們還有準備從東北抽調出大批幹部到關裏去，幫助新收復區建立新解放區的任務。在老幹部方面，我們目前只能做到，加強對他們的教育，提高他們的質量，進一步發揮他們的力量，並在各個部門中間加以適當的調整，把他們的力量使用在最主要的方面。但這並不能解決幹部缺乏的困難，是很顯然的。老幹部的數量是如此有限，企圖在老幹部的圈子裏，解決幹部缺乏的問題，是沒有希望的。

只有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才是解決幹部困難問題的主要方法。今天沒有成千成萬的新幹部來擔負各方面的負責工作，我們就不可能完成新形勢在我們前面所提出的新任務。當然，在提拔與培養新幹部方面，我們過去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成績；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做得很不够，尤其在今天迅速開展着的新形勢前面，更加顯得不够了。而黨內某些老幹部中存在着對於新幹部的一些不正確的認識與不正確的態度，却常常束縛着他們的手腳，使他們在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的道路上，不敢邁步前進。因此，爲了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以適應於今天新形勢與新任務的需要，對於那些不正確的思想與態度，實有加以指出的必要。

有些擔負領導工作的老幹部，當他們提出幹部缺乏時，在他們的心目中往往只看到爲數很少的老幹部，而不看到大量存在的新幹部。他們不了解，三年來東北形勢的順利發展的過程，和我們工作的擴大與深入的過程，就是東北新幹部從群眾中大量湧現出來的過程。政治形勢愈是對我們有利，群眾運動愈是擴大與深入，在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中願意爲革命服務的人，從群眾中湧現出來有才能的人與有天才的人也就愈來愈多。新任務的提出，同時也提供了解決新任務的幹部條件。正像馬克思所說：「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正在形成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在幹部問題上，顯然也是如此。

無疑的，老幹部曾是建立東北根據地工作中的領導者與骨幹，而且今後還是如此，但老幹部如果沒有成千成萬新幹部的幫助與支持，東北根據地的建立，是不可設想的。事實上，在前方與後方，在農村與城市，在各個戰線與各個方面，在少數老幹部領導下到處活躍着，戰鬥着，工作着的大多數幹

部，不正就是新幹部嗎？在東北根據地的建設中，新幹部同老幹部一樣，是有很大功勞的。新幹部與老幹部，正像「車之兩輪」，缺一不可的。如果我們看不見這成千成萬的大量新幹部的存在，對他們的作用估計不足，就會使我們在幹部問題上，片面強調老幹部而忽視新幹部，就會使我們在解決幹部困難問題上，老在老幹部中打圈子，而找不到正確的出路。反之，如果我們除了少數老幹部之外，還看到這大量新幹部的存在，那我們就會知道如何從提拔與培養新幹部中去解決幹部的困難問題了。現在不是沒有幹部，現在有的是幹部，只是要我們去大量提拔與培養而已。對幹部困難問題，表示束手無策與悲觀失望的情緒，是不正確的，是不合於當前的實際情況的。

還有些擔負領導工作的老幹部，當他們提出幹部缺乏時，往往只看到老幹部的優點，而沒有看到新幹部的優點，因而往往偏於信任老幹部，而不够信任新幹部。當然，信任老幹部是應該的，看到老幹部的優點，也是對的。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老幹部擁有年輕幹部所沒有的東西，即領導方面的豐富經驗，馬列主義的原則鍛鍊，深諳事理的知識，決定方針的能力。」這自然是老幹部的優點，雖然這種優點，在不同程度的老幹部中也不是一樣的。至於新幹部，正因為他們是新幹部，所以暫時還不可能具備老幹部的那種優點，要具備那些優點，還須在今後工作中繼續加以培養與鍛鍊，但是新幹部也有新幹部的優點。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他們具有很充足的對於新事物的知覺，而這是每一個波爾塞維克工作者寶貴的品質。」同時還應該看到，東北新幹部較之關裏來的老幹部更為熟悉當地的情形，他們與當地群眾更有密切的聯系。他們在工作中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他們有刻苦耐勞的精神。新幹部的這些優點，是我們應該充分看到的。因此，只要我們老幹部能很好的領導他們，大膽的

去提拔與培養他們，信任他們，給他們以更多負責的工作，他們就會很快的學會革命的新知識與革命的新經驗，他們就會很快的向前進步，而且會很快的趕上老幹部，成爲老幹部的有力助手與接替者。甚至在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他們還會比某些老幹部進步得更快，不僅會趕上，而且還會超過。因爲不幸的是，在老幹部中，有些人還背着包袱，擺老資格，自以爲是，固步自封，缺乏對於實際生活中新事物的知覺，因而不能進步，不能發展，結果不能在前進道路上掉隊落伍。所以斯大林曾經嚴重的警告過老幹部，『喪失對於新事物的知覺』，是老幹部的『一個嚴重而危險的缺點』。所以我們目前也必須着重加強對老幹部的理論的、政策的與策略的教育，把老幹部提高一步，使老幹部不愧爲新幹部的領導者。

毫無疑義的，我們應該歡迎與幫助新幹部的迅速上進，歡迎他們趕上老幹部，甚至超過某些不願進步的老幹部。對於妨礙工作進步的某些頑固不化，傲慢自大的落後的老幹部，應該毫不遲疑的調換他們的工作，讓優秀的朝氣勃勃的新幹部去接替他們。這對於革命的工作，只有好處。任何壓制新幹部上進，害怕新幹部上進的思想與行爲，都是應該反對的。因爲這不但不是爲了解決幹部問題，而是在解決幹部問題之前預先堵塞了解決幹部問題的大門。

有些擔任導領工作的老幹部，他們不敢提拔新幹部的主要理由，說是新幹部提拔早了，怕他們在工作中犯錯誤，使工作受到損害。這種顧慮，是似是而非的。因爲事實上，現在已經不是對新幹部提拔過早的問題，而是要及時提拔的問題了。三年來，在東北戰爭與土改的巨大革命浪潮中所湧現出來的大批新幹部，他們已經經過了相當的鍛鍊與培養，在這一基礎上，大量的進一步的提拔其中的優秀

份子，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現在已經不是等到那年那月把新幹部鍛鍊好了，培養好了，再來提拔的問題，而是立即在過去鍛鍊與培養的基礎上加以提拔，再在提拔之後繼續加以鍛鍊與培養的問題。難道在老幹部中，曾經有過那一個老幹部預先鍛鍊培養成爲十全十美的幹部，然後才被提拔的嗎？這是沒有過的，也不會有。如果那樣，我們就一輩子也解決不了幹部問題。至於新幹部，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會在工作中發生錯誤與缺點，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老幹部對於新幹部在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有正確的態度，錯誤與缺點，反而能教育新幹部與提高新幹部。

這裏要提起所有老幹部注意的，就是對於新幹部必須在工作中進行耐心的教育工作，既要獎勵他們工作中的成績優點，又要指出他們工作中的錯誤缺點，並告訴他們如何發揚成績優點，與糾正錯誤缺點的辦法。平時只知道使用，不知道教育，一見工作中有了錯誤，也不加教育，就「腳踢開的辦法，都是不對的，是一輩子也培養不出新幹部來的。過去在平運中對新幹部所採取的「搬石頭」「跳圈子」的辦法，都是錯誤的，今後再不能重複。今後在大量提拔新幹部的過程中，我們老幹部不但不應放棄教育新幹部的責任，而且更應加強我們對於新幹部的教育工作。培養新幹部是一件需要極大耐心的細緻的工作，又是最有意義，最有結果的工作，決不能粗心大意，馬虎從事的。如果我們今後在黨內外能够很好加強對於新幹部的教育，正確的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各種方法密切幹部同群眾的聯系，我們相信，新提拔起來的幹部，一定會很快進步，對於他們所負擔的工作也一定會勝任愉快的。

應該克服一切忽視與輕視新幹部，不敢提拔新幹部的偏向，真正做到這次東北局高幹會的決定，

在最短時期內使區級幹部都是新幹部，把縣級幹部除縣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及少數縣委部長，個別縣府科長外，也由新幹部來充任，並在各種工作部門中增設新幹部的副職，給新幹部以學習的機會。同時根據東北局決定，在各省縣市大規模的開辦黨校，訓練班，專門學校，大批的培養新幹部，把他們提高一步，使他們能擔負更多的工作。只有如此做去，我們才能真正按照東北局的決定，把大批的老幹部抽調出來，派到新收復的城市與新收復的地區去做領導的工作。否則幹部困難問題，我們就無法解決，因而我們也就無法完成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新任務。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列寧

編者註：這篇文章是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八日寫的，當時俄國正進入大革命。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完成新的任務的新的力量的問題，並極精闢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望讀者聯系本報今日社論，加以研究。

當時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其中有二派：一派爲布爾塞維克（又名多數黨），即真正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以後改名爲共產黨，以列寧斯大林爲首；一派爲孟塞維克（又名少數黨），爲俄國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政黨。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所批評的「機會主義理論」，即是指的孟塞維克派的理論。

俄國群眾的工人運動底發展，在與社會民主黨發展相聯系上看來，是以下述三個非常重要的過渡爲其特徵的。第一個過渡是從狹隘的宣傳小組進到在群眾中的廣泛經濟鼓動；第二是進到巨大範圍內的政治鼓動和公開的在街道上的示威；第三是進到真正的國內戰爭，進到起義。其中每個過渡都由於以下兩方面準備起來的，一方面是由於主要按照一個方向進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工人階級生活條件上和全部心理狀態上發生深刻的變化，由於日益增多的工人階級階層被喚醒起

來參加更自覺、更積極的鬥爭。這些變化有時是寂然無聲地發生的，無產階級聚集力量是在幕後、暗中進行的，而往往引起知識份子對於群眾運動的鞏固性和生命力的失望。然後進到了轉變關頭，全部革命運動好像一下子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社會民主黨之前實際地提出了新任務，爲要解決這些新任務好像從天上降下了新力量，這些力量在轉變的前夜都還沒有人猜到。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不是沒有動搖，不是沒有社會民主黨內各派別間的鬥爭，不是沒有那種向着陳腐了的，似乎是久已死滅和埋葬了的觀點的倒退。

現在我們黨又正經過着這樣的一個動搖時期。爲要使我們的策略和組織適應於新的任務，必須克服什麼「高等形式的示威運動」（地方自治局運動計劃），或什麼「過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之抵抗，必得進行鬥爭來反對那種害怕「指定」起義，或害怕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反動心理。運動的進程，在這一次也會把那些陳腐了的和無生氣的觀點的餘毒掃蕩掉，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種掃蕩應當還不僅限於駁斥那些舊錯誤，而還需要在無可比擬的更大程度上進行積極的革命工作，來在實踐上實現新的任務，來吸引那在現時正在如此大批的湧上革命舞台的新力量，到我們黨方面來和使我們黨利用這些新力量。正是這些積極革命工作問題應當是將近開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即布爾塞維克的黨大會——編者）工作的主要課題，現在我黨全體黨員在其地方工作和一般工作上都正應當將其一切思慮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什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我們在大體上已屢次說過了。即是：擴大鼓動到城鄉貧民的新階層中去，創立更廣大的、更靈活的和更堅固的組織，準備起義和武裝人民，爲了這些目的而與革命民主派訂立協定。什麼是爲實現這些任務的新力量，——對於這一點

的極好的說明就是關於全俄到處發生總罷工的消息，關於罷工和關於青年、一般民主知識份子，和甚至許多資產階級份子都發生革命情緒的消息。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底存在，特別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這些力量底存在——就是使新任務可以解決而且一定會解決的充分保證。擺在我們面前的實踐問題，首先在於究竟怎樣來利用、指導、統一、組織這些新力量，究竟怎樣來把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當前時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務上去，同時並不忘記那些舊的和通常的任務，這些任務是當資本主義剝削世界存在時始終會擺在我們面前的。

(中略)

革命時代之對於社會民主黨正如同戰爭時期對於軍隊一樣。必須擴大我們軍隊底幹部，把它從平時編制變為戰時的編制，動員後備軍和預備軍的戰士，召還休假的軍士回軍服務，整理新的輔助的軍團、支隊和其他附屬隊伍。不要忘記，在戰爭中必然而且必須要用較少訓練的新兵來補充自己的隊伍，常常要用普通兵士來代替軍官，必須把升調兵士為軍官的手續加速和簡單化起來。

直接了當說：必須極力擴大所有一切黨的和接近黨的組織，以便稍稍跟得上百倍增漲的人民革命毅力的巨流。自然，這不是說應當把那堅持不移的訓練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教育擱置一旁。不是的，可是應當記得，現在軍事行動本身在訓練和教育事業上有了更大得多的意義，因為這種軍事行動正是在我們的方向上，完全在我們的方向上來教育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們。應當記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性的」忠實態度，現在正由革命事變進程到處給予群眾的實物課程所鞏固着，而這些課程正是證實我們的信條。因此我們所說的不是放棄信條，不是減弱我們對於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識份子

和華而不實的革命家們所持的不信任與猜疑態度，完全相反的。我們所說的是關於傳授信條的新方法，社會民主黨人忘記這些新方法是不可容許的。我們說，現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偉大革命事變的明顯教訓來向群眾——已經不是向小組——傳授我們舊的「信條式」的課程，例如，必須在實際上把恐怖手段和群眾起義溶合起來，例如，應當善於看見那藏在俄國開明社會的自由主義後面的我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參看『前進報』第三期上關於本問題與社會革命黨人的辯論）。

所以，並不是說削弱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嚴格要求態度與我們正統的不調和態度，而是要用某些新的道路、新的教育方法去鞏固它們。在戰爭時候，應當直接在軍事行動上來教育新兵。同志們，更大的膽些來採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膽些去日益增多地組織新的戰鬥隊，派遣他們去進行戰鬥，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擴大一切黨組織底通常範圍，從委員會起直到工廠小組、職業支部、學生小組為止！要記得在這個事業中我們的任何延緩都會是利於社會民主黨的敵人，因為新的水流急於尋找出路，而如果我找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它們就會沖入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中去。要懂得，革命運動的每個實踐步驟將必然而不可避免地正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即共產主義的科學——編者）來教育青年新兵，因為這個科學是建立在客觀正確地估計各個階級的力量和趨向的基礎上的，而革命却正是舊的上層建築的破壞和力圖按自己意向創立新的上層建築的各個階級的獨立行動。絕不要把我們的革命科學降低到僅是一種書本上的信條，不要拿什麼過程策略、過程組織，這類辯護散亂、遲疑的、消沉的可鄙詞句來糟蹋我們的革命科學。讓各種不同的團體和小組有更多的自由來進行各種各色的活動，記着，它們道路的正確性，除開我們的忠告，和不管有否我們的忠告，定有革命事變進程本身倔強的

要求來作保證的。早已說過，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敵人學習。而在革命時期敵人總是特別有效地和迅速地強迫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

「組織起來呵！」這個口號，是布爾塞維克派擁護者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會想用完備形式規定的，現在應當把它立刻實現起來。如果我們不善於大膽地倡首建立各種新的組織，那麼，我們就應該放棄那想擔任先鋒隊作用的空洞野心。如果我們軟弱無力的停止在獲得的委員會、團體、協會、小組等等的界限，形式和範圍中，那就是以此證明我們自己庸碌無能。現在，不由我們發動而到處發生着的小組何止幾千，都無任何一定的綱領和目的，而簡單是受着事變的影響。必須使社會民主黨人負起責任來盡可能與更多的這樣小組建立和鞏固直接的聯系，必須使社會民主黨人給這些小組以幫助，用其積蓄的經驗和知識去啓發他們，用其革命的創造性去鼓舞它們。讓所有一切這樣的小組，除了自覺的非社會民主主義的以外，或者直接加入黨，或者作為接近黨的組織。在後一種情形下，就不應當要求它們接受我們的綱領，也不應當要求它們一定要與我們發生組織上的關係；只要是它們懷有革命的情感，抱着幫助與專制制度鬥爭的願心，就足夠使這些接近黨的小組在社會民主黨人對它們的積極鼓舞下，在事變進程督促下，起初造成為社會民主黨底民主主義的助手，然後就成為它的有堅確信念的黨員。

人材多得很而同時又沒有人材，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生活和組織需求間的矛盾是老早就可用這個矛盾公式來形容的。這個矛盾，在現在表現得特別厲害：到處都一樣時常聽到渴望新的人力的呼聲，埋怨在組織內缺乏人材的怨言，同時却是到處遍地都有極多的人力自請效勞，青年的力量，特別是

工人階級中的青年力量正在長成起來。實踐的組織家，在這樣條件下而埋怨缺乏人材，這就陷入到如同法國大革命最高發展時代羅蘭夫人所陷入過的同樣的幻夢中。羅蘭夫人在一七九三年寫道：法國沒有人，遍地都是些侏儒。誰這樣說，誰就是只看見樹，而不看見樹林，誰就是承認，他已被事變弄得眼花目亂，不是他這個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識和活動中支配着事變，而是事變支配着他，事變壓倒了他。這樣的組織家，倒不如滾開去好些，讓位給青年人材，這些青年人材是常常能以其熱力來補償其經驗的不足的。

人材是有的，革命的俄國從來也沒有像現在一樣有這樣衆多的人材。革命的階級從來也沒有像現代俄國無產階級一樣有這樣非常順利的條件，——這就是暫時的同盟者，有覺悟的朋友和無意的助手方面來講。人材多得很，只是須要拋棄那些尾巴主義的思想和格言，只是須要讓開創力和首倡性，『計劃』和『謀略』能自由發展，而那時我們才配當偉大革命階級的代表，那時俄國無產階級才會如它開始革命時那樣英勇地把整個俄國大革命進行到底。

